

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

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

1957：大转弯之谜

整风反右实录

朱 地·著



为什么一个正确的命题，最终却带来了
了一个不幸的结果

山西人民出版社
书海出版社



93948

1957：大轉彎之謎

——整風反右實錄

朱 地 著



200200362



山西人民出版社
書海出版社

〔晋〕新登字 6 号

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

朱 地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书 海 出 版 社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经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43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7—203—03331—7
D·789 定价:11.00 元

目 录

1	引 言
1	第一章 毛泽东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1	一 1956 年——多事之秋
7	二 多事之秋的历史反思
38	三 中共八大的总结：要将执政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46	四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要是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
49	五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老干部真正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是少数，要认真说服
64	第二章 毛泽东 2 月 27 日讲话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中央认识到，开门整风的局势已经客观地形成了
64	一 毛泽东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

- 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是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 73 二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分赴各地,向党政领导干部阐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86 三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了党外人士的热烈拥护。但是,中央的方针在党内却遇到了阻力
- 106 四 中共中央调整了整风部署,决定立即在全党展开整风运动
- 116 **第三章 毛泽东规定了整风的主题。他设想:执政党的开门整风将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在1957年的5月和6月初,这一设想初步实现了**
- 116 一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畅谈中共整风问题
- 120 二 毛泽东向党的各级干部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这种社会压力,整风就不易收效
- 123 三 对于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央既积极又谨慎,既想尽快地把他们广泛地发动起来,又想把这种发动纳入一定的轨道
- 127 四 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之下,自由批判的环境初步形成了
- 145 五 五个多星期鸣放的言论,大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有许多意见甚至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

166	第四章	在1957年5月及6月初的开门整风中,发生了一些不寻常事件。整风运动出现了波折
166	一	“左叶事件”。事件起因于4月17日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和新闻记者的一次冲突。到5月上旬,遂发展成为一场记者风波
173	二	“五一九运动”。北京大学的学生开辟“民主墙”,以大字报的形式帮助党组织整风
177	三	匿名信事件。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
184	四	“六六六会议”。章伯钧召集六位教授,在6月6日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章伯钧等人急于向中共负责人反映局势的严重性
189	五	一部分人士发表了一些言辞颇为激烈、尖锐的言论,在当时引起较大争议
196	第五章	毛泽东作出反右派斗争的决策。这个决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依据的,但他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失误了
196	一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没有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定改变整风主题。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是在“五一九”之后
203	二	毛泽东改变整风主题的根本动因。他认为: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
213	三	毛泽东之所以改变整风主题,除了根本动因之外,还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社会安定、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等方面的考虑
219	四	以群众自发反击的形式,打开反右派斗争局面;将“章罗同盟”作为主攻目标;毛泽东提

	出:还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
235	第六章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之后,毛泽东曾考虑重返整风的原定主题,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时过境迁,这些努力没有获得成功
235	一 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命题,号召开展“全民整风”
239	二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第二次鸣放高潮
245	三 “以双反为纲”。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为“大跃进”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259	结束语 1957年事件的历史启示
271	主要参考资料
276	附录一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
287	附录二 知识分子闻“放”之初(徐亦安)
293	附录三 春天的感应(潘文彬)
302	附录四 这是为什么?
305	后 记

引言

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某些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因而往往会出现人们意料不到的突然变化。1957年的开门整风就是如此。由于随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不论在声势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它，因此，从形式上看，开门整风与反右派斗争有着一种因果关系。于是，一本关于1957年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就这样写道：“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15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①香港《九十年代》月刊连载的题为《阳谋——“反右”前后》一文更为露骨地歪曲说：“毛泽东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他的法子便是让大家都来鸣一鸣，名曰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实际上是来一次全民性的政治排队。”按照上述的说法，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的动因，就是为了将右派们“聚而歼之”。

果真如此吗？

其实，我们只要从宏观上去观察，就不难发现，1957年的开门整风，首先不是作为原因而是作为结果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开门整风这一事件的发生，有着它自己的历史渊源，尽管它与反右派斗争有着

难于切割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在截然不同的动因下产生的两个意义不同的事件。那么，这次开门整风运动的源头又在哪里呢？

一位对中国现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曾这样写道：

“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中，很多毛泽东主义的独特做法，早在延安时代实行的制度和实践中就有其萌芽形式。在政治领域中有减缓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统治形式的发展的群众路线原则的实践；‘精兵简政’运动；为适应地方的需要和条件并为广泛的群众参政提供条件而分散政治结构的主张；以及要求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下放’、‘下乡’运动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缩小（即使它不能消除）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裂缝，它们反映了毛泽东长期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同时，这些措施也是其后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

如果这位学者所说的“那场群众性的反官僚主义运动”指的是1957年开门整风的话，那么，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毛泽东在1957年时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而1957年的开门整风，不过是这些基本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在中共党史中，陕甘宁边区时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全国范围来讲，中共仍处于在野党的地位；但是在陕甘宁边区这一局部地区，中共却无可争辩地居于执政地位。在这种执政党地位与在野党地位相统一的特殊情况下，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思索有关如何建设执政党的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最为毛泽东关注，并在他以后的生涯中始终探索不已的问题，是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人如何才能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用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说法，就是“跳出这周期率”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思路：要使共产党人始终不敢松懈，就必须造成一种环境压力；而造成这种环境压力的基本途径就是发扬党内外民主作风，形成对

执政党“内外夹攻”的局面。1945年，毛泽东将这一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民主新路”。1957年的开门整风，就是在全国执政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扩展这条“民主新路”而进行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活动。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整风与反右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件，但它们之间仍然有着难于切割的联系。而且，从实践来看，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后果，实际上已经完全背离了整风的目标。对整风与反右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了如下的总结：“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显然，这个结论与上述关于所谓“阳谋”的论点，是根本对立的。那么，在1957年，由整风到反右这个大转弯的历史之谜，其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当毛泽东所期望的“自由批判”的政治局面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他却又发动了一场反右派斗争打破了这个局面？为什么一个正确的命题，最终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果？本书试图对这一历史之谜作些初步的探讨。

注释：

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31页。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65页。

第一章 毛泽东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1956 年——多事之秋

1957 年初，毛泽东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毛泽东的这段话，点明了他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及发起开门整风的国际与国内社会背景。

所谓赫鲁晓夫闹的风潮，是指他在苏共 20 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本来，苏共 20 大重申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些基本原则，批判了个人崇拜现象，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但是，在大会闭幕的当晚，赫鲁晓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借口，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同年 6 月和 10 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从此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

1956 年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在

诸多事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特别提到了这个事件，他说：“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毛泽东由这个事件引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

对于中国来说，1956年同样是多事之秋。当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动。而对这种变动，相当多数的人一时还不能适应，甚至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对这种大变动也感到非常陌生，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还不能相适应地发生变化。再加上前几年各项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造成的不良影响，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以至于屡屡发生群众闹事事件。

首先，在1956年，中国工人请愿事件明显增多，且呈上升趋势。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极不完全的统计，1956年全国总工会收到的报告和直接处理的罢工、请愿事件计86起，其中第一季度6起，第二季度19起，第三季度20起，第四季度41起。总工会党组向中央报告说，在这些事件中，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带头参加，有工会基层主席参加，也有私方人员从中挑拨，在某些事件中还有反革命分子从中煽动。这些罢工请愿事件，往往都是从一些经济方面的因素挑起，但事件发生后，却又有向政治事件发展的趋势。在许多事件中，群众情绪十分激动，包围行政领导，并喊出“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获胜不收兵”、“斗完小的斗大的”等口号，还有的工人说：“看来，我们不学习匈牙利是不行了！”

工人罢工、请愿事件，一般都是由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引起的。例如，河北省定县制砖厂领导不同工人群众商量就变更劳

动组织。工人提出意见，行政干部不仅不加以考虑，反而粗暴地威胁工人：“谁不上工，就扣谁的工资！”遂引起该厂 34 名工人罢工。再如，太原石膏厂从雁北调来的工人，在 9 月份即向领导提出盘热炕和挂门帘的要求，领导答应了这些要求，但一直拖到 11 月份天已冷了，还未解决。再加上食堂管理不善，工人常吃冷饭，引起工人不满，最后酿成罢工。罢工后，该厂领导才急忙解决上述问题，工人说：“火小时他们不救，火大了他们就急了。”还有的单位则由于没有处理好工人工资待遇问题而引起罢工。如山西雁北专区地方国营马口煤矿，因有运煤装卸任务录用临时工 60 人，1956 年 1 月签订合同时，该矿长对工人说：“给你们订长期合同。”并让人将他的图章拿去，在花名册上盖章，作为合同的附件。后来行政干部才说是临时合同，要同工人解约，而工人则认为订的是长期合同，解约就是集体开除，因而形成争议。工人极为不满该矿领导的做法，联名向国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控告。再如河北怀来县五星制砖厂总厂近两个月不发给工人工资，并随意降低工资发放标准，引起工人不满，导致罢工。而该厂厂长还振振有辞：“发了工资，工人都走了怎么办，不发工资就可以把工人巩固住。”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罢工、请愿事件的起因，往往都是一些小事，但由于领导者没有及时予以解决，致使矛盾激化，遂发展成有一定政治影响的罢工、请愿事件。

其次，1956 年，农村中干群矛盾突出，不少地区出现闹社风潮。1957 年 1 月，陈伯达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福建省莲塘乡农业合作社一些问题的调查报告，其中写道，农村干部不但握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而且握有很大的经济权力，诸如产品分配权，财政、贷款、预购款的管理、支配权等等。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权力，严重脱离群众，为了自私自利的企图而滥用权力，违反党的政策，生活、思想蜕化，引起群众的反感。一些农民向调查组反映，一些干部的工分同他们差不多，或者还要少，

为什么能够经常上饭馆？为什么能戴手表、用派克笔、听留声机？有的社员还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夏收余谷卖后有多少存款、用途如何。群众还反映，乡社干部是“官官相卫”，有的干部明说：“我们几个干部屁股相向就不怕群众”；什么人浮上来就把他打下去”。河北省委也向中央反映，农村干部强迫命令成风，致使干群矛盾尖锐。如雄县北河口乡有的社员因对社的工作不满，要求退社，该乡党总支书记威胁说：“退社就是和国家分家，分了家，粮食局、供销社、农业社一律跟你们绝交。”昌黎县刘台庄乡农业社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动员”社员投资打井，一夜不叫社员回家睡觉，干部明言：“不缴不行，没钱卖人也得缴”。有的社员就把家中吃的粮食、烧的柴禾等卖掉来投资。有的社在搞生产竞赛时，严令社员不准赶集、不准经营副业，否则以“违反集体利益论处”。有的社员说，农业社限制副业，又不给预支借款，连买灯油的钱都没有，“农业社这种优越性实在受不了”。有的社员不愿受“制”，情愿缴纳罚款，也要享享“自由”，有的则干脆不辞而别，另谋生路了。

再次，在 1956 年，学校里学生闹事事件也明显增多。据团中央办公厅统计，仅 1956 年下半年就发生学生罢课请愿事件 30 多起，参加学生达一万余名。这些事件的起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每一起事件都和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例如，南京航空学院招收的学生，本来就是高中毕业生，但在大学里学的却是中专课程，所以毕业生只能担任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学生们对此极为不满，多次提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到 1956 年 9 月，学生们自动集会，酝酿罢课，向学校提抗议。全校陷入混乱状态。再如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们对课程安排不满，多次反映未获解决，再加上校刊对他们在生产实习中的表现有些措辞不当的批评，遂引起学生闹事。1956 年 12 月 31 日至 1957 年 1 月 5 日，四年级各班张贴大字报和漫画共 50 余张，并举行两次

记者招待会要“把官僚主义者赶出学校”。共有 500 余名学生参加了记者招待会。还有个别的领导者，在闹事事件发生后，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强制平息事件，使矛盾发展到了对抗的程度。例如当时影响较大的兰州林业学校罢课事件，省委派去的工作组就断定：“蹠些学生的行为已属‘反革命’性质，因此要以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于是带了几十名民警威慑学生，先后逮捕了 23 人，隔离 35 人（占全校学生的 1/5）。

最后，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部门的领导者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伤害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积极性，致使许多非党知识分子对于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有一种潜在的抵触情绪。如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后来所说的：“潘光旦先生的不跳论最近在学术界出了名，其实我们知道的潘先生一向都是爱跳的，今天不跳是有他的难言之隐。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的思想检查十二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情长逼一个学者承认自己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

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回忆说：“我到校时，在全国高等学校教师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运动中教师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成绩很大。但做法上有些粗暴，不利于党群之间的团结，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另外，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在一起……。遗传是否有‘基因’，是个学术问题。但是，在苏联对于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称之为‘伪科

学’，把‘基因’比喻为唯心主义的‘上帝’，武断地宣布该派学说是唯心的、反动的，而只有否定‘基因’存在的米丘林——中森科学派，才是真正的生物科学，是唯物主义的。这一争论并由斯大林亲自插手作出上述结论。所以在苏联只有米——李的学说是合法的，而孟——摩学说是非法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这种说法也搬到中国；而中国原有的教师都学自欧、美、日，都是孟——摩学派。因此，从苏联留学归来，担任北农大第一任校长和党委负责人的×××同志就把‘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帽子加在这些教师头上。于是，矛盾就尖锐、激化了。……小麦育种、栽培学专家蔡旭教授，培育出了小麦新品种，可以防止华北地区流行的小麦锈病，又可增产。但×××同志和党委其他同志及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则拘于苏联的说法，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让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甚至还要批判。蔡教授出于无奈，只得说他拥护米——李学派。然而，这不但未得减缓，反而加一顶更危险的帽子：‘披着米丘林外衣反米丘林’。蔡教授被压得痛哭流涕，引起绝大多数教师的反感。于是在学校中形成了严重的党与教师对立的局面。”

发生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小麦事件”是很有代表性的，它说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党的组织有抵触情绪，主要责任在党员负责干部身上。也就是说，在党组织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中，党的干部一般地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个结论也适用于上述各类闹事事件。

发生在1956年的各类群众闹事事件，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即中国共产党人在

局部地区执政的时期，就已经提了出来。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这一时期及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对于理解 1957 年的事件，是极有启发的。

二 多事之秋的历史反思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索

1945年7月1日至5日，受中共中央邀请，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了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发表了《延安归来》，叙述了他访问延安的感受。其中一段写道：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这段话是一位老资格资产阶级政治家，在饱经世事沧桑之后，向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一个重大而发人深思的问题。黄炎培所提到的“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引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原句为：“禹汤罪己，其兴也浚焉；桀

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句话用了“禹之下车泣囚”和“汤之桑林自祷”两个典故，说明由于夏禹和商汤勇于承担责任，他们的事业就兴旺而呈现了勃勃生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夏桀和商纣将过错全推给别人，他们就很快地失败了。黄炎培将这两句话用在同一对象身上，则说明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阶级集团，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乃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跳出由兴旺走向衰败的周期。

黄炎培同毛泽东谈的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笼统地提出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如果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看出，黄炎培所说的“周期率”现象，是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一种深入而颇有远虑的思考。

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即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了。但是，随即而产生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却使每一个稍有政治头脑的进步人士忧心忡忡。作为进步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显然已经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和大革命时期的勃勃生机，剩下的仅仅是专制、反动与腐败。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陷入“周期率”而难以自拔的政党和政府身上，其结果只能是将中国拖向黑暗的深渊。

然而黄炎培针对国民党而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其落脚点却在共产党身上。在延安的几天参观访问，使黄炎培大开眼界，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但是，黄炎培在振奋之余又有所担心：共产党廉明的政治作风和蓬勃的革命精神能够维系多久？最终能否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担心也正是毛泽东思索已久并引起高度警觉的问题。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特别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它在全国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这种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国内战争的考验，力量大大加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处于在野党地位，但在局部地区已经取得了巩固的执政地位；以及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等等。这些重大变化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走上了成熟的道路。但是，这些重大变化——特别是局部执政地位的取得——也必然要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产生了两个矛盾。

其一，局部执政地位的取得，客观上要求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但主观上却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中国共产党是陕甘宁边区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主要执行者，边区工作能否搞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最大多数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此，这一时期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显得尤其重要。但是，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又使得党的一些干部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群众的呼声，在制定和执行各项方针、政策时，出现违背群众利益的偏差。这种偏差如果不及时地予以纠正，就会严重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其二，取得局部执政地位这件事本身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使党的干部被权力意识腐蚀，成为站在群众头上或分割群众利益的特权者。在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权力总是和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定的权力总是能带来一定的利益。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但是，如果对这种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一些受封建意识侵蚀的干部就会凭借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尽管当时干部腐化堕落的现象是极个别的，但做为一种苗头和一种潜在的趋势，则必须引起中国共产党

人的严重关注。

总之；陕甘宁边区时期党的建设工作的，正处在一个复杂的过渡阶段。作为全国范围的在野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仍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但是，作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党的建设却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局部执政条件，大胆地探索，走出一条执政党建设的新路来，以便为将来在全国执政做好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陕甘宁边区的特定条件出发，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野党和执政党相统一的特殊情况，逐步地探索出了一条建党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毛泽东在 1945 年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时所提到的“民主新路”。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这段话，只是提出了“民主新路”这个概念，对它的丰富涵义并没有展开论述。实际上，从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分析出，这条“民主新路”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民主新路”的政治目标是在全党树立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使党的事业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党在处理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相对稳定的局部执政地位，不仅要求党在经济上解决好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而且要在政治上处理好党和各民主阶层的关系，以及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向全党指出，共产党员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真正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才能将全体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

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又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⑥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又向参议员们宣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他希望共产党的参议员与党外参议员很好地合作共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再次强调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⑦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其中之一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⑧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一再向全党强调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的。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来看，

以往任何政党都是把政权和军队当作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则完全不同，它执掌政权、握有军队，却完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并且，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具有号召力的政治口号，而且具有了现实的行动意义，即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必须通过它的党员在现实行动中体现出来。毛泽东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突出地强调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就是要每一个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行动向全体人民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不仅能将陕甘宁边区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而且还会同国民党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全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从党内的政治生活方面来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根本保证。

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的错误，追根溯源，都是由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所造成的。例如，党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放弃领导权的教训，一次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压制工农运动，从右的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放弃领导权的教训；另一次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看不到各阶层人民群众要求建立一个抗日的各阶级联合的政府的愿望，拒绝“国防政府”的口号，坚持提“工农民主政府”，坚持认为“国内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和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于是，“左”倾的政治领导就远远地脱离了群众普遍的政治要求，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共同抗日的政治责任。正如周恩来所讲的，在领导权问题上，“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⑨没有了群众，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教条主义者就成为“空军司令”、“孤家寡人”。因此，党要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最根本的措施就是使全体共产党人树立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

点，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当然，从人的认识规律来说，我们不能要求共产党人完全不犯错误。问题在于，当党内出现错误倾向时，如何使共产党人获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⑩显然，一个人如果从一己私利出发，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得失，他就不可能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相反，一个人如果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他就会抛弃一切私心杂念，而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唯一的取舍标准。

总之，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已经成为各阶层民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它开始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为人民群众谋取实际的利益；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党，是坚持全民族抗战、同国民党进行政治较量的中坚力量；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小圈子，跨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它的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都会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显然是抓住了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第二，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将党内教育与

党外监督结合起来，采取“内外夹攻”的方法，来督促全体党员永远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道：“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⑪毛泽东所说的“内外夹攻”，是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基本方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15日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一年多的时间里，党员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另一方面又给党的组织工作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由于有些地方党组织片面追求党员数量，把关不严，“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某些地方模糊起来。使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机会来进行破坏我党的阴谋。”^⑫大批合格的与不合格的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是党取得局部执政地位以后出现的新情况。这一新情况要求中央拿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措施，纯洁党的队伍，使全体党员在思想上真正入党。

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基本措施就是加强党内思想教育。1939年5月23日，《解放》杂志发表了陈云的《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刘力功是在1938年入党的，他在抗大毕业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学习，毕业时拒不服从组织的分配，最后被开除出党。陈云写道：“刘力功开除出党了。如果问：我们党内具有或多或少象刘力功这样观点的党员还有没有？还有。这是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

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⑬显然，问题有两个方面，对党的组织来说，它必须承担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但是，这种教育要在党员身上发生作用，则要求每一个党员能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也就是说，党内教育必须贯穿在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39 年 8 月 25 日做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也强调了党内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决定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决定要求全党“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

1942 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就是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对建党理论和实践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它创造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最佳方式，即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

但仅仅如此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工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残酷的斗争条件迫使党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自身建设；到了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则跨出了这个封闭的小圈子。此时，中国共产党是在陕甘宁边区公开执政的党，是边区各阶层人民公认的领导核心，它的活动对边区社会各项工作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建设工作的

成效就直接反映在社会各项具体的工作之中。因此，局部执政的条件决定，党的建设工作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人民群众开放，即将自己的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检查、监督之下。

党外的检查监督，是局部执政条件下把党建设好的必不可少的措施。首先，党的责任和活动范围扩大了，但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在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范围上却是有限的，在党内，往往不容易听到不同的意见。特别是过去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与开放环境中党的工作很不适应，如：“长期同整个社会隔离的状态，仇恨一切旧东西的结果，使我们不善于同整个社会接触；特别是对社会上层人士的接触”；“苏维埃红军中行政的、军事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存在，使我们不会运用民主的工作方法”；“在白区白色恐怖下秘密的狭窄的工作方式的存在，使我们不善于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作”；以及“长期的左的关门主义、公式主义的恶劣传统的影响”，等等^⑭。这些缺陷，在党组织内往往不容易引起党的干部的重视，但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接触中，却能得到强烈的反应，因此，就需要把党的组织放到一个广阔的环境中去检查考验。其次，把党组织和党员置于人民群众的检查监督之下，可以对共产党人形成一种更为强大的压力。在党组织内，党员的缺点和错误的影响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在开放的环境中，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联系中，党员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党的声誉，都会影响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就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压力，使他们的言行更加谨慎和检点。这种压力，与党内的思想教育结合在一起，就会转化为促使他们向更高标准迈进的动力。

因此，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再强调，共产党人必须注意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检查、监督。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演说，他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

得对的 我们应该欢迎 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⑮就在这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 11 位参议员提交了“精兵简政”议案。议案指出，“军事政治的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因此，“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 非常高兴 把它抄在笔记本上 并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⑯三年后，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重提此事，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⑰同时期，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党外监督，如 1942 年 7 月 14 日，任弼时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增强党性的报告即指出，“中国的事情不同党外人士合作是办不好的，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是有好处的。”他认为，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对共产党人是一种磨练。^⑱1943 年 1 月 7 日 任弼时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一文中又指出 反对和肃清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⑲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是同党内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的重要武器。

第三，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在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增强他们

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以为党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存在和发展的，政党也是如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与人民群众相联系而存在，它的发展水平，受到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的制约和影响。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但它在近期内的政治口号和政治目标，却必须受到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和觉悟程度的限制；其次，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它的发展规模决定于人民群众普遍觉悟的程度，一般说来，在群众普遍觉悟较低的时期或地区，党的力量也比较弱小；最后，中国共产党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这是一个优点，但也正因为如此，群众中的消极落后意识会渗透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对党的建设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毛泽东在谈到扩大党内民主时曾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现象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②0}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淡薄，必然要在党内有所反映。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和任何其他的统治集团截然不同，其他的统治集团是统治人民，因此最利于这种统治的政策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而共产党的统治则是人民的统治，它不过是人民的政治代表，它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它的进步也必然包含在人民的进步之中。正如毛泽东于 1944 年 12 月 15 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所指出的：“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于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②1}刘少奇也这样说道：“如果根据地内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的提高，是我们坚持抗战与创造战后新中国所依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就要用一切努力来提高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②2}可以说，没有人民群

众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因此，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1942年9月，毛泽东当面嘱咐即将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要求边区政府抓紧进行四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说，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紧发展。1944年4月，毛泽东召集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和边区五个分区的地委书记，举行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反过来又影响政治经济。孔夫子办学校，目的是宣传封建秩序。资本主义没有文化建设不成。我们建设抗日根据地，没有文化也不行。毛泽东还说，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今年冬天要展开讨论文化教育问题。^{②③}按照毛泽东讲话的精神，1944年10月到11月，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联合召开了边区文化教育大会，总结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以来边区文化教育工作的经验。毛泽东于10月30日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指出了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认为，封建迷信思想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号召在文化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即“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向愚昧落后现象开战。^{②④}

陕甘宁边区时期民主政治的中心问题是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因此，在组织人民群众参加经济建设事业的同时，掀起文化建设事业的高潮，可以造成“行动的民主”。^{②⑤}再加上当时“三三制”民主政权的示范，以及当时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民主

选举的体验，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觉悟。人民群众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在1945年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时所提到的“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中国共产党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而人民群众在投入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素质，于是又反过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向更高水准迈进的强大推动力，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的深刻含义，由此中国共产党也就找到跳出“周期率”的正确方向。

（二）建国前夕毛泽东的警告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朝300周年，写成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发表。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分析了这次农民大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文章认为，这次农民大起义之所以从巨大胜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分地陶醉于胜利之中，“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收降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二是屠戮功臣，“大凡一位开国的

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然而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李自成不仅没有采纳李岩提出的一系列正确意见，反而相信了牛金星的谗言杀了李岩，由此而导致了起义领导集团的“解体”。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不久即传到延安，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在抗日民族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的新式农民战争，会不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深深思索。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②6}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②7}

从那时起，如何防止出现胜利时骄傲的毛病，就成为毛泽东思虑得最多的一个关键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短短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摧枯拉朽之势，与明末李自成的攻陷北京，不无相似之处。这一举世瞩目的巨大胜利，会使共产党人也“纷纷然，昏昏然”，沉沦进过分的陶醉中吗？毛泽东对此不无担心。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指出“因为胜

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②8}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避免出现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第一，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以新的责任压力来防止党内出现骄傲情绪。

旧式农民战争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起义领导集团的政治视野，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有限的。即使最有限光的农民起义领袖，充其量也只是把推翻一个封建王朝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而一旦这一目标实现之后，或者在实现这一目标进程中获得重大胜利之后，他们就会以为大功告成了。于是，起义初兴时期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就会松懈下来。例如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全国的形势并不乐观：在南方，明朝残余势力正准备重新组成政权，与农民政权相对抗；在东北，清政权则正准备以倾国之兵入主中原。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但由于主要目标实现了，主要对手消失了，农民的领袖们就以为大功已经告成，于是，儿戏般地派了降将唐通率几千士兵去镇守山海关，天真地以为明朝残余势力“传檄可定”，而主要兵力则聚集于北京城中。农民领袖们对下一步的斗争目标，是完全茫然的。及至吴三桂降清，败局已无可挽回了。

毛泽东以史为鉴，在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取得决定性

的胜利之际，为了避免共产党人产生居功自傲的情绪，他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开始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工作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②③}在庆祝建党 28 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是值得庆祝的，“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③④}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指明新的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就是为了使全体共产党人不要过分地陶醉于胜利之中，而要以清醒的头脑为即将承担的建设任务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毛泽东看来，夺取全国胜利，与建设新中国的任务相比，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是一场正剧的序幕，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因此，如果第一步的完成、序幕的结束也值得骄傲的话，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设任务，给全体共产党人造成了一种历史责任压力，实际上起到了“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的客观效果。可以说，及时地提出新的历史任务，是防止骄傲情绪、从而使共产党人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的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措施。

第二，胜利时骄傲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纪律松弛，而纪律松弛的队伍是不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的，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强调，面对巨大的胜利，全党必须加强纪律性。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之前，纪律是非常严明的，“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军止，即校骑射。储备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规定“马腾入田苗者斩”。而作为农民军领袖的李自成，自己更能身体力行，成为全军的表率。郭沫若说道：“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但是，在农民军攻灭明王朝，进入北京之后，由于大部分官兵都沉湎于胜利的陶醉之中，纪律立即松懈下来，为将者“杀人无虚日”，为兵者“抢掠民财”；“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军止即校骑射”为聚在城中享乐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战斗力自然要大大削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起始李自成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陷北京，最后李自成亲征清军，却弄得“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这其中的教训，确是发人深省的。

中国共产党人记取了这一教训。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之后，毛泽东修改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1947年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训令的形式向全军全国颁布，同时还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号召全军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③1}

1948年1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等人的信中预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从根本_上打倒国民党。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毛泽东提出：“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

性，革命无不胜。”在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人民宣布约法八章，并再次申明：“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③2}当人民解放军迅速向东南广大地区推进时，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要求“进入江南各省诸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并具体规定了 12 项入城纪律。实践证明，这种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不仅使人民军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强大的战斗力，而且还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使他们切身地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

第三，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为了防止共产党人滋长居功自傲的情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要坚决制止为领导者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

历来包围胜利者的，总是一片赞美和欢呼声，对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客观地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赢得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是资产阶级，他们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伟大。但是，胜利的欢呼声对胜利者又往往是一种极其严格的考验，如果胜利者不能正确地对待已取得的成就，过分地迷恋这种欢呼声，最终就会被这种欢呼声淹没，就会居功自傲、故步自封，就会很快地从胜利的峰顶跌落下来。

毛泽东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出了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作风的表率。1948 年 8 月 13 日，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③3}，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

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见到吴玉章的电报后，联想到当时有的同志在报刊上把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情况，十分不安，即于8月15日给吴玉章回信说道：“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③③}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虚怀若谷的风格。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赞颂和推崇他，也是很自然的事。吴玉章的意见，实际上是党内对毛泽东的赞颂和推崇的反映。但是，面对声誉，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从来不同意对他过分的赞颂。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全体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的集体创造。

如果认为，毛泽东制止对他本人歌功颂德的现象，仅仅是出于一种“伟大的谦虚”，那就大大低估了毛泽东行为的意义。在毛泽东看来，对待歌功颂德现象的态度问题——究竟是采取措施制止还是默许或欣然接受——实质上是世界观或历史观的反映，它直接影响到领袖与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③④}毛泽东提出的这些禁令，此后就成为制度在党内确定下来，

它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迁往北平，在途中，毛泽东闻知保定要举行庆祝大会，即让周恩来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贺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行动。”而在一个月之前，华北局还接到中央一个电报，电报指示，在林伯渠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这里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薄一波在回顾这一过程时说道：“一个是要开欢迎会，一个是不开欢迎会，两相比较，适成对照。看起来是两件具体事，却有深意。它不仅体现了我党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党对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③⑤}需要指出的是，胜利的欢呼声极易使党内滋长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在这种时候，这一对比就有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以巨大的成功为骄傲的资本，而仍然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团结一切有益于人民事业的人士，那么，以下的干部和党员，就更没有居功自傲的理由了。

第四，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较快地适应全面胜利后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借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

毛泽东在总结秦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曾指出，陈胜有“二误”，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当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的执政党时，会不会也出现脱离群众的错误呢？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是有所警觉的。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以参议会作为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组织形式，但在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以后，这

种组织形式就显得过时了。由于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一时还没有确定新的组织形式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一些新解放的城市中就出现了脱离群众的现象。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中指出：“据石家庄、洛阳、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我在这些城市的工作中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我已掌握了政权：但还没有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我派往这些城市的工作干部愈多，就使城市工作机关堆积的干部愈多，也就愈加阻塞我在城市的领导机关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和接触，各领导机关每日所接触的所传达的都是在外面派来的这些干部中打圈子，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又常常主观得很，与人民生活中的实际和群众中的真正舆论相距甚远。”显然，没有一个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就必然会助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这种官僚主义在我们党刚接管政权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为了迅速纠正和防止再出现这种现象，中央在指示中规定：“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中央认为，在刚解放的城市，党不可能马上与广大群众建立联系，因此，正式的人民代表会议一时不易召开，一些人民团体，也不能一下组织好。“而各界代表会，则可根据我们在该城市原有的或可能动员的力量，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临时市政府出面首先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组成各界代表会，成为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各界代表会是人民代表会议的前身或雏形，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形式，中央希望各地善为运用这一形式创造出新的经验来。这一指示发出之后，党内一些干部没有真正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对这项工作也就采取了拖延的态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于1949年7月31日又发出《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中央指出，

“自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以后，为时已久，除太原、石家庄、西安等少数城市以外，各地均尚未召集此项会议，这是不好的。”在老解放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工作也应从速办理，不要推延。“党内干部中有一种不愿召开此类会议听受批评及建议的倾向，必须克服。”中央明确规定，“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央并要求，各解放区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必须与各界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配合举行。8月26日，中央又向华东局及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及各县一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中央在指示中提出：“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9月2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察哈尔省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的指示》中再次指出：“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的圈子，就走了弯路。”

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上述一系列指示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跳出狭小的圈子，探寻与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最佳途径，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党内出现和滋长官僚主义作风。

第五，中国共产党还加强和发展了它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以此获得有效的党外监督。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

中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函民革负责人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要实现这一步骤，必先召开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建议由中共、民革、民盟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③⑥}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工部改组为中央统战部，任命李维汉为部长，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获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与民主党派发展合作关系，不仅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建国后组建新政权、进行经济建设的需要。但还应该指出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重视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还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民主党派的存在，使中国共产党可以经常听到在党内不容易听到的意见，获得有效的党外监督，而这正是执政党建设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早在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说道：“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③⑦}“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毛泽东是深知这一古训所包含的哲理的。中国共产党本身存在的毛病，有时自己难以觉察，这就需要“旁观者”指出。在中共中央中政治局1948年9月会议上，毛泽东在任弼时发言谈到民主问题时，插话说：“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③⑧}但要发挥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就不能让它们徒具形式，而应该真心实意帮助它们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主动性。毛泽东是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主动性问题的。1949年8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发表了题

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警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痛斥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毛泽东见到这份文件，极为高兴，当日即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去信说：“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在接到黄炎培 24 日的信后，毛泽东于 26 日又复信说，民建建立了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③9}显然，毛泽东真心希望，各民主党派能够发展成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又有着自己的主动性的政党。实际上，毛泽东此时的考虑，已经为 1957 年中共的开门整风埋下了伏笔。

（三）建国初期民主新路的拓展

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实践证明，把执政党置于“内外夹攻”之下，是搞好党的建设行之有效的办法。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和中央坚持运用这一方法，并在新的条件下有所改进和发展。

第一，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之后，中共中央及时地告诫全党，对人民群众的建议和批评必须采取热烈欢迎与坚决保护的态度。

当中国共产党上升为执政党之后，为了在执政地位上能够经常听到群众的呼声，1950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在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政权的情况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对于党和人民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为此，决定规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在这份文件中，还对被批评者与批评者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被批评者这个角

度来说，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至于批评者，中央指出，要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同时，中央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以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进行。

在踏上执政地位不久，中共中央即颁布这样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决定，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截然区别开来，从而使新的执政党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一开始就置于一个较高的起点之上。

根据中央的这个精神，国家新闻总署于 4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中共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任。这种批评应当是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和与人为善的。报纸所发表的批评应当要求被批评者作适当的声明，以便向人民群众报告批评的结果。这一规定的实施，对于执政党的干部必然起到极大的鞭策作用。

中央的这一精神，还体现在执政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之中。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必然要实行保密。但是，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在党的组织建设中仍然实行保密，就不仅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使党组织不能全面、准确地考察要求入党的人。根据变化了的情况，5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对党的组织工作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就是在这个文件中，中央提出了“公开建党”的口号。中央提出，“所谓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

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公开建党就必须防止不重视群众意见（或形式地征求群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生。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公开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之后的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第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根据全国执政条件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向全体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并按照这种要求进行了党的组织整顿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之后，环境压力的根本变化增加了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当时刘少奇曾作了深刻的论述：

“过去接收党员，有些地方降低了条件，是不对的。但那时革命还没有胜利，反动派还统治着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人，还要担负遭受反动派迫害的危险，而党也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一切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自然就不会来或很少加入共产党。这是过去我们发展党员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限制。但是一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以后，战争的胜负谁属，已经完全明白，这种情形就完全改变了。今天，革命已在全国胜利，情形就更不同了。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④0}

在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迫切需要在主观上加强限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195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9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于我们党的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④①}在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刘少奇都作了报告。刘少奇在会议开幕式的报告中，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这八条经过整理和修改，写进了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在闭幕式的报告中，刘少奇还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即“必须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又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的人，才能被接收为党员。”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在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之后，还要具备他在开幕式上所提出的八项条件，而这些主要是依靠教育才能达到的。^{④②}这次会议后，即按照这些条件的要求，开始了执政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党的工作。

第三，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必须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前面提到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说明中央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对于执政党党员干部的缺点错误，必须予以公开揭露，以此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压力，促使全体党员警觉和谨慎起来。正如朱德在 1950 年 5 月所说的，对于一些干部所犯错误的处理结果，要在党刊和报纸上公布出来，“这点很有作用，值得提倡。因为这样不但教育了全党和人民，而且真正有效地教育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有些人受了处分，只要不公布出来，那他还是满不在乎的，还是不容易改正错误的。如果我们把它公开出来，在报上一登，到处都传遍了，他的错误行为再也隐蔽不起来了。”^{④③}这种公开揭露的威力，在三反运动中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毛泽东在发动“三反”运动时，对于群众舆论的作用就十分

重视。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就写道：“要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2月1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西南地区贪污浪费严重的原因，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所以效果很小，原因在于没有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借此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非常赞成这一观点，在批语中写道：“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运动实际进展过程中，党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深刻地认识到发动群众、造成舆论监督环境的重要意义。1952年1月4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写了《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一文，文章在总结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所带来的教训后指出：“怎样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呢？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只有真正发动起群众来，才可以大量揭露贪污浪费的事实。在中央提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以来，许多肮脏事情都被揭露出来了。所以只要真正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建立经常的民主监督，那些集体舞弊、封锁上级、欺压干部的行为就不行了，领导上的耳目也就聪明了。……因此，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放手发扬民主、批评领导、批评干部，同时，切实有效地开展机关内部的民主运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基本关节。”^{④④}

但是，要发挥群众威力，就必须同党内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倾向作斗争。1951年12月19日，中共武汉市委在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掩护物，它最突出

的表现是压制民主，压制批评，以封建秩序和恶霸作风来对待群众。为此，武汉市委处分了一批压制群众批评的负责干部。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在批语中表扬了武汉市委，写道：“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12月24日，武汉市委又致电中央，汇报说，准备罢免压制民主的副市长常吉光，并由市委书记张平化代表市委作自我批评，声明荐人不当；市长吴德峰也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行为或支持这种行为，对群众影响极坏，也要在人民代表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并公开发表。毛泽东于25日代中央起草了回电，完全赞成武汉市委的安排。

毛泽东关于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的主张，是“内外夹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以群众运动这种形式去反对党内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当然只具有相对的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能绝对化，但其基本精神却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四，毛泽东和中央在强调党外监督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党内教育和党内监督。使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为形成“内外夹攻”的局面打下了基础。

早在1949年11月，为了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密切地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保证党的一切决议的正确实施，中共中央就决定设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纪行为；受理、审查对党的组织及党员违纪的处分，或取消其处分；在党内加强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纪，实行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在建国初期，这一机构在实施党内监督与党内纪律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中央曾评价说：“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以来，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检查和处理了大量的有关党员违法乱

纪的案件，清除了党内的一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惩处了一部分犯有各种严重错误的党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上述案件的检查和处理，对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加强党的纪律，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保证党的路线、政策的正确执行，起了积极的作用。”^{④5}

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央认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已不适应在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的任务，于是，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在组织上和职权上，与纪律检查委员有着很大的区别。从组织上看，纪律检查委员会是由同级党委提出名单，经上两级党委批准后成立，在同级党委指导下进行工作。而监察委员会则完全不同。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本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由上一级党委批准。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级党委指导下进行工作。显然，中央是从高饶事件中接受了教训而作出这一改变的。选举产生的监察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执行自己的监督职能，尤其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从职权和任务上看，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任务也相对扩大了。如1955年3月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有权检查和处理一切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各级党委对一切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除同级党委委员和按照党章应由党的区委和支部处理者外，均应交由中央的和地方各级的监察委员会统一办理；即使是各级党委委员的违纪、违法行为，在必要时上级监察委员会也可以直接处理，等等。显然，这些改进措施，使执政党党内监督的实施在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上大进了一步。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监察委员会制度也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如何实施监督，还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此，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

总之，建国初期党的建设的“内外夹攻”方法得到了提高和发展，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初步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并比较顺利地度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中共八大的总结：要将执政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从执政党建设这一角度来说，1956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的建设都是围绕着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这一主要任务而展开的，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套反映这一主要任务特点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到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由此中国共产党也就开始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即由领导阶级斗争转向领导和平建设。在这一转折时期召开的中共八大，它就必然要承担起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

从执政7年的历史中，中共八大深刻地认识到，执政地位对共产党人是一场新的考验，对此，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曾经作了精辟的说明。

他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执政党的地位 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④6}

显然，所谓执政地位的考验，无非是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的侵袭。由此也就决定了，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措施，清除党内的这三种不良倾向。

那么，造成这三种不良倾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邓小平的上面一段话已经指明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归根结底是由脱离群众造成的。因此，执政地位的考验又集中表现为能否密切地联系群众。

由此我们也就理解，在中共八大上，为什么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一概念解释说，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中共八大认为，“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论意义。首先，它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历

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体现，它向全党说明，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其次，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脱离人民群众而孤立发展，它的先进性与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最后，它正确地说明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即“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④7}上述内容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党的观念”。这一观念，为中共八大规划执政党的建设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中共八大还认为，“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具有极其深刻的实际意义，即它能够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根据这一思想，中共八大规定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途径：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党的传统作风，在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的同时，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以便从根本上克服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倾向。这里所说的监督，既包括党的内部监督，也包括党的外部监督，即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这一基本途径，是群众路线在执政党建设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为了充分调动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加强党内监督，中共八大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重要的改革。一是在党的上下级关系方面，八大党章在坚持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和明确了党的地方组织、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权利。例如，关于党的下级组织，八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

地万组织处理 以利于因地制宜 ”在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政策问题没有作出决议之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 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 ”等等。关于党员群众 八大党章规定，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 除了无条件执行外 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有权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党员有权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控诉，等等。二是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作了改革，即将县以上的代表大会改作常任制。关于常任制，邓小平认为是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所采取的一项根本的改革。他指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④8}可惜的是 常任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去。这些带有根本性的改革措施说明，中共八大是极为重视党内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的。我们知道，对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说，实现党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但是，要实现党内自下而上的监督，却很不容易，因为它不仅需要建立保证这种监督顺利实施的制度，而且还需要党在整体上的政治、文化素质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领导者来说，他必须具有敢于提倡和接受监督的觉悟、品格和作风；对于党员群众来说，他们则需要具有民主监督的意识、实施这种监督的能力以及在“一切向人民负责”的信念中产生的监督勇气。因此，党内

自下而上监督的实现，本身就说明这个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中共八大在民主集中制方面提出的改革措施，其深刻意义就在于：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过程，尤其是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过程，同时也是培养和训练党员群众民主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的过程。

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内部监督必须与党的外部监督结合起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就提出，要采取“内外夹攻”的方法来清除党的缺点和错误。建国后，毛泽东更加重视来自党外的意见，他曾说，和党内同志在一起，听到的意见总是差不多，不同的意见就不容易听到。所以，毛泽东经常和党外人士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与一些党内人士谈话中曾指出，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他还说，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八大召开前几个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又说道：“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主要目的就是互相监督，所以，“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④9}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对于执政党来说，一片赞成声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执政党也会犯错误，因此，有一些反对派存在——当然，这种反对派与多党制的反对党不同，他们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党的一些大政方针或具体措施持有不同意见——可以使执政党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处理问题更谨慎一些，从而把事办得更好一些。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政治报告时修改和加写的一段话，也反映了这一思想：“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不管

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问题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加着重号的字句为毛泽东加写和修改）当然，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提出批评，这种提法是不够准确的，而且这种提法也容易引起党外人士的疑虑和误解而阻塞言路。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在最后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没有出现。但是，这段话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却是正确的，即不论是正确的意见，还是错误的意见，都应该让别人发表，都应该加以考虑和研究，这对于党的事业是“有益无害”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八大上发言所讲的一段话，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说：“现在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居于核心领导的地位，更需要这样的内外夹攻。我们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这是基本的依靠。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向我们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即使有些批评和意见不中肯或者不正确，也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便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我们进行监督。”^{⑤0}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我们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对党的事业是有益无害的，他们“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⑤1}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中共八大召开时，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已经取得了共识：在执政条件下，共产党要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就必须努力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使自己处于全民监督的社会压力之下。

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是从根本上破除历史残留的个人崇拜现象，从而有效地防止个人专断作风滋生的根本条件 1956年 4月 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成的，经由毛泽东审阅和修改），深刻地分析了造成斯大林晚年个人专断作风的主客观因素。文章指出：“个人崇拜不只是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段话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斯大林在一开始并不欣赏个人崇拜，他在 1928 年对这一问题的见解，直至今日还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说：

“最近我们这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这里出现了、历史地形成了一批领导者，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同时几乎成了群众所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

“当然，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并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领导者，这个事实本身是我们党的巨大的成就，显然，没有这样一批有威信的领导者，要领导一个大国是不可设想的。但是，领袖上升的时候逐渐离开群众，而群众开始从下面向上望他们不敢批评他们，这个事实就不会不产生领袖脱离群众、群众离开领袖的某种危险。

“这种危险会使领袖骄傲自大 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 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 ;这会有什么好处 显然 除了党遭到毁灭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可是,我们要的是前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毁灭党。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

“……问题在于要通过对我们缺点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来组织党内的广泛的舆论,来组织工人阶级的广泛舆论,使之成为一种生动敏锐的道义上的监督;极有威信的领袖如果要保持党和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任,就应当倾听这种监督的呼声。”^{⑤2}

读了上面这一大段论述,我们不能不由衷地发出感叹:斯大林说得太精彩了!但是,有着这样深邃思想的斯大林,为什么到了晚年却又那么欣赏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呢?当然,造成这种蜕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在胜利面前斯大林不谨慎了、骄傲了,集体领导制不健全、被破坏了,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波助澜,等等。然而,如果我们到此为止,仅仅这样地提出问题 and 解决问题,那么,即使我们将“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喊上一千遍,个人崇拜现象仍然会改头换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冒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消除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即“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健全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增强他们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毛泽东在 1950 年即指出:“党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在领袖“升”的时候,群众也必须“上升”,而且要“上升”得快一些。

从上述意义来说,中共八大所规定的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途径,即我们所说的“民主新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疑是个创造。

苏联没有这样地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东欧国家也没有这样地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却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如果能够坚定不移地按照这条“民主新路”走下去，人民群众将极大地增强自己的文化力量和管理技能，将从根本上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将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管理者。那么，与这样的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着的中国共产党，也必将获得一种强大的推动力，督促它向更高的水平迈进。

四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

要 在实践中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必须先解决好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为此，自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重大理论课题做了艰苦而又卓有成效的探索。

1956年4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将共产党人在执政条件下犯错误的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了党的领导干部犯错误的社会根源。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也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僵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

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情况呢？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话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

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问题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执政党的领导干部要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就必须使自己的头脑正确地反映社会客观矛盾；而要使自己的主观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就必须实行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20 天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实际上就是十大矛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全面和具体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许多重要思想。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为此，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1957 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⑤③}

1956 年 12 月 4 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命题。在信中，毛泽东对中国民主建国会能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内部矛盾表示由衷的兴

奋，他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⑤4}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重要观点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一，它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公开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文章写道：“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文章认为，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

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第二，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重点和职能转变的观点。文章写道：“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关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不应该象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文章的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它是我们理解随后开始的开门整风运动动因的一把钥匙。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论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认为，当前出现少数人闹事问题，其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对立统一的。因此，要正确处理少数人闹事问题，就必须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立统一现象，“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⑤

就在毛泽东讲这番话的前后，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这场讨论暴露了党内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存在的一些认识分歧。

五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老干部真正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是少数，要认真说服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即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⑤6}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抛弃苏联错误的东西，走出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来，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4月27日，在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发言中总结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照搬苏联做法的教训，明确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⑤7}4月2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说道，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同日，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了总结讲话，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指出，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他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

见。⑤⑧

5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报告会 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一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6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篇讲话，此后“双百”方针传播开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国际上，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这一方针都引起了政治家们的注意。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这一方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有些植物结的果实味道是苦的或者是损人的健康，还有一些植物长起来不受人的控制而会使它周围的作物的根因得不到养料而干死。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⑤⑨

杜勒斯与赫鲁晓夫所见略同。在他看到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于1957年6月25日和7月2日两次回答了记者的有关问题。他说：“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不论杜勒斯与赫鲁晓夫的立场如何不同，凭着政治家的敏感，他们都意识到了“百花齐放”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作风与领导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赫鲁晓夫不赞成让各种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而杜勒斯则希望由此成为中国“自由化”的开端。可以

说，这两个人都歪曲了“双百”方针的政治意义。

但是，赫鲁晓夫把这一方针的提出看作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如他曾说，这一方针提出后，“我们的关系已经又向下坡方向滑了一段了”，这无论如何也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不论是赫鲁晓夫等苏联共产党人，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实施是对苏联传统领导模式的否定。甚至国际上的资产阶级政客也曾以此作为“铁幕”上出现裂痕的证明。

这种否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自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反复考虑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苏联的错误？显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对于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仅仅从党内去解决问题，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如建国后的一系列整治措施，都难以收到长远的效果。因此，毛泽东决心进一步引进外部的力量，对执政党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在中国社会中，哪一个社会阶层能够更为敏锐地觉察到问题，从而对执政党实施较高水平的监督呢？显然，在经济文化普遍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只有知识分子阶层能够做到这一点。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考虑到知识分子的特性了。

1957年3月，在政协三次会议上，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政治亦有他的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

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⑥0}

这么一大段文字，当然不能说是表现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心态，但是，起码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从旧中国走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牢固地持有这种传统观念的。对于这种传统观念，我们很难判定其是非，问题在于什么样的领导者，又怎样去引发它。

那么，在中国社会进入大变动时期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借助的力量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特性的知识阶层。毫无疑问，要调动其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必须消除以往的隔阂和顾虑，为他们提供一个畅所欲言、能够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政治环境。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双百”方针，它也就必然包含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正如赫鲁晓夫和杜勒斯所感觉到的那样。

后来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政治意义作了深刻的说明。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提出来的，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他还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⑥1}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说道：“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

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⑥2

在这里，毛泽东将“双百”方针提到了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高度，这同他一贯倡导的“民主新路”是相吻合的。显然，毛泽东的用意是：打破不能批评执政党的迷信，“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以此来增加执政党党员、干部的环境压力，促使他们永远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如同他以前的许多思想一样，一开始并不能为全党所理解和接受。前面提到，共产党要在执政的条件下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就必须使自己处于全面监督的社会压力之下，这已经是中共最高领导阶层的共识。但是，在党内一些干部和党员中，思想认识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57年初围绕“双百”方针所展开的一场讨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文章还说，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

限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

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以及将来京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同志，但他未作任何评论。及至一月下旬，毛泽东明确批评了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同志对党是忠心耿耿的，是为了党的事业的，但文章则不堪领教。2月16日，毛泽东又指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不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义。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道，老干部真正拥护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是少数，要认真说服，要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矛盾的统一。在3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又多次提出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篇文章，不仅因为它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还因为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在党内决不是少数，这些人已经成为推行“双百”方针的主要障碍。就在毛泽东批评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些人却在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和推崇。2月17日《辽宁日报》发表了署名于铁的文章《警钟——读陈其通马寒冰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认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一篇表现了鲜明党性的警钟般的文章，文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保卫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那种精神，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

意和深思的。2月24日《吉林日报》发表了《省市文艺工作者座谈当前文艺工作情况》的报道，同时发表了许行的文章《必须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寒江的文章《我的不同看法》。许行认为，陈其通等同志针对当前文艺工作中的混乱情况，起来捍卫社会主义思想、捍卫文艺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就不能说是“过于偏激”、“有宗派主义情绪”、“有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而应该说是必要的、适时的，同时也是正确的。2月28日，《旅大日报》转载了陈其通等的文章，编辑部并加了按语：“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2月21日辽宁日报报道）。”

实际上，在3月份以前，毛泽东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谈过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大部分地方同志不可能了解到这一情况，甚至有些地方还传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所以，一些地方报纸也才会发表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文章。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那么它又是怎样表现的呢？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从1月8日至2月28日的50多天里，《人民日报》没有发过一篇有关的文章，也就是说，《人民日报》自从发表了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之后，就偃旗息鼓了，似乎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与自己完全无关了，从而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地方报纸在进行着一场有关党的方针的重大讨论，而党中央的机关报却放弃了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呢？当然不会是稿件方面的原因，这份报纸后来承认，1月至2月期间，它收到有关信、稿20余件；显然也不是出于某种

策略上的考虑，例如让地方报纸充分争论，等等，因为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保持沉默，党中央主席总要知道的，而事实是，毛泽东在 2 月 27 日对《人民日报》的沉默态度表示了不满。因此，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只能是：《人民日报》赞同陈其通等人的观点，但又不能公然与毛泽东对抗，所以只能采取沉默态度了。这说明，“双百”方针的实施，在党内确实遇到了阻力。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的不满。他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提纲里写道：“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四个人”指陈其通等人。着重号为毛泽东所加）毛泽东的批评想必引起了《人民日报》负责人的震动，两天后，《人民日报》打破 50 余天的沉默，发表了署名陈辽的批评文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在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56 年 9 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青年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描写了北京市某区党委会里，一个青年干部同区委组织部一个副部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故事。小说发表后，也在文艺界引起争议，一些人认为，小说把反对党委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主题，是完全错误的。马寒冰在《文艺学习》1957 年 2 月号上发表了《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批评文章，认为官僚主义现象在边远地区也许会存在，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曾以“小人物”身份向“大人物”发起挑战的李希凡，此时也认为，小说反官僚主义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从对这篇小說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在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中，存在着一种“左”的情绪，一种宗派主义情绪。他们热衷于一家之言，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在感情上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格格不入的。2 月 16 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谈论文化思想问题，他

说道，王蒙的小说写得相当好。王蒙是很有希望的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毛泽东还说，反官僚主义是应该的，只是作者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官僚主义是批不倒的。毛泽东不同意马寒冰、李希凡等人认为北京有中央就不会有官僚主义的观点。他说，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有中央，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中央就有官僚主义嘛！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道，马寒冰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能发生官僚主义现象。不晓得这道理来自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我看得不多，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我没有看过这样的马列主义，中央也出官僚主义，也出过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高、饶，中央所在地不出？怎么能说批评不得。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也包含了党内斗争方面的考虑。或者说，毛泽东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当作执政条件下揭露、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手段。

3月12日林默涵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篇引起争议的小说》的评论文章，对王蒙小说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文章一方面指出了小说存在的缺点，认为“小说的作者是抱了一种热情来描写生活中的新旧斗争的，并且直接批评了党的机关中的消极现象。可是，由于作者在理解生活和描写生活上面都存在着缺点，他虽然比较深刻地写出了消极的事物，却没有写出真正能够战胜旧事物的积极力量，因而作品给人一种不健康的灰暗感觉。”另一方面，文章也明确指出了小说所蕴含的积极意义，认为，“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妨害我们的事业发展的消极现象，是当前的重要斗争任务。这种斗争，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有力的反映。王蒙的这篇小说，虽然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但他提出了这样的尖锐的问题，并且表现了他的勇气和才能，就是在这一点上，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林默涵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等消极现象，究竟能不能作

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对待“双百”方针的态度。一些人平常也说些拥护“双百”方针的话，但一碰到批评党委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这样尖锐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感到十分刺耳和刺眼，于是就粗暴、武断地一笔予以抹煞。王蒙的小说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林默涵批评了这种作法，认为“这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对文艺创作的发展不利的”。很明显，林默涵的意见决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反映了党中央的一个基本精神：中共中央提倡和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揭露和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

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得到充分的体现。3月6日至3月13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这次党的会议邀请了党外同志参加，如陆定一所说的，“党与非党同志，大家共同提问题，共同研究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还向各地党委负责人提出：“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工作和有关思想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③党外同志参加共产党的会议，与共产党人共同商讨宣传工作的大政方针，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向全国人民表明，执政的共产党，决不是一个有着一党私利的宗派团体，即使是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工作，共产党也是以坦诚的态度听取各方面意见的。这种做法，与中共中央“放”的方针是协调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党内对于“双百”方针的认识存在分歧一样，少数党的地方负责干部在这件事情上也受到宗派主义情绪的支配，他们没有请党外同志进京参加会议。陆定一在会上批评了这种行为。

3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党中央的意见

就是不能收，只能放。”^{⑥4}实际上，由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而引发的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无非是两种意见，或者主张放，或者主张收，这是两种不同的领导方法，或者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不再局限于科学文化工作领域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⑥5}“一切工作”当然包括了党的建设工作，也就是说，在即将发起的整风运动中，同样要贯彻“双百”方针。

3月13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放”的方针。他以匈牙利事件为鉴戒，指出，采取压的办法，只能使人民内部矛盾趋于激化。“（匈牙利）犯了那么多错误，群众上街游行，本来这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是他（指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要去压，结果变成对抗性的了。中国虽然没有格罗，但是教条主义思想则近乎格罗的办法，打击群众的情绪。”^{⑥6}当时所谓“近乎格罗的办法”的主要表现，就是抵制“双百”方针。从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围绕“双百”方针所展开的一场讨论的舆论导向就基本上扭转过来了。

最后的结论是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的。4月9日，《文汇报》刊登了《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两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一报道。关于这场讨论，周扬作了如下的结论：“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强调在文学艺术战线上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同时指出了目前文艺上的一些的确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这是好的，应当肯定的。但这篇文章包含一些重要的错误。第一，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后的文艺界的情况，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看不到积极现象（这是主导的方面），把一些次要的、个别的消极现象不适当地夸大了。第二，就以他们所指摘的消极现象

而论，他们的批判也是缺乏分析的，而且有些现象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像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描写家庭和爱情生活的作品和讽刺作品的增多，这些都不能说是消极现象；其中虽有某些消极成分，但就主要方面说，是积极的，健康的。第三，对待他们所认为错误的思想，不是采取说理的态度，而是采取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周扬在这里已经把中央的精神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一个新的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决不是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和一两次会议就能达成完全的统一和一致的。认识和实践发展的曲折，都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39 页。

同上，第 341、342 页。

③ 《文汇报》，1957 年 5 月 19 日。

④ 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第 187、188 页。

⑤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 第 148 页、149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2、659、660 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9、1004 页。

⑧ 同上，第 1095、1096 页。

⑨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20 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97 页。

⑪ 同上，第 810 页。

⑫ 《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 年 8 月 25 日）。

⑬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第 59 页。

- ⑭《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
- 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 ⑯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4月版 第502页。
- 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1005页。
- ⑱《任弼时选集》第248页、249页。
- ⑲同上 第294、295页。
- ⑳《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 ㉑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 ㉒《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7页、228页。
- ㉓《回忆与研究》下册,第499、583、584页。
- ㉔《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1、1012页。
- ㉕《任弼时选集》第265页。
- 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948页。
- ㉗《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
- 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
- ㉙同上 第1427、1428页。
- ㉚同上 第1480、1481页。
- ㉛同上 第1239页。
- 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9页。
- ㉝《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3页。
- ㉞《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
- 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5月版,第10页。
- ㊱《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1页。
- ㊲同上 第241页。
- ㊳《任弼时选集》第460页。
- ㊴《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33—335页。
- ㊵《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7、68页。
- 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 ⑫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70 页。
- ⑬ 《朱德选集》第 289、290 页。
- ⑭ 《人民日报》，1952 年 1 月 8 日。
- ⑮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1955 年 3 月 31 日）。
- ⑯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 八— 一九六五），第 202 页。
- ⑰ 同上，第 205、206 页。
- ⑱ 同上，第 221 页。
- ⑲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8、279 页。
- 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2 月版，第 501 页。
- ㉑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第 213 页。
- ㉒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9、10 页。
- ㉓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5—328 页。
- ㉔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14、515 页。
- ㉕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7 页。
- ㉖ 同上，第 267 页。
- ㉗ 《陆定一文集》第 494 页。
- ㉘ 《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 第 248、249 页
- ㉙ 《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第 417 页。
- ㉚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23 日。
- ㉛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4 页。
- ㉜ 同上，第 414、415 页。
- ㉝ 同上，第 418 页。
- ㉞ 同上，第 414 页。
- ㉟ 同上，第 415 页。
- ㊱ 《陆定一文集》第 556 页。

第二章 毛泽东 2 月 27 日讲话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中央认识到，开门整风的局势已经客观地形成了

一 毛泽东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是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想，其主要理论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和特点，为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大林晚年的严重错误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即他一直用形而上学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斯大林还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如他在 1925 年即承认：“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②这个认识虽

然有局限性，但无疑是正确的。到了 1936 年，当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斯大林对矛盾问题的看法就走入了迷途。这时，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生产关系不再与生产力发生任何矛盾，“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情形。”鉴于这种认识，斯大林还认为，苏联的“外部”矛盾仍然存在，而“内部”矛盾却在消失。他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正在消除，从前的阶级特殊性也在消失；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都在缩小、都在消失。

但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并不因为人们的主观否认而就真的消失了。当这些客观矛盾顽强地表现自己，并在一定时期激化起来的时候，斯大林就只能用“外部”矛盾来解释这种现象，即认为这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渗透、颠覆所造成的结果。可以说，苏联三十年代末肃反扩大化，是斯大林的矛盾理论的必然结局。

斯大林在逝世之前对他的错误理论有所纠正。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著作中写道：“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⑤他还指出，只要领导机关的政策正确，这些矛盾就不会弄到冲突的地步；否则的话，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斯大林的认识也仅仅到此为止。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什么特点？它都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形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又占据什么地位？斯大林没有提出、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第一个对这些问题做了科学的解答。他在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同旧社会相比，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所谓不同

的性质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所谓不同的情况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于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就表现出这样一种运动规律，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得到解决，社会也就在不断地前进。

毛泽东关于基本矛盾的论述，成为深入地分析我国社会各类具体矛盾的理论前提。

第二，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毛泽东认为，应该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那么，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各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又居于什么地位呢？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必然是以敌我对抗性矛盾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完成以后，社会阶级关系与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历来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而此时，这一阶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处于灭亡的过程中；我们的主要阶级敌人——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而这一阶级的分子，正处在向劳动人民转变的过程中；经过肃反斗争，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虽说还有反革命分子，但是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以敌我矛盾为主要

内容的阶级斗争，必然不再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就多次强调过。195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经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在接见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团时，毛泽东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段话说的是斯大林错误的根源，而实际上是在表明中共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根本看法，也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如下观点的注解：“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段话，在观点表述上不够准确，后来毛泽东对此也表示过不满，但其基本精神——即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毛泽东所赞同的。

在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继续阐发了这一观点。实际上，当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时，就已经包含着必然的结论：既然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具有“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那么，这一基本矛盾必然要通过大

量的、具体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出来，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就上升到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即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高度。换言之，此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经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义，他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该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执政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着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来进行。这就是说，原来主要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党，现在要转变成成为领导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党，而实现这种转变，也就成为后来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原因。

第三，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转化原理，毛泽东指出，在一定条件下，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矛盾论》中即已指出：“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是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⑥毛泽东并以陈独秀、张国焘的事例说明了这种转化现象。当我们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的运动过程时，同样可以看到这种转化现象。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兰州林业学校学生罢课事件，就经历了一个由非对抗而转化为对抗的过程。

兰州林业学校建校于 1955 年秋季，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东北地区。这些学生入校后一直很关心“三年能回几次家，发不发路费”的问题，而校方对此却一直未给予明确答复。1957 年 1 月 6 日，学生中流传“石油学校经过‘斗争’已领到 28 元路费”的谣言。1 月 7 日，10 名学生（内有团支书等 5 名团员）秘密开会，准备煽动罢课。8 日晨他们以“罢课委员会”名义在校内张贴标语，号召“为回家而斗争”、“直到车费拿到手才上课”并向学校提出“最后通牒”声称学校在 9 日晨 5 时前若不给予答复即开始罢课。当天上午尚勉强上课，下午即有许多班自动停课。这时学校领导没有及时采取明确措施，校团委也仅仅号召团员不要参加罢课，而一些团支书竟号召团员起来“斗争”。9 日，学生卧床不起，正式开始罢课。此时学校决定召开班会和学生代表会议，但因学生哄闹和抵制而未开成。9 日晚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 率工作组及几十名民警到校，在与学校领导开会时发现有学生在外偷听，这位部长当即命令民警扣留了其中四人，学生情绪更趋激动。当部长准备召集学生讲话时，学生提出以“警察退出会场”为先决条件，部长拍桌大骂学生“胡闹”，并命令把“罢委会”委员 ××× 抓起来。这时部分学生已入场准备听报告，在整队时，有人喊“打”；“救 ×××”，许多学生就蜂拥而上，在场民警和干部中有三人受伤，工作组成员、省农业厅厅长 ××× 也被挤倒并挨了几拳，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当场命令逮捕了 4 名学生。接着学生又涌进饭厅，打了在场的副校长，在此又有两名学生被捕。于是，大队学生集合入城赴省人民委员会请愿，沿途高呼“共产党万岁”、“宪法是保护我们的”等口号。途中与省里派去截阻的徒手部队和公安人员遭遇，发生殴打，为首 3 人（内有一人手持一把菜刀）被捕。相持至深夜学生才返校。回校后，学生们顶门而睡。午夜，省里组织军、警和干部四五百人到校“围楼喊话”，说“坚决镇压坏分子，保护好同学”，要求学生出来听报告。后团支委员 ××× 等

4 人出来 向工作组建议：“不捕人 民警退出会场”学生就可以出来听报告。工作组接受了这个意见，在 10 日晨 4 时向学生们作了报告。学生们在听了报告并讨论之后，多数已认识到罢课闹事是不对的，也不应该向政府要路费。“罢委员”3 位负责人并向工作组具结承认错误。情况开始缓和下来。到 11 日下午，工作组又将 ××× 等 7 人逮捕。从 18 日至 21 日，学校接连开了几天的批评会、斗争会和全校性的“控诉大会”。在大会上，被批斗的学生一个个带着手铐由民警押进会场，被指控为犯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大会还呼喊“镇压”、“严办”之类的口号。

兰州林业学校罢课风潮平息了。但是，用这种激烈的压制手段来处理罢课事件，其政治影响却很不好。1 月 27 日 毛泽东在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提到了这一事件，说兰州林校 300 人闹得天翻地覆，无可奈何；捉了几十人，处理得简单了。毛泽东还告诫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说，必须避免使用武力，不要学习国民党的办法，除非真正是反革命暴乱，才可使用武力对付。

在 2 月 27 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从各地对闹事事件的处理中，总结出这么一条教训：“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转化现象，从而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毛泽东才号召全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一门科学来学习。他指出，要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第四，人民内部矛盾由非对抗转化为对抗，需要经历一个逐渐激化的过程。我们只有了解造成矛盾激化的条件，才能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转化现象。为此，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社会矛盾激化的条件。

毛泽东认为 酿成群众闹事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些人闹

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时还不能解决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大所提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那么，为什么一部分群众不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呢？这主要是由群众的局限性决定的。毛泽东指出：“应当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显然，要改善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避免群众闹事事件的发生，就需要尽量打破群众的局限性，尽量地扩大他们的政治眼光。为此，毛泽东提出，“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如果群众能够打破狭隘的眼界，在考虑个人利益同时能考虑到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领导者同群众的矛盾一般地也就不会趋向激化。

“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 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原因。他认为，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只要领导者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问题。毛泽东的这段话也可以从反面来理解，即如果发生了闹事事件，一般地都证明该地区或单位的领导机关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在确如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表明，每一起罢工请愿事

件，都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兰州林业学校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在学生们提出“回家路费”问题时，学校领导即能深入到学生之中，向他们讲清学校的实际困难，与他们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绝大多数学生就不会受谣言的鼓动而卷入罢课事件中去。可见，领导者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往往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

第五，按照“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的原则，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政策。

毛泽东认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就是使人民从思想认识上分清是非的问题。一般地说来，人民内部矛盾都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这种性质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在延安整风时曾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提出，要在整个的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民主方法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题目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又有着不同的内容，仅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还是不够的。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主要有：

在人民内部的经济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

在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在科学文化工作中，毛泽东仍然强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又强调说，“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

以及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在肃反问题上，采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在大规模建设事业中，“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在实践中解决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等等。

总之，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构成比较完整和科学的理论。在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提出并初步解决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特点、运动规律、解决办法等等问题，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的整风指示，就将这个讲话同后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起列为整风的指导性文献。

二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分赴各地，向党政领导干部阐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它首先涉及的是领导内容的根本变化，即由原来领导阶级斗争转变为领导和平建设；与此相联系，它又涉及领导方式、领导作风等方面的转变。可以说，毛

泽东在 1949 年所说的“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没有被所有的共产党人切身地体会到。因此，当毛泽东 2 月 27 日讲话的精神传达下去时，相当多数的共产党员感到突然，有些还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这就是说，作为一个执政的党，它的党员在解决国家政治生活主题方面的认识，却极不统一。必须扭转这种状况，否则，共产党就承担不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

为此，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分赴各地，向地方党政干部宣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一）毛泽东继续阐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向全党提出了整风任务。

3 月 6 日至 13 日，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的有党内外思想文化工作者 800 人左右。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毛泽东离京赴外地视察，于 3 月 18 日、19 日、20 日分别在济南、南京、上海等市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讲话中，着重阐述了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提出整风的任务，并规定了这次整风的方式和方针。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已提出整风任务，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设想，1957 年上半年发通知，向全党通告整风的“项目”，到下半年正式开始整风，中间隔几个月，以便犯错误的党员在此期间自觉地承认并改正错误；他希望通过这种小民主的办法，在正式整风的时候，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几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整风任务，他说，中央已做出决定，党内在 1957 年开始整风。毛泽东还明确提出，这次整风，党外人

士可以自由参加。这就是说，即将开始的整风，要打破以往的封闭形式，实行开门整风。

以开门的形式进行整风，这完全是由当时整风的主题所决定的。与以往历次整风不同，1957年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执政的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突破了党组织界限，与社会上各阶层人士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么，党的组织也就只有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接触中，才能够发现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开放性的主题必然要求一种开放的形式。

但是，形式虽然发生变化，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却没有变。在毛泽东看来，这次整风的基本方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⑦毛泽东用“和风细雨”来形容这次整风的方法，是很能反映这次整风主题的特色。

第二，毛泽东阐明了1957年整风的目的或目标。

毛泽东在3月份的几次讲话中，从不同的角度多次提到了整风的目标。他在3月12日的讲话中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

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⑧这段文字的最后几句话，无疑是毛泽东发动整风的一个主要动因。

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又从另一个角度谈到了整风的目的。他说，“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第二天，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又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⑨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怀念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而对于和平建设时期党内所出现的种种不良倾向又深感忧虑，黄炎培在1945年提到的“周期率”现象，会不会随着环境的根本变化，在共产党人身上重演呢？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采取什么办法，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使共产党人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呢？这是毛泽东建国后一直潜心思索的问题，甚至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包含着这样的良好愿望：希望通过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大革命”，重新锻造党，使它从根本上摆脱“周期率”的支配。

但在1957年的3月，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想法，即通过开门整风，扩展陕甘宁边区时期初步形成的“民主新路”，使执政的共产党在“内外夹攻”下永远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精神风貌。他在3月19日、20日的讲话提纲中，满怀信心地写道：“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切切实实地贯

彻于实践中的话，中国以后的历史就会改写。

第三，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即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首先，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⑩现在，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强调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⑪在3月19日、20日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又写道：“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联系到中国共产党正准备开门整风这一历史背景，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就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涵义：他希望消除前几年在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调动起知识分子议政、参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发挥出其他社会阶层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次，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基本的估计。一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泽东认为，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⑫而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社会，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大约只占四分之一、二、三。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作出了“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即“赞成和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⑬毛泽东作出的这两个不同方面的估计，成为中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依据。

最后，毛泽东从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了知识分子

的改造问题。他指出，知识分子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毛泽东还提出知识分子应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农民，他指出：“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做得好得多。”

⑭

（二）刘少奇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几个重要观点

1957年春，刘少奇赴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省市作调查研究。在此期间，他同各省市的负责人及一些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座谈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海市委党员干部大会等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

第一，刘少奇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⑮刘少奇的这个论断，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大多数人民内部矛盾，或直接地、或间接地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如前面提到的群众闹事事件，无一不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在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中，往往是领导者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领导者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时是如此，在领导者没有或较少有官僚主义作风时也是如此。刘少奇指出：“虽然有些矛盾问题不在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⑯在

开门整风即将全面展开之际，刘少奇在党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论断，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个论断，不仅对开门整风的必要性作了解释，而且也使党的干部作好了思想准备。

第二，刘少奇从经济方面对人民内部矛盾作了独到的分析，指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他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①⑦}刘少奇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事件，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群众闹事，几乎全都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而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易发生。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问题上，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干部是不满意的，“在乡村里面，合作社主任劳动日多记了一点，自己的亲戚朋友本来不该记劳动日，也记了几个。工厂里厂长、党委书记、青年团书记奖金分多了，此外还有把亲戚朋友送进厂等等。这样群众就反对，对这个分配关系就不满，而且最后就闹事。有很多闹事的基础是我们领导机关领导者自己打下的。”^{①⑧}刘少奇还进一步指出，有些单位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刘少奇认为，这些单位开始萌芽了一种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等级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①⑨}刘少奇提出的这个问题，对执政的共产党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下的等级制度”，不仅使领导者与群众脱离开来，造成一种离心离德现象，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剂腐蚀剂，它会严重地磨损领导干部的革命意志。刘少奇的这一思想与毛泽东是完全吻合的。就在刘少奇讲这番话的半年以前，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对这种等级制度表示过反感，他说：“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

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②0}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发起整风这一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三，刘少奇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即反革命分子往往会利用群众闹事事件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纠缠在一起。他说：“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励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②1}在这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当两类矛盾交叉在一起，一时不易分清时，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后再处理敌我矛盾。套用以后的一种流行说法，这一原则可以称为“以人民内部矛盾为纲”。如果违背这一原则，一看到有群众闹事，就抓躲在后面兴风作浪的反革命分子，往往容易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在一起，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以后的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三）周恩来阐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

为了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1957年4月23日，周恩来先期到达杭州。抵杭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即与浙江省委的负责人座谈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入地阐释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

第一，周恩来在讲话中首先阐释了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主观动机。毛泽东在 2 月 27 日讲话中曾说道：“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②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说是“语重心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周恩来指出，今天在座的干部极大多数是五十岁或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壮年人，放在你们肩膀上的责任，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象我们老一辈子在进行革命的时候犯那样多、那样严重的错误。要避免重复那样多、那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就需要在建设开始的时候认清现在的形势，拿稳了现在的方针，找到正确的方法。象苏联，十月革命以后 40 年了，如果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也快 30 年了，最近几年也检查出许多带原则性的错误。那么，对我们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是不是还要象搞革命那样，付那么多代价，走那么漫长的路，譬如 30 年，问题还没有解决，就很值得我们想一想了。周恩来的这一段话说明，毛泽东在 1957 年初向全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希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之际，共产党人就能认清形势，拿稳方针，掌握正确的方法，尽快地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第二，周恩来阐明，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是在新形势下采取的新方针。周恩来说，毛泽东并不是突然提出这一问题的，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已经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十大关系中，国内八大关系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只有第九个是敌我，而第十个国际，也只有与帝国主义是敌我。正是根据这种形势，八大得出结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主要是人民内部问题了，要团结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从那时起，近半年来客观存在的这个矛盾又有发展，由于我们工作得不好，使矛盾更加扩大，更加鼓出来了，所

以我们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当国内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的时候，国际形势又如何呢？周恩来认为，国际上总的趋势是趋向和缓，美国在目前还不愿意挑起世界大战，如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台湾问题（当解放军进攻沿海岛屿时，美国逼着蒋介石从大陈岛撤退）、匈牙利事件、中东事件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周恩来预言，我们有可能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他说，如果我们争取了 10 年 20 年，搞了三、四个五年计划，那么我国才可以说开始了工业化，也可以说开始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就可迫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心小下去，死下去。处在这样的一个国内外形势下，因此我们才提出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来团结六万万的人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在新形势下做出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

第三，周恩来论述了整风的必要性和特点。他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无阶级社会里，如果处理得好，通常不至于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但是，如果领导者不觉悟，不改进生产关系，维持落后的生产关系，那就会使生产力起来突破这个生产关系。周恩来警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有两个可能，如果领导者处理得不好，落后的生产关系不改变，你的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万分了，就有被人打倒的可能。显然，要避免这种可能性，共产党人必须实行正确的领导。而所谓正确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非就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鉴于当时党内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混乱认识，周恩来提出，首先必须把共产党搞通，使共产党本身能够认识这个问题、能够掌握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目的，所以要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在周恩来看来，这一次整风同延安整风

在基本方针方面是相同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从周恩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三方面的特点：首先，延安整风主要是整历史上的风，而这次整风则是整当前的风；其次，延安整风是采用轮流整风方式，允许干部离开工作专门进行整风，而这次整风则是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最后，延安整风主要在党内进行，而这次整风不单是共产党的事情，党外人士可以自愿参加，并由共产党的整风带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整风。

第四，周恩来论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面的问题。当时，有许多共产党员不理解“长期共存”的意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应该有一个党。周恩来批评了这种认识，说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他指出，“各民主党派联系群众的方面不同，可以听到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有利的。”他以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为例，说他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而共产党员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愿意说出来。周恩来指出，“我们是从一个复杂的阶级社会来的。认为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这样做必然会使我们的耳目闭塞起来。”“所以，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以共产党为核心、为领导，各党派团结合作，有什么不好？”^{②③}

长期共存的目的是为了互相监督。当时，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开门整风的问题，所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②④}当毛泽东在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问题后，大多数党外人士还是心存疑虑的，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之说，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在这次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特别是在中央整风指示发布的前夕，周恩来再次强调这一方针，显然是要打消各阶层人士的顾虑，为开门整风的全面展开做好准备。所以，周恩来把对民主党

派的监督问题——这应该是互相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轻轻带过，着重论述了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问题，指出：“重要的是共产党要承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只要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敢于揭露错误、批判错误、改正错误的人，那就不怕监督。越是监督我们，我们越是能进步。”^{②5}

（四）邓小平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957年4月上旬，邓小平到西安检查工作，并于4月8日在西安党内外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②6}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呢？邓小平着重指出了造成这种结果的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建设问题上搞贪新贪大的形式主义，这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邓小平认为，那种贪新贪大、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使我们吃了亏。他在来西安之前，曾到兰州一些大型骨干企业视察，兰州炼油厂和玉门油矿艰苦创业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以此为幞教育西安的干部说，“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现在已经感到搞多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了。”邓小平特别指出，前一阶段学生、工人闹事，与经济建设中的形式主义有很大关系，他说，我们“在花钱方面没有面对国家的现实，也没有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宣传也总是讲我们国家多么漂亮，多么阔气。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根据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方面的指导

思想：一是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二是面对群众的需要，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关于形式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讲到形式问题，形式也要，凡是能够注意的就应该注意，但不能陷入形式主义，不能因为讲形式而浪费国家的资金，不能因为讲形式使工作不利。”^{②7}

再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关起门来办事，摆脱人民群众的监督，这就一定会犯大错误。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如果我们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远的。”邓小平认为，对党和党员的监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这是最直接的；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②8}

邓小平的报告对党内外干部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中共西安市委于4月17日向陕西省委写了“关于邓小平同志报告后的一些反映”的报告，其中写道：“一般同志感到报告深刻、有力、明确、实际，真正打动了人心，启发性很大；批评得完全正确，听了很亲切、很舒服、很感动；对人的鼓舞教育作用很大，都赞不绝口地说：‘真解决问题’。有的说：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育，等于住了政治训练班。有的说：听了报告后‘方向明确了’，‘心底亮了’。”

总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57年的3、4月间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的重

点、角度各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聆听了这些讲话的党内外人士，都受到了极大的教育。这样，在毛泽东 2 月 27 日讲话之后，经过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一再阐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成为各阶层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

三 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了党外人士的热烈拥护。

但是，中央的方针在党内却遇到了阻力

（一）一次全面贯彻 2 月 27 日讲话精神的政协会议

3 月 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与以往几次政协会议相比，这次会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在开幕之前，没有提出重要的文件或重要的议题，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次会议为什么要打破先例呢？刚开始，政协委员们或多或少都有些疑问。待到他们出席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听了毛泽东 2 月 27 日讲话之后，心中才豁然开朗：这次会议没有事先规定中心议题，正是为了打破限制，畅所欲言地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委员们关心的问题方方面面，无所不包，但都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中心。正如大会执行主席宋庆龄在开幕词中所说的：“在大会的前几天，我们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我们在这次全体会议中，依照他的教导，就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充分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把我们的会议开好。”^{②9}大会的不寻常的措施显示了它的不寻常的意义，这一点，许多委员都有所察觉。一位委员在会议开幕前夕就说道：“大家深感这是一次很有分量的重要会议。”^{③0}

这次会议的不寻常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提出和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在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 2 月 27 日讲话的精神。这一点，从下面所列举的一些发言中就可以看

出来。

7 日下午 政协会议开始大会发言 到 19 日上午发言结束 共进行了 11 天。在此期间，先后在大会讨论中发言（包括书面发言）的委员和列席人员共有 406 人 发言稿 308 篇，计 80 余万字。从这些发言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政协委员们对毛泽东的讲话是衷心拥护的。例如，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王造时在发言中说：“这次我有机会能够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所作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关系的英明指示，特别感到欣幸。这些指示对于国家生活的日趋完善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和无限的鼓舞。”政协常委邵力子在发言中说：“这次大会，比上两次大会更充满欢欣鼓舞的气氛。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真理；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欧 11 国的报告 加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信心。这是使大家非常兴奋的主要因素。”原国民党十二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官陈书农列席了会议，他在大会上说：“前几天我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对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指示了解决的方法，语重心长，使人感动。当以明辨是非，认清敌我，作为我今后作事做人的指路牌。”^{③1}可以说，毛泽东在 2 月 27 日的讲话中，在全体政协委员中，赢得了完全一致的欢呼声。

许多政协委员在表示拥护毛泽东讲话的同时，也对如何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王造时说，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就得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本来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不过社会主义如果中了它的遗毒而不加以肃清，那么它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危害就特别来得大。他接着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鉴于此，为防微杜渐，特于去年宣布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虽然主要指的是党派间的关系，但我希望将它扩充到各人民团体、各机关、各企业、各农业合作社及各

基层组织中去。我体会，这是民主生活进一步的扩大。照发展到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个政策已起了相当好的作用，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有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象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其少。第二是了解事实，很难提出批评和建议。不经过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确，如果不明白问题的真相，而随便提意见，等于无的放矢，就有可能患片面的毛病。因此，我觉得在可能范围内，应该提供一些事实和资料，与群众协商讨论。如果在这些地方，不搞些小民主或者小小民主，那么等到闹成大民主就麻烦了。”^{③②}

全国人大常委张治中在大会上反映了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说：“据我们的接触，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党员与非党人士亲同一体，水乳交融，互相推重，互相帮助的很多，但是相反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有些党员同志有时态度生硬些，言语简单些，和非党人士谈不拢，因此不能了解别人。据各方反映，有些党员与非党人士生活都不在一块，甚至连游览娱乐都分开进行。几位党员同志在一起谈话，一位非党人士进来了，谈话也同样马上停止。有人形容这是‘一鸟投林，众鸟压声’。有人反映，有些有关会议不能参加，有关文件看不到，政策纲领传达不及时，使非党负责人员掌握无分寸，容易出漏洞，还有人说，‘现在党群关系有皮骨而无肉，许多知识分子想接近党而不得其门’，‘党群关系如隔一堵高墙’。”^{③③}

耐人寻味的是，在几个月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章罗同盟”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十分凑巧地在同一天（18日）下午发言，而且第二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并列作了详细报道。但

不管以后如何，此时的两个人没有结成“同盟”的任何迹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一直有很深的矛盾（例如 1952 年初罗隆基曾借章伯钧挪用交通部公款之事想迫使他在盟内公开检讨），还因为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有着明显的反差。章伯钧发言的中心是“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他主要对民主党派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而对共产党则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例如，在谈到民主党派的肃反问题时，章伯钧说，肃反工作对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但一些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尚没有参加肃反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民主党派应当自己负责选择适当时间，选择适当方式，准备工作条件来把肃反工作做完做好。在谈到领导关系问题时，章伯钧说，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地位平等，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矛盾。在谈到互相监督问题时，章伯钧说，自从这个问题在去年提出以后，共产党特别是各级统战部进行了自我检查和邀请各方人士进行批评，他们的工作有了不少的改善，对于团结工作有所裨益。但我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却未曾向共产党朋友要求给以批评，我们自己也好像没有进行自我检查。互相监督是一种人民内部日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活方式。要做到双方互相信赖，做到有职有权，实行双方互相监督是必要的。因此我希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采取主动，要求共产党朋友，选择各种适当方式，进行批评，把过去的某些不恰当的工作方式改变一下。③④

可以看出，章伯钧对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拥护和赞扬，似乎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相比之下，罗隆基的发言就显得有些尖锐了。罗隆基发言的主题是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他说：“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罗隆基还举了一些事例来说明党员方面的责任，

如“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士机会少。”罗隆基认为，尽管这种反映是少数，但也值得领导干部主观努力，进行检查，看行政工作中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罗隆基接着又谈到了共产党的“双百”方针，他说，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党员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对这两个口号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他们热心于尊统卫道的工作，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罗隆基说，“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最后，罗隆基还说，今天所进行的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观努力”了。③

罗隆基以知识分子代言人的身份发了上述一番议论，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56年1月，民盟中央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个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3月，全国政协设立临时性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小组，罗隆基为召集人之一。此后，他一直力争成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而取代原来限于研究社会知识分子失业问题的“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提出“知识分子的来信应一律交由委员会处理，而不能经过人民来信机构转请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罗隆基与党争夺

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根据就在于此。

也许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发言有着明显区别，所以，同是民盟副主席，同在一天下午发言，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就全文发表了章伯钧的发言，而罗隆基的发言则拖到了会议闭幕后的 23 日才发表。但无论如何，全文发表了这篇充满尖锐意见的发言，也是这次会议特点的一个反映。

委员们在发言中对某些问题的争辩，以及在某些问题上对以往禁区的触及，也是这次会议宽松、活跃气氛的体现。如对节制生育问题，邵力子在发言中主张取消对人工流产的限制，而一些女委员则坚决反对。再如，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一直认为是反动透顶，在这次会议上，医学家钟惠澜在书面发言中说，“但根据我很肤浅的认识（如有错误，请批评），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繁殖（或不加以控制的话）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加的观察是正确的。在经济和科学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工业农业生产的增加是算术级数的，而不是几何级数的那样快，也似乎不无理由。”^{③④}如果没有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舞，会议上没有形成一种宽松活跃的气氛，这种言论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公开发表出来的。

总之，这次会议既深入地讨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又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树立了榜样。它是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的第一次比较深入的实践，对开门整风政治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全国政协三次会议结束之后，各民主党派相继举行中央全会或工作会议，研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届二中全会，3月25日在北京开幕，30日闭幕；

九三学社四届二中全会，3月22日开幕，3月28日闭幕；

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3月26日开幕，4月4日闭幕；该党六届三中全会，4月8日开幕，4月12日闭幕；

中国民主同盟全国工作会议,3月27日在北京开幕,4月5日,闭幕;

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扩大),3月21日至23日在京举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3月22日在京举行;等等。

上述会议发扬了刚刚结束的政协会议的会风,在活泼热烈的气氛中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和政协会议的决议。在这些会议结束时,各民主党派或作出决议,或发出通知,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各民主党派的决议或通知,内容和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三个基本点却是共有的,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共产党和人民的批评;向共产党提出积极的批评和建议。在这三个基本点中,第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第二、三点则是“互相监督”的体现。例如,在后来整风运动中被评价为“作用特别恶劣”的农工民主党,在它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决议中就公开表明了这三个基本点。该决议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加重了该党的政治责任。为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决议要求该党成员必须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作用。决议还要求全体成员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积极地向共产党提出建议和批评,同时,也要主动地、虚心地向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农工民主党的监督。

民革在三届二中全会决议中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决议指出,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下,民革任重而道远。对于这一方针,民革成员要正确认识贯彻执行;忠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政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虚心接受共产

党的批评，并向共产党积极提出建议和批评。

民促于 4 月 9 日发出了“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精神的通知”，通知说，民促是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必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协助党和政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通知认为，学习毛泽东 2 月 27 日讲话是头等政治任务，号召成员们正确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除顾虑 畅所欲言 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互相帮助，加强团结。

在各民主党派中影响最大的民盟，在它的全国工作会议决议中，重申了民盟二大提出的“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决议指出，对盟员及所联系的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推动和协助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仍然是民盟长期的根本的政治任务。

中国各民主党派公开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这就为中共以开门形式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创造了条件。

（二）社会各阶层人士热烈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从 2 月 27 日到 3 月 1 日，在扩大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出席和列席会议的 1800 多人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随后，3 月 6 日至 20 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3 月 6 日至 13 日举行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都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上述会议结束后，返回各地的代表们通过各种途径，将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传遍了每个角落，立刻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快地，一个全民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形成了。

说到这次热潮，我们不能不提到发表在 3 月 24 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引起极大争议的文章，即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据费孝通后来讲，这篇文章从写成到发表，颇费了一番周折，待到发表，“早春确是已经过了时了”，^⑤就是说，在毛泽

东 2 月 27 日讲话后，又经过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推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在“收”的季节——在 1957 年 1 月前后，确有一股“收”的气氛笼罩着思想文化界——而发表在“放”的气候下，但它提出的问题仍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当时许多重要问题的争论都是由它而引发的。

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

一曰“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这说的是 1956 年以前一些老知识分子的心态。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之前，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是比较陌生的，当他们搞清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于是就有了一种寂寞之感，即“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实际上，这是对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批评。

二曰“再度解放”。“去年 1 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于是，就有人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这种转变了的心情。不难看出，费孝通对 1956 年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衷心拥护的。

三曰“乍寒乍暖，原是最难将息的季节”。这就是所谓的“早春天气”了。费孝通认为，1956 年以来，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腴腆，自信力不那么强，

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费孝通也有两句话：第一，“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意思是说，在党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一些单位的领导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口号，浮在表面，只要成果，而不作具体的指导，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因此，教师和科学人员感到力量不足，也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在这里，费孝通引用成都工学院一位教授的话表达了一般知识分子的要求，这就是有名的“一间房，二本书”。后来，这句话被歪曲为不问政治、埋头业务的“一间房，二本书”主义，而实际上，费孝通引用这句话，无非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保证知识分子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

第二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说的是百家争鸣方针贯彻的情况。下面是费孝通关于这方面情况的几段文字。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是很现实

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扯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的是一上来就担心。‘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 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当作典型的右派言论而受到严厉批判，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即使仅仅以它揭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从而为执政党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份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这篇文章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抹煞的。况且，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所起到的社会效果来看，它对于全国范围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热潮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对此我们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当然，这篇文章的作用完全是由它所发表的时间决定的。在政协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开始传播开来，在这个特殊时间发表的这篇文章，就客观地成为一场讨论的开始，随后，全国主要报刊上有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和报道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光明日报》），到4月中旬以后，一个全国范围讨论人民

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就形成了。

在这场讨论中 毛泽东 2 月 27 日的讲话受到了党外人士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的一致拥护。4 月 18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文冰(即潘文彬)写的《春天的感应》一文,其中写道:“在这些日子里,在知识分子中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包括诗人在内,关心自然的季序的迟早的,恐怕是很少吧。因为大家都在为另一个季节——思想的季节,为一篇报告所激动。这篇报告,成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生活的主题。大家在谈论,在为它而思索。有许多打算,有许多积蓄需要抒发,真是山泉滚滚,你无论走到哪里,团体集会,老友相逢,你都会听到这个话题……无论抒发怎样的意见,大家都是一致拥护毛主席的讲话,热情向往这个方针的贯彻实行。”

对毛泽东讲话的一致拥护,并不说明人们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已经统一了。实际上,在这一致之中又存在着许多不一致。

首先,对于所谓“早春”之说的看法存在着不一致。费孝通的文章发表后,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相当多的喝彩声,如他自己所说:“朋友们看了这篇文章,很多是同意我的,还有些人觉得没有说畅,有点遗憾。”^⑤许多人在讲到知识分子心态或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执行情况时,也借用“早春”这个说法,一时间,“早春”这个词就流行开来。但是,在讨论中,也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费孝通的说法。如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倪鹤笙撰文说:“尽管已是‘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时节了,但读了费孝通先生‘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仍不禁有丝丝凉意。费先生文章写得很含蓄,确乎反映了一部分老知识分子的心情。文中某些弦外之音,好像漠野上吹来一股冷风,乍听之下,颇使人有‘倒春寒’的感觉。然而,放眼看看周围景色,又觉得这股风和‘流水无情草自春’的真实境界有点不协调……”例如,关于费孝通所说的“看不到用

力的方向”，倪鹤笙说：“就我所接触到的很多大学教授，解放以来，业务情况已有很大的提高。有力无处使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有位搞动力的朋友告诉我：‘这几年我学的东西，比过去几十年学的要多的多’”。关于“一间房 两本书”，倪鹤笙也提出了问题：“如果把书架子和大社会结合在一起，是否更有现实意义呢？”^{③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李毅也不同意费孝通的看法，他在《从“放”想起》一文中写道：“当然，几年来在几次狂风暴雨的社会改革运动中，的确也使不少知识分子头昏眼花、气衰力弱，感到北风可畏、寒气逼人。但是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几次运动与其比作凛冽的严冬，不如说初春里几阵风雪。北风虽劲，但究竟已是初春天气，非不应阻杀生机，而且反有很大的消毒杀毒的作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春暖花开时节，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在讨论中好几位教授说：‘今后和风细雨的思想改造，很好，但是过去的几个大运动震动一下也是必要的。没有过去的震动，也很难有今天的和风细雨和百家争鸣。’作为一个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仔细想想，我欢迎和煦的南风，也感激过去的几阵北风。”^{④⑩}

显然，关于“早春天气”的争论已经涉及到了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这一重要问题。费孝通的文章，无疑反映了一部分老知识分子对于前几年思想改造工作的不满情绪。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要在4月6日发表一篇题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细读这篇社论，可以看出，这完全是按照近一个月前毛泽东在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写成的。但是毛泽东在那次讲话中讲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人民日报》为什么单单以此为题写了篇社论呢？答案可能有两个：一是面对即将涌起的“鸣”“放”大潮，这篇社论可以使知识分子冷静、全面地分析问题；二是它告诉读者，虽然它发表了费孝通的文章，但并不赞成文章的观点。

于是，由此带来了又一方面的不一致，即关于“鸣”和

“放”的争论。对于“鸣”和“放”，党外人士无一例外地表示拥护，但是对于如何“鸣”“放”即究竟是有限制有条件的鸣放，还是 unlimited 无条件的鸣放，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部分党外知识分子主张突破限制，全面放开，大鸣大放。如 4 月 10 日《光明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为“放”而争》的报道，介绍了几个民主党派的会议讨论鸣放方针的情况，其中写道：

“要放就应该大放。做到无所不‘放’才能真正放得开。”这是一种论调。

什么叫大放？指的是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具体的意见是：“学术的讨论，当然是无所不能谈。政策问题，除了军事、外交之外，其他有关文教、财经、政法等政策，都是可以在报刊上争论的。事实上不是已经有很多的政策问题，在报刊上争论吗？”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还补充说：“不过，政策的讨论和学术的讨论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在辩论的过程中，政策还必须执行，不能因有不同的意见而中止。”

在《争鸣》月刊主办的“如何展开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座谈会上，经济学家沈志远教授发言说，他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对于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的体会是一个‘放’字。就是大胆放手和全面放开。”他认为，“放”有两个重大的意义：第一，把一切好的、丑的；新的、旧的；光明的、阴暗的，都摆了出来，揭露其间的矛盾，以便大家正视这些矛盾，进行分析、研究，通过争论，来辩明是非，解决矛盾，从而使人们学会选择，锻炼人们的思想意识，培养正确而敏锐的识别能力。第二，科学的真理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长期斗争中逐渐形成、壮大和发展起来的，只有通过百家争鸣，而不是一家独鸣，不是自说自语，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自由地鸣起来，真正的科学真理才会从实际斗争的考验中获得阐明而被人们所掌握。④①

但是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争鸣》月刊的座谈

会上，邓初民教授就认为“放中有收”，后来他解释说，“放”与“收”是两个对立面，它是对立的，它同时又是统一的。毛主席说有鲜花，也有毒草，农民每年都要锄草，下一道命令禁止毒草不准长，事实上是不行的，你锄就是了。毛主席经常指示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方面，我们必须全面地看问题。所以我说，有人认为毛主席只主张“放”，单说到放的一面，而根本抛弃了“收”的一面，这种体会还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收”究竟是指什么呢？邓初民解释说，批评、斗争都是放，不是收，但它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科学真理，起码是接近科学真理，而使人们对于这一科学真理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和意见，这也就是“收”了，不过这种“收”是从“放”来的。邓初民对于“放”和“收”的这种辩证认识，是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但由于当时正处在“放”的浪头，邓初民的一家之言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即使邓初民本人，当看到《光明日报》以“邓初民认为‘放，中有‘收，’”的小标题报道他的发言之后，也不得不站出来解释几句：他并不反对“放”。^{④2}

在那次座谈会上 邓初民还说道：“我曾对‘百家争鸣’划了四个圈圈，一个是百家争鸣要有领导，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二个是百家争鸣要有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三个是百家争鸣要有范围，即在人民内部，不能让敌人参加，四个是百家争鸣要有标准，即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也是争鸣的标准。”^{④3}后来邓初民又解释说，我划的四个圈圈，实质上只有一个圈圈——这就是不能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对立起来。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百家争鸣”的方向，就决不会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百家争鸣”的范围就决不会让敌人乱说乱动，而是我们自己同志式的批评、互助；“百家争鸣”的标准，就决不会是作“概念游戏”搞“烦琐哲学”钻字句的牛角尖 而是要使主观正

确地反映客观。^④邓初民的上述看法，也是非常宝贵的。

还有一种看法，似乎介于上述两种认识之间。4月2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张申府的文章《发扬五四的精神：“放”》就有如下的说法：

“由于以上所说对于真理的信心等等，我便觉着对于人民内部的百家争鸣，最好不提什么限制。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不但在我们的国家，就在今日整个的世界，也是当然的，而且是必然的。但在争鸣之初，我却觉着也不必把这领导问题总挂在嘴上。老实说，许多人，许多专家也同样，关于这些主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学；但你一开头，也就是在大家要鸣的一开头，就一定要限定接受这些主义的领导，那就不是一棍子打回去，也必然徒流于形式，对事情全无好处。

“所以，我们既然主张放，那么，在我们人民内部，不拘谁，要鸣就鸣罢！有可鸣就鸣罢！双方都不需要再有什么怕，什么顾虑。当然，即已到了今天，大家一定都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自己是在什么时代。”

这当然是主张无限制的放了。但是，在文章的结尾，张申府又写道：

“最后，我特别愿意重复说的也就是：我们争鸣，一定要根据宪法；根据宪法，我们一定也就都可以争鸣，而且可以获得争鸣的机会与条件；再则，不论什么放言高论，但令根据宪法，但令不违背宪法，便也都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只是不知道，张申府如何将这一段议论与“不提什么限制”统一起来？他似乎忘了，根据宪法，就起码有了“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这两条限制。所以，突破一切限制的鸣放，最终也必然要突破宪法，反之，要根据宪法，鸣放自然也就有了限制。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1月份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人们对于毛泽东讲话精神的认识而展开的，这同5月份的“鸣、放”局面是很不相同的。但是，随着讨论的普及与深入，对于执政党的一些错误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例如，4月中旬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和检查政府工作，在讨论中，代表和委员们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以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黄绍竑在讨论中谈到有些地方有虚报农业产量的情况，他请农业部注意这个问题。他在发言中还提出，为了肃清刑事犯罪现象，对一部分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青年团员的犯罪，应该严肃及早处理，不要拖拖拉拉。^{④5}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于教育部门的官僚主义也提出了批评。再如，4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集部分上海作家举行座谈会，在会上，作家巴金和靳以对中共地方党委对文艺工作重视不够提出了批评。巴金说，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研究，不关心，发生问题光批评。靳以说，甚至直接负责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和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很少。翻译家傅雷说，解放前在地下时期，党和非党同志不但没有隔阂，而且非常亲切知心。可是解放以后，党群关系反不及以前了。有些党员同志不大容易亲近，在党和非党同志之间有一条有形无形的鸿沟。^{④6}

可以看出，到4月下旬，各界人士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热潮，实际上已经初步造成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局面。

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客观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是有所了解和分析的。在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4月份的讨论热潮，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对以后形势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毛泽东2月27日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界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大为高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开门整风提供了必需的条件；另一方面，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新型的民主生活方面，还有待于进

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千百年来，除了春秋时代有过一段短暂的“百家争鸣”局面而外，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来都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局面，中国知识界没有形成争鸣的传统和习惯。而到了近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又多受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影响。因此，当执政的共产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对于如何争鸣，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时还找不到头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启动和引导他们争鸣，就显得特别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整风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一个关键。

（三）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存在的消极抵触情绪

党外人士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分歧，是产生在对毛泽东讲话精神一致拥护这一前提之下的，但在党内却恰恰相反，中央的方针一开始就在党内遇到了阻力。

北京市委遵照中央 4 月 19 日关于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指示，于 5 月 4 日向中央写了份报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党内的思想状况。报告写道：

党内思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自从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一直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报告以前，我们对这一问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市委有的负责同志对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有同感。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做了报告以后，开始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还认识不够，没有及时认真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不深刻的。经过宣传会议期间的讨论，学习了中央关于正确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我国由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在马列主义理论上和我国建

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中都有重大意义。中央 4 月 19 日关于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指示，对我们又起了很大的鞭策作用。连日来，我们和各级党组织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检查和讨论。在讨论检查过程中，许多同志的思想逐渐开阔了，党内拥护中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方针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当前主要的基本情况。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仍然有怀疑和顾虑，仍然认为应该有条件有限制地放；应该“适可而止”，要防止副作用。有的同志说：虽然放手发扬民主能够克服官僚主义，但是会产生无政府主义。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如厂长、校长、经理等，人民闹起事来，他们首当其冲，有许多问题又是由于上级的官僚主义或某些规章制度不合理所造成，不是他们自己的权限范围以内所能够解决的，因此，他们的顾虑就更多一些。不少人认为“从此天下多事”，工作不太好做了。有的感到中央这样大张旗鼓地往下贯彻，自己有点措手不及。有的则表示：实在没办法时，只好摘掉“乌纱帽”和群众一块闹事。

总的看来，在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以后，党内思想有很大提高，多数同志拥护毛主席报告中提出的方针，但是，一部分同志还有怀疑和顾虑，少数同志还有抵触情绪，特别是遇到具体问题时候，实际上怀疑顾虑或还很大。

湖南省委的报告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这份报告写道：

在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时，有一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经过弄清情况和反复讨论后，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但是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更确切些说，表现为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的论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有责任，人民群众也有责任”，认为人民群众的“闹事”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

公平的。在讨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性质区别和对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处理方法时，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应当用非对抗性的办法进行处理，但是，实际上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往往着重于敌人的挑拨煽动活动的追查。还有些同志强调某些人民群众的“闹事”是属于“无理取闹”，因此主张在“说服无效”时，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正因为相当部分的党内中下层干部和一般党员对毛泽东讲话的精神难以理解，与中央的方针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因此，一些地方党组织对中央的方针也就采取了消极抵触的态度，其主要表现就是对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一再地拖延、观望，以至于引起群众的不满。这与各民主党派迅速传达和讨论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情况恰成对照。如《光明日报》4月20日西安专电说：“到今天为止，在西安十三所高等学校中，绝大部分学校尚未向全体教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许多教师到处打听何时传达，迫切希望及早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指示。”一些大学校长说，这个讲话要不要传达，如何传达，是谈个精神，还是谈个要点，我们还不了解，也没有接到指示。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长承认说，西安的传达是比其他地方迟了一步，现正在草拟传达提纲，准备布置传达。《光明日报》23日西安专电又说，此间人士认为，西安知识界虽欣欣欲动，但顾虑尚多，离畅所欲言尚有距离。西安动力学院一位教师用两句话来比喻这种情况：北京春暖花开，西安春寒料峭。4月22日《陕西日报》评述说，放之不足，鸣的不够，主要是有些人包括某些文化学术部门的领导人怕放起来鸣起来会搞乱，难领导，贯彻鸣放不坚决，甚至有压制反面意见的现象。有些领导人听到戏剧界对领导工作的缺点提出批评，就认为不得了，说成是“有意挑拨党政和艺人的关系”，结果使有些人有意见不敢畅所欲言。

西安的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春天的感应》一文写道，西南有一位大学教授来到北京，参

加了一个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一些教授各抒己见，谈了一些问题。在北京的知识界看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会，可是这位来自西南地区的教授却感慨系之。说他在西南不但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会。可见地方的风气还有待开放。文章认为，关键在于一层一层领导，地方的领导应当不是等待春风，而是起积极作用，蔚成风气。这话是不错的，如果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对党的方针采取消极的态度，党的方针就不可能真正贯彻下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才提出：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

以上情况说明，当执政的共产党面对一个新的政治目标的时候，它的内部却存在着一股起着消极作用的惰性力量。这股力量，在整风运动发动之时，是贯彻中央鸣放方针的主要障碍；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当深入展开的整风运动出现一些波折时，它又成为中央改变整风运动正确主题的一种推动力。

四中共中央调整了整风布署，决定立即在全党展开整风运动

（一）中央整风部署的变化

在 1957 年 4 月上旬之前，关于何时开展整风，中共中央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1957 年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正式整风。几个月后，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这个意见，说中央已作出决定，在今年（1957 年）内开展整风。二是在 1957 年 4 月上旬，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中提出的 1957 年进行准备工作，同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 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对这个意见表示赞同。他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文件，并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通知中说：“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

案发给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行(后)正式施行。”

从上述考虑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整风运动是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的。这种慎重态度，固然与缺乏经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毛泽东的这样一个想法：经过从容的准备工作，“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④7}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与公开揭露党的错误的主张并不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多次表明，共产党人既不怕公开暴露自己的错误，也不怕帝国主义者利用我们的失误。在3月5日的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表明了这种信念：“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困难和错误，就幸灾乐祸，就妄想利用这些困难和错误来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将是徒劳的。通过不断地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不会削弱，而且一定会更加巩固和兴盛。”^{④8}正是基于这种信心，毛泽东才在3月12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开门整风的方针。但是，毛泽东是很清楚战略问题与战术问题之间的区别的。他显然从苏联公开揭露斯大林错误这件事中汲取了教训：公开暴露出过多过于严重的错误，毕竟在自己阵营内造成了太大的震动，而这种震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是极为不利的。既然我们不能把错误掩盖起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公开揭露之前就尽可能多地克服这些错误。从这一想法出发，毛泽东一直主张，整风要有一个准备阶段，要给犯错误的同志一个自觉改正错误的机会，不搞“不教而诛”。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并未付诸实践。4月9日，毛泽东在那个整风决定草案的批示中还指示彭真，说：“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但实际上这个文件及毛泽东起草的通知迟迟没有发下去。到了4月27日，中央发出了重新拟定的整风指示，宣布立即在全党

展开整风运动。

这里显然存在着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央调整了原定的部署？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作出解释，但是，从一些文件和报道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4月25日，即整风指示发出的前两天，周恩来在杭州笕桥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在交谈时，苏联客人问：“听说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周恩来说：“是的，昨天我还在这里向二千多个党内外干部作过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的整风报告。我们现在整风是反对三个主义，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④9}在这里，周恩来把他在24日所作的报告称为“新的整风报告”，并且明确同意“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反对官僚主义”的说法，这就表明了，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在中央没有发出任何决定或指示之前，整风的局面就已经形成了。关于这一点，4月27日的整风指示说得也很明白：“这两个报告（指毛泽东2月27日讲话和3月12日讲话）的传达引起了党内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根据上述两个材料，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推论：全国范围的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使中央认识到，开门整风的局势已经客观地形成了，这种局势把原来的整风计划抛到了后面。如果中央不站在人民群众的前面，主动地去把握和引导这种局势，那就必然会丧失开门整风的最佳时机，最终不免陷入被动。这就是中央改变原定整风计划的原因。

但是中央还是向各地区、各部门打了招呼。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向各省、部级单位提出了下面的要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

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问题提得如此之多、如此之细，这在中央文件中还是不多见的。那么，毛泽东和中央要各地各部门报这些材料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其中包含着掌握实际情况，以便作为制定整风的方针政策的依据这一方面的考虑，但又不全在于此。因为中央要各地各部门 15 天报来材料（实际上各地各部门也大多在 5 月 4 日后送来了报告），而整风的最重要的文件却在 8 天之后即发出，说明中央对下面的情况基本上是掌握的。因此，从这些具有明显倾向性又十分具体的问题中，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和中央是在向各地各部门打招呼，希望他们做好思想准备，以正确的态度迎接新形势的到来。此外，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对传达毛泽东讲话精神这件事采取拖延观望态度，中央也明确表示不满，希

望通过这些具体问题的提出，使这些领导干部能够了解中央的既定方针，从而警觉起来，迅速纠正错误。

总之，从主观愿望上来讲，毛泽东和中央希望在全党都能作好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再发起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样，党和国家都不会产生太大的震动。但是，形势的迅速发展使中央不得不提前发起整风运动，而缺少准备阶段所造成的后果，不久就显示出来了。

（二）“4·27”指示的制定及其突出贡献

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央在4月上旬草拟的《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和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知没有下发。随后，中央重新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同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向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通告说，中央日内即将发出两个文件，即整风指示和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毛泽东在指出整风运动的主题和内容之后，特别强调了后一文件的内容，他写道：“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下面我们还会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所表述的思想，在“4·27”指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4月28日毛泽东对整风指示又作了修改并批示“准备五

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文。

整风指示有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这个文件指出了整风的必要性。文件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近几年来,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

第二,这个文件指明了整风运动的主题,以及围绕这一主题的各项具体内容。文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思想的指导是毛泽东2月27日讲话和3月12日讲话,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围绕着这一主题,文件分别指出了领导干部、一般党员以及知识分子党员检查的内容和重点。

第三,这个文件规定了这次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文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属于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在开展批评时,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文件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第四,文件提出了领导干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办法,即各级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在修改这一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又加写了这样一句话:“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地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文件指出,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第五，文件在最后提出了各部门整风的一般步骤和一些必须注意的原则问题。文件指出，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份文件的独创性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非党群众可以自由、自愿地参加执政党的整风；二是党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这两个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所获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即解决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必须从突破双方的局限性入手。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着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恰恰相反，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而之所以发生矛盾，是因为双方都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性。中央于3月25日发出的《关于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即对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作了深刻的说明。文件指出：“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就是说，双方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限制了他们的眼光，使他们都带有自己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是这两部分人之间必然要发

生矛盾的决定因素。4月24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领导者，他的长处是容易看到全面，容易看到远的事情，但是他容易忽视的就是最具体的事情，常常脱离眼前的事情、鼻子底下的事情，忽视了局部的事情。人民，因为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从事最基本的劳动，是带有局部性的，比如教书，只教这门课，从事科学研究，只研究这一门自然科学，因此，他的长处就是对实际的、局部的、眼前的事情看得清楚，它的缺点是不大容易想到全面的、远大的事情。所以，各有一方面的长处和短处。显然，从这些论述中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从根本上解决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冲突，就必须使双方都打破自己的局限性。

首先要突破群众的局限性就必须使群众“上升”就象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那样。这种“上升”，既包括文化、觉悟等方面的素质，也包括了实际的政治地位。那么，怎样才能使群众上升呢？其基本途径只能是：在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建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把他们吸收到国家各项事业的管理活动中来，让他们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者官僚主义的根，往往都是扎在人民群众的愚昧落后这块土壤之中，因此，要铲除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清除这块土壤。中国共产党整风的大门向群众敞开，其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与人民群众的“上升”相适应，领导者要打破自己的局限性，就必须“下降”。实际上，群众的“上升”必然会给领导者造成一种社会压力，迫使他们寻找“下降”的途径。当然，这种“下降”不包括任何素质上的因素，而仅仅是指领导者的活动范围和实际地位，即领导者必须寻找一个途径，使自己走出机关而深入于群众之中，由于生产活动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就成为领导者把自己“下降”为人民群众中的普遍一员，从而使自己了解群众也使群众了解自己

的最佳途径。

这种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双向交流，就成为整风指示所包含的最深刻的思想。尽管这一思想由于后来的挫折而没有真正得以贯彻，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这一思想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注释：

① 毛泽东讲话内容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63——402 页，下面引文不再注明出处。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336 页。

同上，下卷第 445 页。

同上，第 396 页。

同上，第 590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35 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10 页。

⑧ 同上，第 411、412 页。

⑨ 同上，第 419、420 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8 页。

⑪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06 页。

⑫ 同上，第 404 页。

⑬ 同上，第 405、406 页。

⑭ 同上，第 407、409 页。

⑮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03 页。

⑯ 同上。

⑰ 同上，第 304 页。

⑱ 同上。

⑲ 同上，第 305 页。

⑳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05 页。

㉑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05 页。

㉒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01 页。

㉓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349、350 页。

- ②4 同上 第 350 页。
- ②5 同上 第 351 页。
- ②6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第 251 页。
- ②7 同上 第 253——256 页。
- ②8 同上 第 258、259 页。
- ②9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6 日。
- ③0 《光明日报》1957 年 3 月 22 日。
- ③1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12 日、20 日。
- ③2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20 日。
- ③3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9 日。
- ③4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19 日。
- ③5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23 日。
- ③6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17 日。
- ③7 《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31 日。
- ③8 同上。
- ③9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27 日。
- ④0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24 日。
- ④1 《光明日报》1957 年 4 月 21 日。
- ④2 《光明日报》1957 年 4 月 26 日。
- ④3 《光明日报》1957 年 4 月 21 日。
- ④4 《光明日报》1957 年 4 月 26 日。
- ④5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18 日。
- ④6 《光明日报》1957 年 4 月 28 日。
- ④7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8 页。
- ④8 《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6 日。
- ④9 《人民日报》1957 年 4 月 26 日。

第三章 毛泽东规定了整风的主题。他设想：执政党的开门整风将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在 1957 年的 5 月和 6 月初，这一设想初步实现了

一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畅谈中共整风问题

（一）毛泽东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不发动党外人士对执政党和政府工作展开批评，如果不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压力，共产党的整风就不易收到效果。因此，毛泽东主张，这次整风要把门打开，欢迎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

但是，在中共中央发布“4·27”指示时，许多党外人士心中还是很有顾虑的。当时社会学家李景汉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共产党今天是个执政党，他们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这是当然的事。同时，他们一向又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人，这无论从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改造者、执政者来接受被整人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古今中外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做呢？”说共产党一向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当然不失偏颇，但从这

番话中仍可以看出这样一层意思：以往的执政者没有主动接受批评，而共产党这样做了，这固然说明了共产党的伟大；但是，面对这种“反常的事”，一些人心中也不免要嘀咕：共产党果真是诚心的吗？或者如某些人所断言的，是诱人陷入罗网的“圈套”？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党外人士真正发动起来，首先就得打破他们的顾虑。为此，在“4·27”指示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召集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最高国务会议。时间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地点是在充满节日喜庆气氛的天安门城楼上，形式是融洽轻松的座谈会，而到会的除了毛泽东约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可以说中共主要领导人全部到场了。这一切说明，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引起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极大重视，并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安排。显然，在五一节前夕的天安门城楼上，中共主要领导人物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欢聚一堂，畅谈中共的整风问题，必然会给与会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毛泽东在谈话中，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并希望他们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毛泽东肯定了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尤其是对高教部和教育部的批评意见，他说，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毛泽东在这里再次表述了他的“内外夹攻”的思想，说要找出办法，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

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这样的会，在报上登一下，就可打破沉闷的空气。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妥，他们在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中共缺点错误的批评，以使中共整风切实收到成效。

在这次座谈会上 唯一使一些党外人士感到突然和不安的 是毛泽东在最后通告的消息，即他不准备继续担任下一届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并嘱咐与会人士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说毛泽东的这个打算，“我们期期以为未可”。不管党外人士对此事抱什么样的态度，象这样的国家大事，搞不好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震动，而事先也让党外人士预闻，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当然更能表明中共的诚意了。

这一年的五一节也很有特点，中共整风成为宣传报道和庆祝活动的主要话题。5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同时报道了中央国家机关开始整风的消息。该报第7版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为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编者按，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显然，毛泽东通过这篇文章和这一按语，再次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欢迎各界人士对中共的缺点错误展开批判。

在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中，中共领导人也一再地提起整风这一话题。4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招待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一千多位来宾。在祝酒词中，周恩来说道：

“在你们访问我国期间，你们将会看到新中国的人民这几年来的和平劳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注意解决在我们前进道路上所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也决心要继续向各国人民吸取智慧和经验。我们希望，在座的各国同志和朋友将能够就你们的所见所闻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提出意见，使我们能够得到教益。”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我们正在整风，请你们多提意见，帮助我们。”让各国来宾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在建国以来的历次庆祝活动中可能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共实行开门整风的消息。五一节这一天，首都 50 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游行，彭真在游行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共中央认为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就必须同时改造自己，因此，中共中央已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他还说，中共中央正在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这个办法实行起来，就可以在实际生活中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整风指示发布的最初一段时期内，对于邀请党外各阶层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中共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展开彻底的批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是诚心诚意的，而且，为了真正地把各阶层人士发动起来，中共中央也作了最大的努力。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努力确实收到了成效。在五一节期间，中央整风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并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当时年近 80 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叶恭绰在兴头上写了一首《1957 年劳动节同庆歌》，最后的四句倒是很能代表大部分党外

人士的心情和认识：

庆祝同时即整风，春温秋肃本同功。

可知惕励忧勤意，即寓衢歌巷舞中。

二 毛泽东向党的各级干部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这种社会压力，整风就不易收效

前面提到，4月19日中央发出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实际上已经向各部门、各地区党委传达了整风的消息。中央在这个指示中布置的检查任务，与几天后发出的整风指示所布置的整风任务，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可以使各部门、各地区党委在正进行的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很顺利很迅速地转入到实际的整风运动之中。

各部门、各地区一般是在4月30日接到中央的整风指示的。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共陕西省委等单位闻风而动，4月30日当天即开会讨论中央整风指示，并初步拟定了整风计划。五一节后的两三天时间里，河北、广东、江苏、江西、山东、青海、山西、浙江、黑龙江、辽宁、河南等省委，以及国家机关20多个部委的党组和机关党委，也都分别举行了会议，决定立即开始整风，并确定了整风运动的步骤和方法。这样，在5月份的最初几天里，各部门、各地区的整风运动就基本上铺开了。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开门整风，他说：“毛泽东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以便有助于党的整风 这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还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正因为开门整风没有过先例，所以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委负责人看来，这一方法远不如以往惯用

的经验和方法得心应手。因此，一些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初的整风计划，基本上沿用了过去的经验和办法，而没有反映出中央开门的精神。例如，中共河北省委在检查保定市委和保定地委的整风部署时，发现有些地（市）委的领导干部对这次整风的主题和目的还不很明确，有的认为这次整风和以往的整风没有什么不同，因而机械地搬用过去“三反”、“五反”运动时的经验，把整风运动的步骤定为学习文件、个人反省、小组通过；对整风和工作两不误，也简单地理解为既整了风，又不耽误日常工作，忽视了通过整风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⑥中共江西省委将整风学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文件，第二阶段检查工作、思想和作风，第三阶段建立合理的制度，全面改进工作。^⑦其中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也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以说，各部门各地区的整风运动虽然已经基本铺开，但与中央的要求还差一段距离。

在执政条件下，没有党外人士的批评，共产党的整风就不易收到效果。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已经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但是，如果实际工作部门、地方党委的领导干部对此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中央开门整风的方针就难以真正贯彻下去。因此，在整风指示发布后，毛泽东和中央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了中共的整风问题，他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和党是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针对一些地方党委对开门整风方针贯彻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在5月4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 and 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

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毛泽东在指示中还向全党通报说，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商妥，他们暂时不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对我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毛泽东再次强调，没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种社会压力，整风就不易收效。对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形式，毛泽东提出，可以让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

中央5月4日指示对于各部门、各地区党组织的开门整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之后，广泛征求各方批评意见，成为整风计划的重点内容。5月7日中共高教部党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整风问题，会上许多人提出，高教部不能关门整风，而要面向全国，欢迎教育界人士和各个高等院校对高教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会议还肯定了一些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主动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的作法。^⑧同日中共上海市委邀请上海市作家座谈，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在会上说，上海作家协会的问题，主要是党内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因而造成党外的负责同志工作的困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今后我们党内要整风，把问题摊开来谈，请党外同志来开会，多帮助我们，多对党员提意见，内外夹攻，上下夹攻，摧毁这道墙，填平这条沟。^⑨5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布置整风运动。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进行整风的时候，首先要充分听取同级、下级同志和党外朋友们的意见，这样才可能把风

整好。针对一些党员认为“和风细雨”会造成“无风无雨”的现象这种看法，彭真指出，现在已经是“满城风雨”了，无风无雨的说法是还在那里睡觉，没有很好地听听各方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当你一接触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那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不能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了，就会暴露出来、受到批评了。⑪中共福建省委于5月8日举行全体会议，也着重强调了开门整风的问题。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会上说，人民群众对我们整风都很兴奋，愿意提出批评帮助我们整风。问题关键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听不进批评，不主动去征求批评。叶飞号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把官架子放下来，戒除虚骄之气，主动去征求各方的批评意见，创造有利于整风的条件，不要关起门来整风。⑫

中央5月4日指示发布之后，各部门、各地区党组织普遍开始重视开门整风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毛泽东一直想实现这样一个政治目标，即在执政党周围造成一个可以自由展开批评的宽松的环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起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党外人士具有批评执政党的勇气和觉悟。二是执政党的各级组织能够主动提倡和接受这种批评。现在，在整风发起的初期，在毛泽东的号召或督促下，我们的社会开始朝着形成这两个条件的方向逐步迈进。

三 对于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央既积极又谨慎，既想尽快地把他们广泛地发动起来，又想把这种发动纳入一定的轨道

在三、四月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关于如何鸣放，就已经在引起了争论。当时，有不少人主张，要放，就要突破一切限

制，什么样的言论都可以自由发表；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放”，他们主张有限制、有指导的放，如邓初民就曾对“放”划了四个圈圈。此外，在党内还存在着一股反对放的舆论，一些人对鸣放忧心忡忡，担心放会带来乱，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从此天下多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究竟持什么态度呢？

毫无疑问，在整风指示发布前，主要问题不是放得过开，而是放得不够，当时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能够自由开展批评的气氛和环境。而妨碍放的主要阻力则来自党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十分强调放的问题，他们在许多场合都指出过，现在不存在“收”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地放。那么，这是不是说，毛泽东和中央同意某些人的意见，主张毫无限制的“放”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曾多次对“鸣”“放”作出了限制。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他指出，“只有反革命言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⑫毛泽东在这里规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对此陆定一在5月26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人民内部是一致的又是不一致的。我国已经有了宪法，遵守宪法是人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内部的一致性。这就是说，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都应该一致的。”^⑬显然，这种一致性是“鸣”“放”的前提和基础。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

制度 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哪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⑭毛泽东此时提到的“大民主”，同后来关于鸣放要突破一切限制的主张，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他对于如何开展鸣放的基本态度。

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针对一些人只准放香花，不准放毒草的主张，毛泽东曾套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说，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但是，对于二者的“齐放”毛泽东并不就是一视同仁的。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统一的一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也就是说，像毒草一类错误的言论，虽然允许放出来，但决不能让它们泛滥开来。毛泽东主张，“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他还说，“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

⑮由此可见毛泽东倡导的“齐放”与“争鸣”本身就包含着积极的思想斗争。

对“鸣”“放”问题作出最为明确和具体的限制的，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当然，这六条政治标准在2月27日讲话中并没有出现，而是在5月25日毛泽东修改讲话稿时加写的。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完全是从毛泽东以往的一贯思想中引伸出来的，这一点却不容否认。即使在讲话原稿中，毛泽东也明确说过，民主是有领导

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这实际上也是对“鸣”“放”的限制。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发布以后，“鸣”“放”就围绕着帮助共产党整风而展开了。在整风指示发布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央对于“鸣”“放”问题的引导和限制，是通过《人民日报》有关整风的社论而表述出来的。在5月上旬，《人民日报》发表的整风社论主要有：《为什么要整风》（5月2日）《同群众共甘苦》（5月3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5月7日）等。

这些社论在整风的目标上对“鸣”“放”作了引导和限制。《为什么要整风》这篇社论指出了整风的目标，社论说：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不但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而且要使全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新的社会形势获得自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规律获得自觉，要使全党进一步加强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发扬同群众同甘苦的优良传统，要在全中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概括地说，整风就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一目标是对“鸣”“放”的最根本的限制，凡是违背这一目标的鸣放，都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按照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如果违背这一目标的鸣放一旦形成了一股风，共产党人势必要将其打下去，当然这种“打下去”，是指有说服力的说理斗争。

同时，《人民日报》社论在整风方针方法上也对“鸣”“放”作了引导和限制。当时，有许多党外人士，甚至有一部分共产党员，

主张用所谓的“大民主”这种极端的方法来整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种主张完全背离了整风运动的性质和目的。《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这篇社论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提高思想觉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尤其需要着重依靠教育说服的方法，尤其需要限制使用组织处分的方法。因此，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只开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或者采取同志间个别谈心的方式。每个人都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这一切，也就是所谓和风细雨的方法的内容。……反之，如果采取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的方式，如果许可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那末，即令批评者的目的和动机是好的，也常常不能把道理说得很充分、很清楚，并且非常容易产生过火的行动，以至违反提高觉悟、治病救人的原则。”显然，这段话对于结合整风而展开的鸣放是又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限制：整风运动中的鸣放，必须是和风细雨的鸣放。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鸣放问题的引导和限制说明，在整风指示发布前后，对于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件事，毛泽东和中央既积极又谨慎，既想尽快地把他们广泛地发动起来，又想把这种发动纳入一定的轨道。这种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对于如何将党外人士的鸣放有效地纳入一定的轨道，则还缺乏一些具体可行的措施。

四 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自由批判的环境初步形成了

在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执政党的开门整风将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整风运动正式发动之后，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之下，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初步实现了。当时自由批判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各种鸣放座谈会，二是报刊争鸣文章及采访报道，三是以整顿三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一）各种鸣放座谈会

在开门整风运动中，座谈会是党外各界人士对执政党各项工作展开批评的主要形式。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座谈会。

1. 《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九大城市召集的座谈会。

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发布之后，当时作为民主党派中央报刊的《光明日报》积极行动。该报编辑部拟定了在武汉、西安、上海、沈阳、南京、广州、长春、青岛、重庆、成都等十一座大城市邀请各地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的计划，中心议题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改善党群关系。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为召开这些座谈会，还特地拟定了一个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座谈会的目的和要求一是集中反映各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见和要求；二是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通过对某些典型问题或典型事件的揭发和讨论，提出各地对解决当前存在着的各种主要矛盾的意见；三是希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根据“放”的精神，彻底敞开，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和建议。从5月4日到23日，座谈会分别在除重庆、成都外的九大城市举行。

2.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研究清华大学中共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座谈会。

从4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市级组织、九三学社中央和市级组织以及其

他方面人士共同组成十人调查组，在清华大学进行了约两周的调查，调查的主题是清华大学中共党组织与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调查结束后，5月6日和7日，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召集各有关方面人士举行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民盟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刚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毅，民主同盟清华支部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负责人张守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高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高教部负责人和代表等。与会人员就高等学校的共产党党委负责制度的问题、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要求参与学校领导工作的问题、教授在高等学校里如何参与领导工作的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

3.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简称为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

5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介绍了召开这种座谈会的目的和要求。他说，中共中央在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求各界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对统战部提意见，对党的一切方面提出批评，帮助我们党整风。李维汉还说，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的整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批评。除此以外，自从1956年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各地在讨论中提出很多问题，例如，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关系上坚持独立、平等、自由的原则，在合作共事关系上要有职有权有责，在国家事务中要求更多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以及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工作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希望大家提出意见，以便进一步改进统一战线工作。

民主人士座谈会在 5 月 8 日第一次举行，到 6 月 3 日，共举行了 13 次，70 余人次发言。在最后一次座谈会结束时，李维汉总结说，大家的讲话接触到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批评和意见。同时，李维汉在总结中也指出，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们认为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4.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5 月 15 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出席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地工商联正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工商联的负责人开座谈会。李维汉在座谈会开始时说，邀请大家举行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现在共产党在整风，统战部同工商联、工商业者，有很多的工作关系。我们诚恳地希望听取对我们的批评。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于 6 月 8 日结束。李维汉在总结发言中说：这个座谈会有它的特点 第一 从 5 月 15 日起到今天举行了 25 次座谈，讲了话的有 108 位，可以说会开得相当热烈，话讲得相当充分。第二，参加座谈会的包含了各方面的朋友，有大、中、小各个类型的妇女、青年、资方代理人等等工商业者，有工商联、民建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有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的常务委员，这就使得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批评和意见比较广泛，比较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第三，座谈会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明辨是非起了重要作用。鉴于当时中央已决定发动反右派运动，李维汉着重指出：座谈会提出的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但尽管此时已在一场急风暴雨的前夜，李维汉仍然承认，工商界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共产党整风有很大帮助。

统战部的两个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与工商界座谈会），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其效果从总体上说是积极的。后来李维汉回忆说：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5. 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举行的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

5月16日、17日、18日，上述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首都和其他地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共200余人。与会人员围绕着新闻界如何鸣放的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如有人在会上提出，在新闻工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三大主义是阻碍新闻事业发展、限制新闻自由的“三座大山”；还有人提出了办报方针问题，说现在的情况是上下都不满意，问题很多，例如报纸是反映下边情况，起个“耳朵”的作用？还是贯彻领导意图，起个“嘴巴”的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研究；还有些人对某些单位设下种种关卡阻止记者采访表示不满，说有些单位真是“侯门深似海”，记者连传达室这一关也难过去，等等。在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今天的报纸很沉闷，很枯燥，《人民日报》同样如此。对于当前新闻工作中的主要问题，邓拓指出，过去阶级斗争时期，报纸为阶级斗争服务，今天形势有了根本变化，今天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他认为报纸必须为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工作。邓拓还提到了当时影响很大的农业部副部长助理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说《人民日报》是支持记者的，这件事情要调查清楚，要处理。

6. 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

5月27日至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在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室、秘书厅工作的党外人士举行了6次座谈会，广泛征求他们对国务院工作的意见。在会议开始时，习仲勋要求参加座谈的人士消除顾虑，有什么意见提什么意见。在这几次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就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在相互之间展开了思想上的交锋。例如，在5月27日的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表示不赞成罗隆基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关于错案平反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对错案平反这件事，应该非常慎重地来对待。针对罗隆基提出的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直接处理平反案件的意见，李仲公指出，这两个机关起监督作用，如果司法机关办得不好，它可以监督，如果照罗隆基的办法，只要你办得不好或者不相信你能办好，就都由国家权力机关直接办理，这是否行呢？在发言中，李仲公还批评了王昆仑、龙云的一些看法。5月29日的《人民日报》以“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为标题报道了座谈会的消息。在5月30日的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范朴斋对《人民日报》的这种作法表示不满，认为不应该把李仲公对三人的批评用标题标出来。同时，他也不同意《人民日报》的另一则标题。即5月23日头版头条的《讨论逐步转向深刻化》，他认为实际上是表面化。范朴斋还认为，国务院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因为如果上面没有官僚主义，下面也不会有官僚主义。国务院参事李一平在发言中提出，要解除人们在鸣放中的顾虑，单靠号召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法律，使人们相信有法律保障言者无罪。可以看出，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各种意见都比较充分地发表出来了。6月6日以后，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还举行了几次，但主题已经变了。

除上述的几种座谈会外，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等，也都相继举行了鸣放座

谈会。在整个的 5 月及 6 月上旬，鸣放座谈会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最常见的政治生活形式。

作为一种“下情上达”的渠道，鸣放座谈会最突出的优点是它传达信息的直接性与真实性，即它减少了中间环节，使领导者可以当面听取各阶层人士的意见。上述各种座谈会的实践证明，只要执政党的负责干部能够以一片诚意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并以一种较高的领导艺术创造出较为活跃和谐的气氛，与会的多数人员就可以受到这种诚意和气氛的感染，消除顾虑，畅所欲言，使执政党的组织了解到许多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情况。

5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就肯定了这种效果，他写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鸣放座谈会，总体效果应该说是积极的，它初步造成了一个自由批评的环境和气氛，使执政党置于一个比较严格的舆论监督的社会压力之下，这对于执政党的干部和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和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个意义，在 1945 年就提出“周期率”问题的黄炎培也认识到了。5 月 25 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统战部工商界座谈会上作了两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再次提到了他与毛泽东在 1945 年那次谈话。黄炎培将这次整风运动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提出的“民主新路”联系在一起，说道：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他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等于是帮助共产党“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果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黄炎培还说道，种牛痘这一个比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内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正是毛主席说的“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吗！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黄炎培的上述认识，正是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次整风的。

但是，5月及6月上旬的座谈会也存在着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一些党外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片面地强调批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一时在一些场合造成了只能提错误缺点、不能谈成绩与反批评的不正常局面；二是在5月中旬以后，中央原定的整风方针开始动摇，逐渐地转向了反右方针，此后的座谈会已经背离了最初的旨意，成为引蛇出洞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不能不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报刊杂志的争鸣文章和采访报道

在开门整风运动中，报刊杂志是传达各界人士意见的又一个主要渠道。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尤其是报纸，在这一时期都将争鸣文章的组稿和知名人物的采访当作重要工作来抓，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各报刊上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可以说，除了座谈会这种形式外，当时党外人士的许多重要意见都是通过争鸣文章和专访报道传达出来的。

在5月及6月上旬，《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许多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陈梦家、北京大学教授傅鹰等。记者的采访，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发表自己对于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机会，而报纸发表了这些采访报道，又使这些意见在社会中传播开来，因此也就成为“下情上达”的一个渠道。例如，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在记者采访时曾对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后，跟着又来了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和创造性的见解，二者之间的区别

好像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同意你的看法的人说，这是创造性的见解，但反对你的人又可说这是修正主义。其时，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修正主义，中国没有这种传统，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有了修正主义之后，再提反对修正主义也还不迟。^{①⑥}周辅成的这段话，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在执政党内也是很容易听到的。再如，考古学家陈梦家在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党的领导和党员个人的领导的区别，也是很能发人警觉的。他说，党应该领导科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恐怕和行政负责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没有关系。非党员担任行政领导，贯彻党的政策，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党的领导。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同志工作得不好，我们反对他，有人认为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这样就把个别党员当成了党的代表。^{①⑦}陈梦家说的这种现象，当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将党员个人的领导等同于党的领导这种观念，成为阻塞言路的一大障碍，而陈梦家尖锐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当时其他的一些大报如由各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等，也都十分重视知名人物的采访工作。如《文汇报》从5月25日开始连续发表下列人物采访报道：《蓓翠花这几年》（访问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连泉）、《流沙河谈“草木篇”》（访问青年诗人流沙河）、《“一下给抻了出来，就再好钻回去了”》（访问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乍暖还寒晴复雨》（访问浙江专业作家陈学昭）、《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访问北京大学教授傅鹰）等。通过这些采访报道，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各界人士的一些真实想法。

当然，各报发表的人物专访报道毕竟很有限，相比之下，报刊上各类争鸣文章的信息量就更大些了。而且，许多党外人士的意见经过进一步加工整理，写成文章后，观点也更加全面系统，因此也更有分量了。例如，在5月8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就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和各种组织的作用问题

发表了意见。在发言中他曾谈到“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的问题，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报道他的发言时，却把这一段话漏掉了。于是，他以《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5月12日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陈铭枢论述了党员同志向党外人士求师求友的益处，他写道：“目前，时代演进急剧，大足惊人，负有解放全人类责任的共产党员，今后仍任重道远，必须开拓胸襟，高瞻视域，岂能自封山头，囿于宗派，主观臆断，徒倚官僚？以周恩来总理之才之美，在国际舞台上，樽俎折衷，虚己下人，即敌人亦不能抹煞其美德。他在访问十一个大小国家中，同样抱着嚶鸣求友、求知识的诚挚。全国人民均应学习这种美德。一般党员怎能说不应在祖国大家庭中求师求友呢？”再如，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撰文论述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的思想基础（5月14日《人民日报》），认为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党与非党之间“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几天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又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论述党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关系，他的论述与章乃器的观点显然是对立的。他认为，既然有墙，原因怕是两方面的，责任也应该由两方面来负，因此想要解决问题，也应当从两方面着手。即一方面解决党组织方面的问题，对知识分子作出正确的估计，另一方面要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教育人的人先要受教育”。在陈垣看来，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但有时存在着“线”即共产党要求它的党员应当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如果这条线只包括这些内容，那么知识分子群众就应该在实际工作中主动地争取擦掉这条线。^⑮陈垣的看法显然更为客观一些。而章乃器和陈垣的对立观点都能刊登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则足以说明当时自由批判的气氛了。

由各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在组稿工作上也下了很大功夫，表现出十分突出的主动性。当时的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

部长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许多重要争鸣稿件都是由他出面约稿和动笔修改。如山西师范学院教授梁园东寄来《出版机关和“百家争鸣”的关系》一文，就是由储安平代为修改后于5月20日发表的。再如国务院参事范朴斋寄来一篇《会外之音》的文章，原文8000余字，据储安平自己回忆：“很不好处理。先退给他，请他自己删，他删成了7000字。第二次又由我删成4000字，”此文于6月5日发表。储安平还于5月下旬起草了一封约稿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是使《光明日报》能够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个论坛。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我们诚恳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预出题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假如能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更好。”这封约稿信印好后，于6月3日前后发给储安平所熟悉的人士共88人。

不可否认，当时的《光明日报》表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性，即它主张多发一些问题提得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这种倾向性当然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储安平到《光明日报》社后，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鸣放的方针，把《光明日报》办成具有中国民主党派特点的报纸。5月7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曾说，个别同志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纸，那么应该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这可能是不了解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其性质是有根本的不同，他们是有在朝在野之分，他们的反对党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而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民主制度，我们的政党没有反对党，民主党派都是参加政权的，有事大家协商，所以，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当然也不是反对党的报

纸，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鉴于这种认识，储安平提出，《光明日报》应该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经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储安平的这一办报思想，与中共中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相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过：以后有人要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储安平所以能够放得开手，李维汉等中共负责干部的支持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当时《光明日报》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是在贯彻中共中央方针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偏差，而不是如后来所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方向。而在这一时期《光明日报》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的主动性，则是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的产物。

后来受到更为严厉批判的上海《文汇报》，情况也大致如此。

（三）以整顿三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以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作品中，最早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王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对这篇小說的评价是很高的，他曾说过，“王蒙的小说写得相当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这部小说，毛泽东主要地不是从写作艺术的角度，而是从文艺怎样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个角度来作出评价的。他在2月16日颐年堂的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中，曾经指出了这篇小說的缺点，他说，王蒙的小說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但毛泽东强调说，小說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后来毛泽东还说过，王蒙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这说明，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之后，毛泽

东迫切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够拿起文艺作品这个武器，攻一攻党内的官僚主义。而王蒙的小说恰恰在这一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当然，在这一类题材的小说中，王蒙的小说绝不是第一篇。如刘宾雁在此之前就发表过两篇涉及到官僚主义问题的小说，一篇是《在桥梁工地上》（《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另一篇是《本报内部消息》（《人民文学》1956年第6期），但毛泽东认为，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也就是说，刘宾雁的小说虽然涉及到官僚主义问题，但站得高度还还不够，不能够引起震动以至在这方面打开一个缺口。而王蒙的小说则直接以批评党内的官僚主义为题材，它一发表，就立即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由此还引发了一场关于文艺作品能否以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为题材的争论。这种效果，当然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所以，尽管王蒙的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不成熟，毛泽东仍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王蒙小说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它提出并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文艺作品可以而且应该批评共产党内的缺点。

但是，以小说作为反对“三风”的武器，毕竟还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因为一篇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有分量的小说，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完成的，而党的政治任务又迫切地需要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文坛上一直比较活跃的杂文形式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当时，对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三风”问题，究竟能不能运用杂文予以揭露和批判，在文艺界是存在争论的。如有人提出，鲁迅说杂文是“匕首”和“投枪”，那是对敌人而言，对人民内部的问题，也能够用“匕首”和“投枪”吗？他们于是得出结论，似乎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杂文即小品文已经失去作用了。毛泽东则不这样认为。他在全党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杂文的作用，他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

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都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①9}

为了在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更好地发挥杂文的作用，在4月中下旬，《人民日报》连续发了好几篇论杂文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最先提出问题的是署名回春的《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这位作者列举了批评性小品文当时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认为其中最根本的矛盾是：这类小品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所以，它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那么，这类小品文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由于作者认为他所列举的一系列矛盾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所以得出结论说：这样的许多矛盾，就造成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消亡的危机。《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这位作者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特意加写了一段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关于批评性小品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讨论。”^{②0}《人民日报》的编者尽管没有表明自己对作者观点的态度，但在当时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热潮中，在中共中央倡导开展批评的形势下，《人民日报》提出这个问题并发起一场讨论，显然不是为了促进批评性小品文的消亡，而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发挥这类杂文的作用而扫清思想认识上的障碍。这一点，从以后《人民日报》发表讨论文章的倾向性上也可以看出来。

自回春的文章发表之后，从17日开始到5月3日，《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11篇讨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对于杂文“危

机”说，只有一篇持完全赞同的观点（范舟《我说小品文要消亡》，4月29日）还有一篇似乎持折衷态度说小品文要是有的，但是应该有些分寸，可作批评的工具，少作或不作讽刺的工具（胡祖宇《我看小品文》，4月19日）；其他的9篇则完全否定了“危机”说。这个悬殊的比例，足以说明《人民日报》对杂文的态度了。

但是，唯一赞成“危机”说的那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却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文章说道：“主张小品文非要不可的人还忘记了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时代：敌人还存在，并且千方百计地要破坏我们，对于我们，我们才不仅要刺，而且要刺得准，刺得狠。小品文不把这方面当成是自己的战场，反而予头指向人民内部，不要扣上失掉立场的帽子，至少也是敌情观念不强吧。正如回春同志所说，这类小品文‘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鲁迅的杂文就是对付人民的敌人的，他就‘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毛主席语）。因此，我们现在的小品文很少对敌作战，多是对人民自己的讽刺，恐非一时之误，而是根本方向的错误。”这一段文字，倒是当时不容易见到的“妙文”，它深刻地说明了小品文“危机”或“消亡”说的思想基础。很明显，这些人仍然用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政治生活，仍然认为处理敌我矛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因此，当有人主张把注意力放到人民内部矛盾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是“失掉立场”，或“敌情观念不强”。尽管这种观点仅仅是围绕着小品文的命运而提出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一种“左”的倾向，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在共产党内，仍然有一部分人从思想感情上与中共中央的鸣放方针格格不入。而关于小品文的议论，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几天后，《人民日报》刊出这次讨论的最后一篇文章《“讽刺”的危机》（5月3日）这篇文章对于“危机”说或“消亡”说

的实质，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讽刺是批评的一种，且有非一般批评所能代替的特殊作用。只要你站得稳，只要不滥用讽刺，可以用以对敌，也可以用以对自己人。‘人民内部需要批评，但不需要讽刺’的说法，就某些说话者的思想情绪说，后半句是真实的，但前半句大都是谎话，至少是不自觉的谎话。尤其在他自己碰到批评的时候，真相便显露得更清楚了：他不但不喜欢他所说的‘讽刺’，也不喜欢他所说的‘批评’。”这位作者实际上是在说：只有那些身上沾染了许多毛病，而又惧怕别人讽刺或批评的人，才会主张批评性小品文走向消亡。由此当然也就反衬出小品文或杂文的作用了。

在这场讨论中，肯定小品文或杂文作用的意见，明显地占据了上风。这样，在5月和6月上旬的开门整风运动中，小品文或杂文这种批评形式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针对某些领导干部整天忙忙碌碌，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得死死的这种现象，《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了《废弃“庸人政治”》一文，认为这种领导就如同“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陆游诗句）一般，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因此，要把这一套“庸人政治”彻底地反对掉。邓拓接着写道：“然而，有人会很不高兴地责问：这不是放弃领导和放任自流吗？回答：似乎是，其实不是。说它似乎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是要大胆地放手、放手、再放手；既然如此放手，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恐怕就得改，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允许某种程度的放任。说它其实不是，因为在原则和方针上毕竟还有领导，决不能变成无政府的状态。而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些年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既然如此，就什么也不可怕了。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真是庸人自扰，瞎操心了。”^{②1}这段话很明显是对中央鸣放方针的解释，而这种解释也是很准确的。顺便说一句，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认为，邓拓的文章是对

毛泽东的“尖锐讽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他没有读懂这篇文章的含意。^②

再如，针对当时一些领导干部长期满足于当“外行”的思想，5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凡兵的杂文《有知与无知》，文章写道，一些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斗争方面久经锻炼，知识是极丰富的。但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却变得“无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形势变了。革命暴风雨已经过去了，现在主要是搞经济和文化建设了。这些同志不了解社会大变动的新形势，既不好好吸取新的知识，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又没有‘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特别是还有‘强不知以为知’、‘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恶劣态度，这真是无知之至了。以这样的无知来领导有知 肯定地说的不可能领导下去的。”这篇杂文揭露的问题，也是十分深刻的。

除了杂文之外，当时的政治讽刺诗与漫画也十分活跃。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文艺和副刊部主任袁水拍的题为《摇头》的讽刺诗，讽刺了那些看不惯社会大变动时期新鲜事物的教条主义者。诗中的教条主义者说道：

满台家务事，
满纸儿女情。
不行，不行！
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
讽刺，诽谤和小品文……
嘿，查查看，
是哪个“俱乐部”发来的兵！

短短几行，一个死抱着革命的暴风雨时期过时观念不放的教条主义者，就活现在纸上。毛泽东在4月20日给袁水拍的信中，

称赞了这首诗，并建议他多写些这样的作品。

此后，根据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喝令记者“滚开”这一事件，袁水拍又写了题为《官僚架子滚开！》的讽刺诗，诗中写道：

滚开！对！应该滚开！
 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
 腐朽作风，老爷气派，
 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
 一古脑儿都滚开，
 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

著名漫画家方成为这首诗配了一副漫画，漫画中的部长助理面对下级时挺胸凸肚，叼着烟卷，嘴里说着：“我重要，哼！”而一转过身面对上级，马上弯下腰来：“您更重要，嘻嘻……”诗与画都表现出一种辛辣的风格。^{②③}

为了涌现出更多的讽刺作品，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写了《我们需要讽刺诗》一文，文章对讽刺诗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同样一个喉咙，唱颂歌，同时也可以吐出火焰般的讽刺诗句，一正一反，目的只是一个。讽刺了坏的，是为了不使它损伤好的。……真正站稳了立场，爱社会主义祖国像爱自己的母亲，对于她不利的一切东西，即使很细微，也会激起从热爱出发的愤恨之情，敏感地、真实而大胆地挺身而出。一个诗人如果能够如此，那么他会写出动人的讽刺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分寸问题应该不成问题。真是为了治病，即使药味苦些那有什么关系？”^{②④}

总之，1957年开门整风中的文学作品，是当时开展自由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②⑤}用这句话来说明

1957年的文艺作品与中国共产党整风任务的关系 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五 五个多星期鸣放的言论，大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有许多意见甚至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虽然历时仅有 5 个多星期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兴起的自由批判的浪潮，对执政的共产党却是一次极其严格的锻炼和考验。当时在各种座谈会上，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党内外各阶层人士发表出来的种种意见，虽然如毛泽东所套用的王勃诗句那样：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但是，认真分析当时的种种言论，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时期的鸣放言论，大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有许多意见甚至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

（一）对于党和政府关系方面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处理好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早已提出，但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一般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实质上讲，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是国家民主生活不足的必然表现，因此，这种现象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各阶层人民思想觉悟得到普遍提高，这时候，人民群众增长起来的议政、参政的政治积极性，就必然会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这种模式发生冲突。1957年开门整风中各界人士在这方面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就说明了这种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比较严重。

在 5 月 10 日的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明确提出了党政关系问题。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邵力子最后说，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②6}

民革中央的另一位常委刘斐在 5 月 30 日的发言中指出了党政不分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他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刘斐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他提出，要改变这种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刘斐还进一步指出，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

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②7}

民盟中央常委杨明轩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也谈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在某些地方已经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杨明轩于1956年冬天到广西、广东视察，他发现，一些州、县、乡的重大工作，往往都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委员会的讨论和通过，有不少是由当地的中共组织或干部会议来决定实施的。杨明轩指出，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不能按期召开，人民不能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和政府委员行使自己管理国家的权力。^{②8}

全国政协委员焦实斋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谈到了他去山东视察时所了解到的基层工作中党政不分现象。他说，有些地方党政社不分，有些合作社也办理起婚姻登记和户口登记等工作。有的中共地委可以否定省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中共区委可以否定县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他认为，党政不分的原因是会议制度不健全，下面干部喜欢用干部会、一揽子会来推动工作。他还说，过去民政部门管政权建设工作，后来受到了批判，民政部门不管了，其他部门也不管。他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②9}

民革中央委员、监察部部长助理甘祠森认为，出现以党代政的原因，应该从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方式方法和国家机关工作制度上去寻找。他认为，共产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方式方法必须改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调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③0}

从上述发言可以看出，自从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它严重地影响了政府部门的职能作用和各阶层人民政治积极性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外人士能够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或切身感受，向中国共产党直言这种现象的危害性，并指出克服这种现象的根本出路在于健全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这对于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极有益处的。

（二 关于党群关系方面的尖锐批评

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的形成，固然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有极大关系，但从思想根源上讲，我们还必须指出，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宗派主义观念的反映，即我们党内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不喜欢“五湖四海”，而热衷于“清一色”；他们只相信共产党员，而不信任党外群众。这种“清一色”在政府工作中表现为以党代政，而在党群关系中，则无形中在这部分党员干部与他们所联系的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墙”，挖了一条“沟”。这种“墙”“沟”现象，是当时党群关系中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开门整风运动中各界人士所批评的一个重点。

党群关系中的“墙”“沟”问题，并不是在1957年开门整风中才提出来的。早在一年多以前，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组织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所谓“隔膜”，与后来所用的“墙”“沟”，程度不同，但含义是一样的。此后，有人用“高墙”来形容一些单位中党组织与党外群众之间的关系。1956年12月7日的《南方日报》发表了一首署名冼玉清的“潮梅视察”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党群谁使隔离墙 民主原来未发扬。深坐公厅听汇报 偏听偏信事堪伤！”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张治中引用了这首诗来说明当时的“墙”“沟”现象。到了开门整风运动展开之后，人们开始普遍采用“墙”“沟”的说法来形容某些单位中党组织与党外群众之间的隔阂。

根据当时各界人士的反映，党组织或党员与党外群众之间的墙沟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部分非党干部有职无权。

毛泽东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就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

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③①}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的地位以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一再地向全党指明了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重要性。如在中共八大第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③②}也就是说，在全体人口中，共产党员始终是少数，他们不可能包揽一切具体事务。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他们就会一事无成。但是，毛泽东讲的这些道理并不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理解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内就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情绪，受这种情绪支配，他们对中央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针很不理解，总以为安排一些非党人士担负领导职务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属于照顾性质的。从这种狭隘的宗派观念出发，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就必然会将一切权力和工作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而使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成为摆设。在开门整风中，对于一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宗派主义作法，许多党外人士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例如，卫生部当时就存在着不尊重非党干部职权的现象。妇幼司司长杨崇瑞是党外人士，但她的意见却不被司里的党员干部所重视。一次干部司分配一个干部到妇幼司来，杨崇瑞司长要看档案，干部司的一个干部却说：“他是党员，你不能看。”党外人士反映，杨司长是有职无权。^{③③}这种情况在邮电部也存在着。据邮电部非党干部反映，部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对朱学范部长尊重不够，有些问题，非党部长说了不算，党员处长说了算。如关于成立教育科，朱学范已经批准了，但由于劳动工资处的党员副处长不同意，结果就没有成立。再如“三反”时，邮电部决定开除一个干部，朱学范不同意，而监察室的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结

果还是开除了。于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部长领导处长，还是处长领导部长？^{③④}

民革中央委员、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在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也谈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切身感受：

“四位署长和副署长中，只有我不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初期（1949——1953），我是有职有权的，很多事情由我管，甚至不该我管的也管了。从海关总署成为外贸部的一部分以后，我的权与职就不相称，甚至削弱了。1953年开全国联合查私会议，是由我领导的。可是这个会议的总结，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草稿也不给我看。直到半年以后，全文都打印好了才给我一份。1953年，开海关关务会，我是主席团之一，天天领导开会。会议的总结报告，是由雷副部长领导作的，根本不准我参加总结工作。……我领导三个处，也常批改一些公文。可是，我改的公文，处长马福元（共产党员）常常跑来责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改。我在海关呆了41年，多少也懂一些业务。可是，总署副处长陈铁保（共产党员）甚至有时对我说话声色俱厉。党员处长常常不请示报告，甚至有时候他们出差去了我也不知道。”^{③⑤}

丁贵堂感叹说：“总署的墙高而厚，沟深而宽。”

非党干部有职无权的现象，在基层也相当严重。据民促中央常委严景耀反映：有一个学校，身为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学校就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③⑥}由此可以看出非党员校长平时在校内的地位了。

第二，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与生活上的特殊化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共产党员必然要在群众中表现出某些“特殊”之处，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呢？斯大林接着说：“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③⑦}显

然，一个人一旦成为共产党员，他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他由此就获得了任何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物质条件，而在于他从此必须经历“种种苦难和风暴”。也就是说，共产党员必须有一种为人类解放事业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这种境界，并不是每一个普通的人所能够达到和所愿意达到的。这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特殊”的全部含义。

但是，当时在党内也确实有一部分党员干部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共产党员的“特殊”。在他们看来，既然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那么，共产党员在政治待遇和物质生活方面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种“特殊”观，不仅不能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反而极大地降低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引起了群众的严重不满。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党外人士普遍反映，银行的干部政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有些党员干部既无德，又无才，却身居要职，做不好工作。有个党员的作风恶劣，文化程度很低，工作能力差，但仍然让他任科长。党外人士还反映，宗派主义还反映在干部的培养提拔上。如 1956 年工业信贷局提拔的都是党员，而有个当了很长时间科长、又是先进工作者的非党人士，却没有得到提拔。^{③⑧}再如，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党外人士在该部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党组织和党员的宗派主义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反映，有一个党员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却提拔为企业总工程师，有些非党技术人员技术水平比他高，却不提拔。有的单位一些非党员几年前是科员、科长，现在还是科员、科长，而当时入党的科员、科长，现在有的当了科长，有的当了处长。选派留学生，也是过于偏重政治条件，忽视业务水平。^{③⑨}这些现象说明，这个部门在干部的培养与选拔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

政治上的特权与物质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党外人士反映，一些党员干部在物质生活上，也是“特

殊”的。例如，民革外贸部支部主任委员姚日成反映说，部里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司局长干部住的是高级宿舍，吃饭上小灶食堂，回家坐小汽车。粮油出口公司的食堂，单有一间小屋给处长吃饭。后来小屋被移作他用，又在群众吃饭的地方辟出一桌为“处长专席”。群众对此很不满，要求取消这个专席，还被批评是“平均主义”。民建外贸部支部副主任委员毛宗尧说，机械进口公司在干部生活待遇上也很不一样，黑板报上就曾揭发经理和一般干部所住宿舍的面积是八比一。他说他家 10 口人住 33 平方米的房子，而与他同级的党员干部，则住在院子里最好的房子里。他还反映说，一等科员的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员干部坐硬板凳，一样的科员，但屁股不一样。他尖锐地指出，常言说：“菩萨庙里的菩萨怎么坏的 就是被捧坏的。”这很值得警惕。^{④⑩}该部行情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泰华在部里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也批评了这种等级现象，他说，我们是打倒封建社会的，但我们还残存着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如有的处长一人一间办公室，夏天还可以有电扇，而许多一般干部挤在一间小屋，热得很也没有一个电扇；如看病，小孩子上学也有不同，什么样的干部，他的子女就可入什么样的学校，子女靠爸爸之福，这真像封建社会中爵位的世袭权。他认为这种等级现象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应有的。^{④⑪}

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一些党员干部认为自己在政治和生活上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这就必然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把自己与群众隔离开来。

第三，一些党员干部居高临下，不信任或看不起非党人士。

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④⑫}但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一些党员干部并没有这样去做。他们总以为群众觉悟低，非党人士落后，因此他们的言谈举止总表现出一种高傲，使党外人士难以接近。如电力部财务司会计师罗孝胥反映说，党群间隔膜表现很多，根本问题

是党员对非党员不够信任，不放心，他举例说，他在东北时，收音机的短波被卡断了，虽然正值抗美援朝，但还是不聪明的做法，对此他很不满意。水电总局技术处处长萧季和说，党内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认识不足，还认为旧知识分子思想很落后，没有考虑到几年来国家进步对他们的影响。他认为，要是哪个人亲眼看到这几年来事实，而还对共产党不拥护，还不爱国，那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技术改进局的工程师郑肇基说，有一次一个党员去他家玩，他泡了一杯咖啡给这位党员喝，可一个星期后，在一次小组会上，这位党员却批评他太资产阶级化了。^{④③}由一杯咖啡而想到资产阶级化，显然是戴着有色眼睛观察党外人士的结果。再如，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侯大乾反映说：‘有些党员领导同志不尊重老教师，甚至有的党员在下面公开对老教师讲：我们革命打游击时，你们还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罢了。言下颇有轻视之意。他还指出，还有些党员经常随便给人扣帽子，就连群众把“爱人”叫做“太太”也要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学校党的组织在解决教师入党问题上更是关起门来，党员多是站在群众头上看群众，宗派主义情绪很大，居功自傲。’^{④④}当时还有些党外人士反映说，党员往往都摆出一副“政治面孔”，党龄越长，就越发严肃，使人难以亲近，只好敬而远之。

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什么它的一些组织和党员与群众之间还会产生“墙”与“沟”呢？当时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曾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作了这样的分析：从党员方面来说，由于对非党员有气不过、看不起和惹不得的情绪。他说，尽管党对党员一再进行了教育，说明党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能以功臣自居，但是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之

看不起非党人士。怎么叫惹不得呢？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些好。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④5}陈叔通的分析，确实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党员干部进城后的思想状态。

各阶层人士所反映的“墙”“沟”现象，证明了中共八大的一个论断的正确性，即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在八大召开时，也许有一些党员还不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开门整风中，充分揭露的矛盾却足以引起这些党员的震动与警觉。

（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批评和建议

1957 年是我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应该如何去走，这不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潜心思索的问题，也是一切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党外民主人士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一年所展开的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针对过去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发表了许多宝贵的见解。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茅以升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定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收集不易，就很难做得尽善尽美。纵然制定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在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茅以升主张，在做计划时，要分别轻重，预留伸缩，规定出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

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④⑥

经济学家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对于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我们今天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沈志远指出，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认为，过多过死的集中、管理和一切都包办下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消极作用甚至为害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因此，如何正确地使计划管理与自由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党的领导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了。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不但要消除寄生在党和政府肌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④⑦

5月11日、12日的《人民日报》连载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论文《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马寅初在论文中论述了我国经济建设中八方面的平衡关系，其中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间的平衡、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平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平衡、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平衡、工业企业和运输企业间的平衡、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平衡、大型和中小型工业的平衡、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平衡。他在论述这些平衡关系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例如，在论述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平衡时，他指出：“过去，由于中央对计划指标的掌握有过多过繁的地方，这就多少束缚了地方的主动性。……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我国国民经济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在过

渡时期中，由于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种经济成份的比重的变化是很快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幅员广阔，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央还不可能对各个地区的情况掌握得很准确，因此，国家也不可能对各项计划指标不分主次地都采取严格控制的办法，而必须允许地方在国家统一的计划的指导下，保持必要的灵活性。”在论述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平衡时，马寅初既强调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方针，又明确指出，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而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它们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维持平衡。^{④⑧}马寅初在最后的结论中还指出，第一个五年前四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但这并不是说年度计划的安排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1956年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成绩很大。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偏大，人员招收多了一些，学生也招多了，工资基金和事业费用也就必须多增加，结果，国家财政多支了一些，生产资料 and 消费品的供应都紧张。根据1956年冒进的情况，马寅初提出，1957年的计划，在去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这不是冒退，而是转向正常的发展。^{④⑨}

马寅初关于“放慢一步”的观点，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也是赞同的。在5月16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陈叔通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检查一下8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⑤⑩}显然，他认为八年中冒进所造成的损失要大一些。

对于以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事业方面的缺点，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总结为“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指出，好大喜功的大，一种是形体之大，许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

标准，而实际上有些外表看来很堂皇的东西并不太合用；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艺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所谓急功近利，它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他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所谓鄙视既往，是说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实际上，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所谓迷信将来，是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机械地等速度发展的。实际上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张奚若最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⑤①

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党外人士对于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是极有帮助的。以后的实践证明，上述批评意见大都是富有启迪意义的真知灼见，如果认真采纳，肯定会对实际工作有相当补益。

（四）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批评与建议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当时法制的健全有很大的关系。在开门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对于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一些党外人士首先对我国在一定程度存在着的无法可依的现象提出了批评。5月16日，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对我国的立法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我国立法工

作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指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⑤②在中国政法学会召集的首都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5月26日、30日、31日、6月4日召开），法律出版社编辑纪清漪批评了立法工作进展太慢的现象。她说，刑法典的起草工作早就听说在做了，可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今仍未公布。据说，这是为了使立法者少犯错误，但结果呢？使得广大司法者“无法可依”，量刑幅度很难掌握，错判也在所难免。再如诉讼法典的拟订，是否还没有条件呢？不是这样的，据说也已有人在做，可是连下楼梯的响声还未听见。北京大学教授芮沐在发言中批评了我国立法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他说，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立法机关，规定人大常委会可以颁布部分性质的法律，可是现在国务院所属各部却自己制定了许多法律性的文件、指示，而下面也都把它们当作法律遵照执行。他认为这样太分散了，应该有一个总的机关统筹一下。⑤③

但是，在当时是不是“有法”就“必依”呢？也不是的。许多党外人士也指出一些领导干部“有法不依”的现象。在5月30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刘文辉在发言中即批评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党和国家很早就注意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我国宪法第97条就明文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控告权和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普通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呢？国家机关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

法给予了赔偿呢？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⑤4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这些现象都说明了社会主义法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执政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是很不明确的。在首都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正在人民大学进修的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指出，宪法虽已公布，可是至今仍有一部分领导人员对法律持虚无主义的观点。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自认是“金科玉律”。这都是违反法制的。人民大学讲师吴家麟指出，现在有些部门、甚至中央领导机关仍有不严格遵守法制的现象，例如，宪法第27条第11款规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划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可是在1955年人大常委会却通过了撤销新疆省建制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决议。⑤5在民革中央第五次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在发言中谈到了共产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的问题。她指出，宪法是党制定的，可是有些事情就没有遵守宪法办事。例如，宪法规定，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受宪法的保护，可是上海实行“房改”，办法由党内制定，而且作为个人生活资料的住宅也纳入了“房改”的范围。她问道：宪法是大家包括共产党在内举手通过的，堂堂宪法为什么不遵守呢？她希望中共中央作一次检查，凡有违反宪法的政策要赶快修改。她尖锐地指出，民无信不立，立法者须首先守法。在解放前不遵守法律是为了推翻反动政府，今天共产党希望国家长治久安，领导国家对国家的法律就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她还说道：“把司法、检察、律师分开，这是好的，可以起杠杆作用；可是现在三者是属于一个党委领导，这就发生了问题，失去了分开的意义。为什么不可以分开来领导呢？”⑤6

一些党外人士还对纠正法制建设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现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吴家麟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健

全政治制度，调整失调的一些环节，并正确运用这个制度；第二，加强立法活动，整理过去的法律，拟订急需的法律；第三，加强对于国家干部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中央领导机关在严格遵守法制方面做出榜样。^{⑤7}刘文辉也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加强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风运动贯彻到基层去，从思想认识上来解决问题，这是根本办法。第二，厉行革命法制，首先是严格执行宪法第 97 条规定，保障公民都能充分地行使控告权和损害赔偿权。第三，加强人民代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他引用“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句话说明人民代表有保护选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监察机关有贯彻革命法制的职责。^{⑤8}这些建议，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更进了一步，他比较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问题。在上海市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5月22日至25日），^{⑤9}王造时作了书面发言，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也就是它的内容。民主的原则，靠法律的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⑥0}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关系作出这样深刻而准确的论述，这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

（五）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偏差的批评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些政治运动，对解决当时十分紧迫的一些重大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运动成绩斐然，但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对胡风事件的处理和几乎同时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在开门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批评了这些“左”的偏差。

无党派民主人士、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认为，总的来说，肃反成绩还是很大的。某学校的副院长，在肃反时被误作为对象，他对陈垣说：“我当时确是难过得很，身体健康也差了。但是，今天

平心细想，经过这次运动，全国反革命基本肃清，可以安心地建设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我当时虽然吃些苦头，但从结果来看，问题还是弄清楚了，也并没有冤枉我。”听了这些话，陈垣说他很受感动。他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很多人在大运动里受了伤，如果仅仅说是“在所难免”未免也是说便宜话，不过能从全国着想，总可稍稍解开这些症结。他指出，今天吸取过去的教训，学会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会再有误友为敌的错误作法了。

⑥⑩

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也在肯定肃反运动的前提下，批评了这场运动中的“左”的偏差。他说，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地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他认为，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不外四种情况：（1）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2）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就根据肃反政策纠正。（3）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尾巴。（4）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白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朱蕴山建议，在1957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方面分往各地检查，根据上述四种情况分别作出处理。⑥⑪

有的党外人士对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具体作法也提出了批评。如财政部参事室参事陈盛兰回忆说：肃反运动中要求我们写材料。我们写了，领导上却不太相信，写得不详细，就说我们不依靠组织；我们为了把材料写得认真些，只得向有关人打听，组织上又说是“通风报信”。真弄得进退两难。陈盛兰对于肃反事先定比例的作法也很有意见。他说，财政部的三反和肃反有些扩大化。如三反时预定“老虎”为25%，肃反时则定为5%。事先订百分比

的作法是否科学？事实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也许是由于当时胡风事件还过于敏感，所以在一些影响比较大的座谈会上，还没有人触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在基层座谈会和其他的一些场合，胡风事件却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他们怀疑，对胡风集团的定案是否准确。如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助教就说：“我认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应该考虑，值得怀疑，胡风是反革命根据是什么？据我看有三：第一，向社会主义进攻总纲领（向中央提的意见书）；第二，胡风的私人信件；第三，胡风集团成员中有反革命。因此我有怀疑：（一）如果他是反革命他是不会自投罗网（指不会直接向中央提意见）；（二）揭发私人信件，违反宪法，如果将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的信件全部揭发出来，连一句不满的话都没有我就不信；（三）胡风分子里有许多是反动出身，但不能作为唯一根据，因此我认为胡风分子如果没有更多事实，中央应慎重考虑，应该检查的及牵涉到胡风集团的具体人是否是反革命。”在胡风问题上意见提得最尖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即程海果），她在北京大学发表讲演说，“对胡风究竟是否反革命，谁也不能肯定，即便法院判决，也不能作出结论，就是尸体烂了也要恢复名誉，苏联即这样。现在对胡风问题值得怀疑，这是破坏法制，为什么迟迟不公布，根据胡风三批材料是不能依此定罪。我也曾写过两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看来是很不对的。胡风向党中央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反对文艺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现中央的‘百花齐放’方针与胡风意见书甚至精神一致，提意见不能说是反革命，胡风案件原因很复杂，胡风骂人也骂的够凶，也很艺术的，但依此定反革命罪是很不充分，主要那一时期受斯大林的影响……”林希翎的发言反映了当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怀疑和否定。

总而言之，在当时的自由批判的环境中，相当多的各界人士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意见。今天，当我们重新

翻阅这些材料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当年中国共产党采纳了这些意见，在以后的实践中切切实实地加以改正的话，我们的共和国将会少走多少弯路！

注释：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日。

《人民日报》1957年5月6日。

参见（英）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第41页。

⑥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⑦见《人民日报》1957年5月4日。

⑧《文汇报》1957年5月9日。

⑨《文汇报》1957年5月8日。

⑩《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⑪《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⑫见《共和国走过的路》第250页。

⑬《陆定一文集》第503页。

⑭《毛泽东选集》第5卷323页。

⑮《毛泽东选集》第35卷第349、350页。

⑯《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⑰《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⑱《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⑲《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

⑳《人民日报》1957年4月11日。

㉑《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㉒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275页 求实出版社1989年12月。

㉓《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㉔《人民日报》1957年5月21日。

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

㉖《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 ②7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 ②8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 ②9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8日。
- ③0 《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
- ③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 ③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5页。
- ③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 ③4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3日。
- ③5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③6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 ③7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69页。
- ③8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③9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
- ④0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④1 中共对外贸易部党组整风办公室内部刊物《想一想 对不对?》第2号。
- ④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
- ④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5日。
- ④4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④5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④6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 ④7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8日。
- ④8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 ④9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2日。
- ⑤0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⑤1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 ⑤2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 ⑤3 《光明日报》1957年6月1日。
- ⑤4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 ⑤5 《光明日报》1957年5月29日。
- ⑤6 《光明日报》1957年6月6日。

- ⑤⑦ 《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29 日。
- ⑤⑧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31 日。
- ⑤⑨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六辑 第 15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9 月版。
- ⑥⑩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31 日。
- ⑥⑪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31 日。
- ⑥⑫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19 日。

第四章 在 1957 年 5 月及 6 月初的开门整风中 发生了一些不寻常事件。整风运动出现了波折

- 一 “左叶事件”。事件起因于 4 月 17 日农业部
部长助理左叶和新闻记者的一次冲突。到
5 月上旬，遂发展成为一场记者风波

5 月和 6 月初的开门整风，其总体效果基本上
是好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段时间的
运动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如前所述 在开门整风
运动发动时 就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诸如 中共中
央在发动开门整风运动时，将原定的比较充足的
准备阶段省略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对
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存在着
消极抵触情绪；以及受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
的影响 或者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 从旧社
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还不太
适应 等等。这些不利因素 对于开门整风运动也
有着一定的影响，并在 5 月中旬后形成了一股潜
在的怀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非议社会主义制度
的暗流。这也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

但问题在于 卷入这股暗流的有多少人 是否
都抱有取共产党而代之的动机 这股暗流 是否已
具备了酿成一场狂风恶浪的条件？如果我们分析

一下这一时期的一些不寻常的事件及部分引起争议的典型言论，对这些问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所谓“左叶事件”指的是5月上旬和中旬发生在新闻界的一场记者风波。事件起因于4月17日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和新闻记者的一次冲突。5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洪克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一文，第一次披露了这次冲突。洪克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一冲突的起末作了如下的报道：

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伏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洛希罗夫）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时候，跟着采访的中外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随时准备着拍摄一些精采的镜头，并且都想从伏老的前面拍去。当时随同采访的记者很多，还有一些参观人员，秩序比较紊乱。一位矮胖的同志总是站到刘少奇同志和伏老的前面，紧紧挡着摄影机的镜头。

一次两次三次……，许多次好的镜头，都由于那位同志的遮挡而失掉了。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们十分头痛，外国的摄影记者也直摇头。

又是一个好镜头来了，那位同志仍然挡在伏老的前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实在没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那位同志一下说：“同志，请你让开一点！”在一般情况下，摄影师遇到的回答是“好”，马上躲开。但是这次韩德福所得到的回答却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那位同志扭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他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吓人，韩德福一时摸不着是怎么回事，只得走开了。显然，那位同志是在骂人了，骂了我们所有在场的记者，因为他的口气是“你们”。

接着，粗暴态度而成为命令，传达下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来了，他朝着我和《北京日报》的摄影记者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盛气凌人，实在难忍，我对他说：

“同志，你说什么都好，可是骂人不好啊！”

“这不是我骂的！”他说。“是我传达别人的！”

他不肯告诉我们他是传达谁的骂人的命令。后来，我打听清楚了，原来那位骂人的同志就是那位挡着摄影师镜头的人，他是中央某部的部长助理。

5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了记者刘光华于7日由北京发来的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专电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补充了这样一个细节：在听了外交部新闻司那位同志传达的“命令”后，当场有好几个记者扯下了记者证抗议说：“像这样可以不要我们采访了！”

对这一事件的过程，后来还有另一种说法。在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7月25日的《新闻与出版》发表了署名郑远的《“左叶事件”被右派利用说明了什么？》一文，文中写道：

……当时在场记者有60余人，大家忙于采访、摄影，不时往贵宾参观的地方拥挤，有时将参观的人群隔断，有的摄影记者为了摄取精彩镜头，竟踏到了展品台上以至踏坏了展品。……就在这种秩序混乱、人们要求维持秩序的情况下，负责维持秩序的左叶同志感到责任重大，精神有些紧张。他正想整顿一下秩序，突然，一位摄影记者抓住他的肩膀向后一拉，要他闪开，好让记者抢前去拍照。左叶这时心情有些急躁，他转身问这位记者：

“你怎么这样态度？你这个态度对吗？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工作的。”记者回答。

“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接着左叶向负责维持秩序的其他人们说：“你们负责维持秩序的，大家靠拢一些好吗？”

以上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客观事实，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是，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否发生了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而在于当时一些机关和一部分领导干部确实不够尊重记者的工作。实际上，即使没有什么“左叶事件”，其他事情也会酿成一场

记者风波。例如：

在 5 月 3 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指出。过去记者进行采访工作时，经常遭到很多业务部门的限制和歧视。《新民报》记者采访苏联马戏团消息时，被负责招待的同志以横蛮的态度逐出后台，发言人要求有关部门对这种无理行为加以制止，以保障今后记者的工作权利。（5 月 4 日《文汇报》）

在 5 月 11 日首都新闻界的座谈会上，《大公报》记者萧离说：去年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游览颐和园新闻的时候，我不断听到有人喊：卡住记者。使我到今天记忆犹新的是一个穿西装、系红领带的胖胖的同志在大戏台旁边说的一句话，他说：“记者真讨厌，简直象苍蝇！”后来我听人家说，这人就是总理办公厅一位副主任。（5 月 12 日《光明日报》）

《劳动报》记者在最近采访外宾活动时，被外事处代处长一把拉下来。《新闻日报》记者去旁听第一商业局经理会议，会议开了一半，办公室主任发现记者在场，就把他赶了出来，并说：“你是《新闻日报》的吗 你们怎么知道的 去去去！”（5 月 10 日《文汇报》）

这些都说明，当时不尊重记者工作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且，这些现象已经引起许多新闻工作者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时开门整风的政治气候，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一经披露报端，就立即酿成了一场所谓“左叶事件”的风波。

5 月 8 日，《文汇报》在发表北京专电的同时还发表了特邀《旅行家》主编彭子冈写的题为《尊重新闻记者》的社论。彭子冈写道：“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鄙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基础的改变。……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此后，新闻界就普遍开始鸣“不平”了：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洪克的文章后 第二天又发表了中国新闻社记者衣羊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读后》，衣羊写道：摄影记者、摄影师在采访过程中，特别是在拍摄宴会、接见、参观游览等较紧张的场面时，常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多余的人”，“碍事的人”总之是“不受欢迎的人”。对我们 好的是平和的劝导：“不要挤”；“不要抢”不好的则是声色俱厉地喊叫：“你们都走开，走开！”

5月9日的《工人日报》发表了署名车工的《“辛苦了”和“滚出去”》一文，文章以周恩来总理关怀和具体帮助新闻记者的事例与左叶辱骂新闻记者一事作了对比。

5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和梁汝怀的文章《要学会尊重人》，并配了方成的一幅漫画。文章在“谁重要”这一问题上指出：在那样的场合，摄影记者的工作，硬是比部长助理重要得多。没有他们，亿万人所渴望的照片就无从见到。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5月10日的《文汇报》在“群言堂”栏目中发表了两篇讽刺短文：《谁重要？》和《谨呈部长助理》。

5月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蒋荫恩的文章《新闻记者的职务应该得到重视》。

此外 在当时一些有关新闻、宣传工作的座谈会上，“左叶辱骂记者的事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许多新闻工作者从这一事件出发，对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就是5月上旬和中旬，在中国新闻界所发生的一场名为“左叶事件”的风波。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

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左叶事件”揭发了当时在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党内某些负责干部看不起记者工作，甚至一些人对记者抱有一种警戒和反感。正如彭子冈所尖锐指出的：

“鄙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这种现象说明，党内某些负责干部对于新闻记者工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缺乏真正的理解。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些负责干部会对记者抱着本能的戒备与反感？如果我们从记者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角度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一问题与当时党内存在的对于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消极抵触情绪，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很明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记者的活动范围和工作性质使他们能够对执政党和政府工作实施有效的舆论监督。如果记者的工作受到重视，各单位都能为记者的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那么，记者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除了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宣传职能外，还能够有针对性地对被监督对象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披露和评析，并有意识地影响整个的社会舆论，从而造成一种实际的监督环境。

这样看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机关对于记者总是处于戒备状态，而一些领导干部又对记者那么反感了。记者的监督职能，显然给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造成了不便，如果这些单位和干部不想让公众了解到他们失职、渎职等行为，而又不愿意真正改掉自己的毛病的话，就必然会给记者工作设置重重障碍。显然，无理阻挠记者工作的行为，与毛泽东所提出的造成一个自由批评的环境这一政治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而“左叶事件”揭露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此我们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左叶事件”也表现出一种违背整风方针与目标的错误倾向。一是从方针方法上看，当时的许多批评与嘲讽，已经不能说是与人为善和风细雨的了，甚至有些批评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脱离事实竭尽发挥。如《文汇报》发表的讽刺短文《谁重要？》这样写道：“且不说在这样的欢迎场合里，究竟谁比谁重要；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有人把这一件事

编成一出描写官僚老爷怎样仗势凌人的短剧，那么‘重要’角色总是这位部长助理同志，而决不会是那摄影记者。”由在特定场合发生的一场冲突，引伸为官僚老爷仗势凌人，就未免有些深文周纳了。

二是从方向目标上看，当时一部分人用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极力主张新闻工作的绝对自由，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摆脱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倾向。当时在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就有一部分人“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诸如：“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在教学中（指新闻教学——笔者），有五性一统，把党性、群众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统到党性底下，这样一来，把什么生动、活泼的东西都统光了。”；应该把同仁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可以减少报道中的主观片面性”，等等。这种企图在新闻事业中摆脱党的领导倾向，是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的。

至于彭子冈所写的《尊重新闻记者》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上述的错误倾向之中。正如她本人后来在检讨中所说的：“我是不是在要求什么新闻绝对自由呢？我实事求是地检查，确实不是，我要求的是：今天的领导干部和机关不要歧视记者。记者这一行确是为某些人所不了解，《为什么要整风》中也说‘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群众看作自己人……我是有同感的。”从那篇社论的内容来看，彭子冈的这段话还是可信的。

“左叶事件”的结论是在反右派斗争发起后作出的。7月1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集专门座谈会，调查和分析了这一事件。在座谈会上，左叶检讨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但是他声明确实没有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一句话。主要当事人韩德福出差在外，未能与会。他在书面材料中说，左叶被拉后很生气，一回头就说：“你怎么拉人？”韩说：“不

拉你，机器就要碰到你的头了。”左又气愤地说：“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接着又说了一句什么话，韩说：“当时我听得不太清楚。”在会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画、文的袁水拍、方成、梁汝怀，以及《鲂国青年报》吴一铨、洪克，《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等就对这一事件的批评、报道作了检查，有的还向左叶表示道歉。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在会上指出，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他还说，《文汇报》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和社论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的；此外的大多数报纸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也都违背了新闻必须真实这个根本的原则，并且在客观上替右派分子张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邓拓的这个总结性发言难免受全国反右派大气候的影响，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有所偏颇。说有些人借这一事件“放”出一些错误的东西，这是事实。但将整个事件都与所谓右派进攻挂上钩，甚至估计为形成了一股在新闻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暗流，则未免过分夸大了。

二 “五一九运动”。北京大学的学生开辟“民主墙”以大字报的形式帮助党组织整风

进入5月中旬以后，整风运动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复杂性，不仅仅表现为“毒草与香花齐放”这种现象，而且也表现在各阶层人士越来越多地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为了使全党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始终把握住运动的方向，中共中央于5月20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中央除了规定了以后在报刊上的“鸣放”方针外，还特别指出：“为了避免因力量分散、照顾不周而出乱子，目前运动的方面千万不

要太多。在最近期间，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我们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此外不要到处点火，特别不要同时在工厂和学校中发动工人和学生的批评运动，因为工人、学生一经发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具体要求，没有很大精力是处理不了的。因此，在报纸上，目前不应挑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不要登载对经济政策、工资政策的争论。如要发生了工人、学生闹事的事件，应该采取说服教育、合理解决的办法，迅速处理下去。”在情况开始复杂起来的时候，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采取措施，避免让工人及学生整个地卷入进来，这对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确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时间上来说，这个文件的下发却慢了一步，因为前一天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已卷入到运动中来了。

据后来被称为罗隆基、浦熙修的“点火名将”、《文汇报》记者刘光华所说，起初，北大党委“一直慢条斯理地按着既定的步骤进行，即首先只在党内的负责干部中进行整风，学生和一般教员中的党员的整风则拟推迟到暑假中再进行，以免耽误了同学们的学业。但是，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却自动地积极起来参加北大的整风运动了。”③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部分署名为“一些团员和青年”的学生，在大饭厅前的墙壁上张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团委询问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又是如何产生的，希望团委回答。接着哲学系的学生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题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这两张大字报，揭开了所谓的“五一九运动”的序幕。

当晚在全校团员大会上，有人问起民主墙问题，党委副书记崔雄昆答复说，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个回答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第二天清晨（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壁上就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糊满了。刘光华写道：“这里有尖锐

的杂文、短评，有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短诗，也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和极尽讽刺之能事的对联与漫画，不少人针对着崔副书记的话进行批评，批评他实际上是在压制出大字报，阻止同学们放鸣。”到下午 5 时 20 分，贴出的大字报即有 162 张。晚饭后，北大又出现了辩论会的形式，一些人把饭桌当作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晚上，北大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代表党委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崔雄昆的态度表示遗憾，并认为北大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思想异常活跃，而大字报则是提意见的有效方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他希望大家能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协助党向三害作斗争。江隆基讲话后，北大的鸣放形势越发复杂起来。

5 月 22 日，大字报由饭厅附近扩展到宿舍和教学区，到晚上，已达 500 余张。同时多处设置了讲演台，辩论会也多了起来。刘光华写道：“不等规模的、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纷纷展开了。在大膳厅前的广场上，就象是海德公园一样，成千的同学，在倾听一场接一场的激烈辩论。学生会宣布从下午 5 时到 10 时是辩论时间，专辟了两个教室并在广场上搭起讲台，装上播音器供辩论之用。”还有些学生提出，要停课参加民主运动。

5 月 23 日，法律系学生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据当时北大非法刊物《广场》编辑部所写的《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记载：“法律系同学邀请刘奇弟（物理系学生）等三人开辩论会，学生会特地搭了一座辩论台，并安上了麦克风。这是个大型辩论会，参加的人很多。在辩论开始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林希翎（程海果）同学上台发言。……她的某些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当即遭到某些人恶意的攻击，会场秩序大乱。”

5 月 25 日 西语系举行“三害”控诉会。晚上放完电影后 江隆基对同学们说：控诉会是对敌人的，不能对党，要求不再举行。第二天即有许多大字报向江隆基提出了质问。

当所谓的“五一九运动”在北京大学形成高潮的时候，一小部分学生已经不满足于在校内活动了，他们力图将这件事的影响扩展到社会上去。5月26日，北京市高等学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北大一些学生到清华大学串联，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所谓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在这次运动中产生的非法组织“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也派人到北京各大学进行宣传鼓动活动。

但是，当时各报刊在开始几天里，对这件事却未作出任何反应，这显然是中共中央5月20日指示所起的作用。《广场》编辑部写道：“运动已经开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导，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最先打破这种沉默的是《光明日报》。5月25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听说北大学生出大字报，即打电话给该报一记者，叫他去采访，写成报道后，在储安平的坚持下于26日发表。27日，《文汇报》也发表了该报记者刘光华所写的报道。这样，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就捅向了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学生纷纷起来仿效北大学生的行动。一时间，“大字报”成了最为时髦的事物，铺天盖地，糊满了各个高校。例如，5月2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集全校学生大会，动员学生帮助党整风。28日各班学生分别集会，向党提意见并贴出500余张大字报。有些大字报公开提出游行、罢课口号，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校为界，到社会上去！”等。

客观地说，北京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抱着一种良好的愿望而投入到“五一九运动”中去的；学生们在这场运动中发表出来的意见，其中也不乏独到深刻之处，它们对于改善党在高等院校的领导工作，当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从总体来说，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和带来的后果，都是消极的。这主要是因为它采取了所谓的“大民主”的方式帮助党整风，而其效果适得其

反。我们前面提到的几种鸣放形式，如座谈会、报刊争鸣文章等，实际上对于鸣放言论都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即人们是在一定的前提、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气氛等等因素的制约下畅所欲言的。以这些“小民主”的形式所展开的鸣放活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有些问题的性质还很严重，但基本上是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的。而“五一九运动”的“大字报”、“辩论会”等形式则不然，这些所谓“大民主”的形式极易突破任何限制。既然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名义去张贴任何内容的大字报，人们也就不必担心或者难以去追究这些言论的任何道义或法律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大字报”、“辩论会”成为一种合法的鸣放形式，其他的任何制度和法律都将失去效力。加上青年人激荡的旺盛热情和易流于偏激、极端的思维方式，更增加了鸣放的冲击力和不确定性。北京大学的鸣放活动，正是由此而走向混乱的。显然，如果这种现象扩展到全国，整风运动就难以有领导有步骤地达成预定目标。

三 匿名信事件。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

在6月6日的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宣读了他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这封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6月8日，《人民日报》即以此事为由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

什么？》的社论，成为公开号召开展反右派斗争的第一篇有分量的言论。因此，也提高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那么，卢郁文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原来，在开门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对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只谈缺点不提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如5月16日的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就说道：“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

这种看法后来被一些人推向极端，以至于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只准谈缺点错误、不准提成绩优点的不正常现象。卢郁文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发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有些意见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惚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

卢郁文认为，党外人士自己不整风，光帮助领导党整风，提意见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很容易片面。因此，他提醒说，在提批评和建议时，不要忘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民主。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才刚刚形成，还是在摸索中前进，而资产阶级民主却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一不小心，很容易用旧民主观点来看新事物，这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举例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如何工作，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二十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惚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第二，在党与非党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上，必须从两方面去着手解决。

卢郁文认为，在墙和沟的问题上，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接触人物不同，就有不同的感觉。就他本人而言，他没有感觉到他与党员之间有墙和沟。但他仍然承认，从一般情况看来，党与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他说，在拆墙填沟问题上，共产党员应负主要责任，但必须从两面去拆、去填。有理由要求共产党员不骄傲，不见外，民主人士也要要求自己不自卑，不自馁。要求党员先伸出手来，但不能以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方不伸手自己也不伸手。

第三，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意见可以辩驳。

他说，最近一个时期，许多民主人士大放大鸣，向共产党提出意见，并且要求保证不报复。卢郁文认为，在大放大鸣中，所提出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越是言论自由，越应该让对方辩解。只允许自己提意见而不允许别人辩驳，这是自己堵塞进步之路。

此外，卢郁文在发言中对于党外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还批判了章伯钧的一个观点，即章伯钧认为国务院开会不应拿出成品来让大家讨论，说这是形式主义的会议。卢郁文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⑧

卢郁文的发言引起了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的极大不满。她在发言中说，帮助共产党整风，民革成员应该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不能有任何虚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之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她指出，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就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为了社会主义少些波折，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说一切都是因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产生的，那是离经叛道。从她的这些话中，我

们是看不出有任何不妥之处的。但是她接着说的话，却明显地走向极端。她说，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他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她认为，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卢郁文而言。

本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在座谈会上，只要不违背宪法，任何言论都应该允许发表出来。但是，谭惕吾在听了卢郁文的发言之后，却武断地认为他言不由衷，并暗指他为“借机会向上爬”的“无耻的民主人士”，这显然违背了开门整风的精神。民革中央委员甘祠森当时就对谭惕吾的作法提出了意见，他说，不能认为卢郁文的意见是言不由衷，谭惕吾是太主观了。⑦

在5月29日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卢郁文与谭惕吾继续展开争论。卢郁文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给领导党提意见是应当的，对这些意见表示不同的看法，也是应当的。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呢？不公平。他还指出，在拆墙问题上，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立场。不这样，单是共产党拆墙，是拆不了的。谭惕吾在发言中承认，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上，现在出了岔道。她说，在割治三害毒瘤的时候，确实出了些毒草，如关于定息二十年，不要公方代表，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等意见，她是反对的。但是，她也反对从另一方面损害党。她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揭露矛盾，就是要敲警钟，把一些党员敲醒。她说，卢郁文是在代表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⑧

上述的卢郁文和谭惕吾的争论情况，就是所谓匿名信事件的

背景。

尽管谭惕吾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极不妥当，但她毕竟是在公开会议上发了一通议论的，而且仅就内容而言，她赞成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认为这是前提，决不能动摇。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封匿名信给人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在初步形成的自由批评的环境之中，信的作者却躲在暗处攻击、谩骂和恐吓替共产党辩驳的人士，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和愤怒。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事件竟成为发起反右派斗争的导火线。

但是，也正因为这封匿名信起到了这样大的作用，所以当时就有人对这一事件的真伪提出了疑问。例如，对外贸易部法律室顾问×××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给卢郁文的恐吓信是共产党写的，还是卢郁文写的，还是别人写的，值得怀疑。”他还举希特勒火烧国会大厦以及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所谈的基洛夫被暗杀事件为例，意思是说，这封信是共产党制造的，他认为，“这封信即使是别人写的，也不应该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应该像肥皂泡那样，随其消失，否则，就会制造紧张局面，使人感到肃反又来了。”⁹⁾30年后，一位纪实文学作家和记者也持有这样的疑问，她在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品《储安平与“党天下”》中的一个注解中写道：“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⑩

不论是当时×××的“怀疑”也罢，还是30年后这位记者的“倾向于”也罢，他们对匿名信的判断都是从一种想象出发，而缺乏起码的客观依据。即使执政的共产党需要找一个借口来实行反击，也没有必要去制造那种“小把戏”，因为只要了解一下当时的鸣放情况，就会知道，匿名信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一种

不良倾向的典型代表。例如在 5 月 27 日的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为此，有人写匿名信骂他是“逢党之恶”。甚至还有人写匿名信威胁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⑪除了写匿名信这种手段之外，在一些场合还出现了无理阻挠别人发言的情况。如在 6 月 7 日上海复旦大学的全校教师座谈会上，政治经济系教授笪移今在发言中说，现在党在整风，邀请党外同志提意见帮助党来整风，这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说明了党很重视群众的意见。他认为，我们发现党委、党员有缺点，就应该不扩大、不缩小地实事求是地提出来帮助党进行整风，应该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为了帮助党进行整风，还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党的整风指示，特别是指示的第三段。他还说，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当笪移今正在发表上述意见时，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有几个人也同时拍手叫喊，要阻止笪移今继续发言。这时，会场秩序陷于混乱状态。笪移今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然后走过去和舒仲侨握手，说：“你的意见提得很好。”舒仲侨离开会场时说：“太不识相，无耻！无耻！”⑫

由此可见，共产党没有必要再去制造一封给卢郁文的匿名信，上述的不正常现象，也完全可以作一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了。因此，我们说，当时×××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至于 30 年后那位记者无端地将这一事件比作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那就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玩弄历史了。

那么，从匿名信事件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显然，匿名信事件首先说明，当时确实有极少数人，他们不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共产党整风，而是想通过片面的过火的批评一笔抹煞共产党的成绩，以达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目的。

对于这种纯粹破坏性的批评，执政的共产党当然不能任其扩展，而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揭露、制止和正确引导。

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当时主张只提缺点、不讲优点的人士，不一定是站在反对共产党的立场上的。恰恰相反，其中大多数民主人士，是从维护党的领导的善良愿望出发的。从当时的一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非常崇尚中国历史上象魏征这一类敢于直谏的忠臣。早在 3 月份的政协会议上，王造时就发出过“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其少”的感叹；而在整风运动中，又有许多人表示，要做共产党的“诤友”。何为“诤友”？即能直言规劝的朋友。从这种观念出发，他们自然以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就是要直言共产党的缺点；如果在整风时还尽讲好话，就如谭惕吾所言，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的表现。显然，对于这些人士提意见的出发点，我们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我们所反对、所否定的，只能是他们提意见时的主观性与片面性，以及那种容不得不同意见的极不妥当的态度。

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共中央的整风部署，对于这些人士提出只讲缺点的主张，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在 4 月 30 日天安门城楼的座谈中，毛泽东就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好，暂时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号召整风，而集中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在 5 月 10 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副主席史良提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这时，李维汉再次申明，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了，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⑬李维汉所说的“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当然可以理解为“只讲缺点，不提优点”了。陈铭枢正是在此之后提出只谈缺点才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

事情就这样变得复杂了。同一种倾向之中，又包含着几种不同的情况，对于这种复杂性，当时有的党外人士也看出来了。匿名信事件发生之后，国务院参事万枚子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说，葛佩琦、王德周的发言有严重的反社会主义情绪，是极端反动的；但是储安平提出“党天下”、杨玉清提出“下轿”、“下台”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他认为，他们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坏的影响。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万枚子还谈到了第三种情况，他说，谭惕吾、陈铭枢对党“忠心耿耿”，是“拥护党”的，只是给党提的有些意见内容不对。这要与脱离党的领导分开来。^⑭万枚子所作的具体分析，不一定准确，但他提出了要区分不同情况的观点却是很必要的。

但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对匿名信事件却做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显然，这个结论将匿名信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估计得过分严重了。

四“六六六会议”。章伯钧召集六位教授，在
6月6日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章伯钧等
人急于向中共负责人反映局势的严重性

6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6位大学教授和其他几个人，

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6月6日6位教授 故称为“六六六会议”。这六位大学教授是：

曾昭抡，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费孝通，原清华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参加会议的还有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请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金若年出席了会议。胡愈之在会议开始前即离开会场。

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闵刚侯写了一篇题为《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的揭发文章，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追述。尽管闵刚侯在文章的开头写道：“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许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象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之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⑮但事隔近一个月，个人的追述与实际的发言内容难免要有所出入，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对闵刚侯的措词不能不有所影响。因此，我们还必须参考一下其他人的有关回忆材料，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

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章伯钧等人举行这次会议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闵刚侯断言，“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的曾昭抡、费孝通和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闵刚侯的这个论断——实际上也就是中共中央对此所作的结论——是很值得我们重新研究一番的。

果真是章罗结盟的会议吗？闵刚侯在下这个断语的时候，显然忽略了民盟副主席史良一贯的政治态度。众所周知，史良一贯是站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立场上说话的，在整风运动刚刚发动的时候，史良就坚决反对罗隆基的观点，表示要和他争鸣一番。^{①⑥}那么，如果“六六六会议”有任何结盟反党的迹象，史良不会觉察不到，也不会不表示反对的。而事实是，史良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在发言中建议，他们几个人一同去向共产党的负责同志反映情况，这种情况说明，“六六六”会议根本不可能是章罗结盟的会议。

果真是一次“点火”的会议吗？这个结论也错了。恰恰相反，这是一次“灭火”会议。章伯钧后来交待说：

“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时任高教部部长——笔者）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①⑦}

章伯钧等人一再指出局势的严重性，无非是强调“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如果继续“放”，民盟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但如

果要“收”，共产党就不能离开民盟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局势已经严重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这正是民盟发挥作用的时候。

第二天会议的发言，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主张“灭火”的动机。费孝通回忆说：

“中午章约史良、胡愈之、叶笃义、黄药眠……和我十二人在文化俱乐部吃午饭座谈，除胡、闵、金没有发言外，大家都谈了。在情况估计上，除吴景超觉得人大正常之外，都认为是紧张和严重的，有人说这是匈牙利事件前夕，所不同的就是学生还没有找到头儿，教师们和学生一联起来，上了街，就会闹大了。……

“盟应当怎么办，做工作是应当的，但是这里关键是在动向问题，我在会上提出，盟的领导在帮助党整风运动中曾否和党联系过。盟的方针只是解除顾虑，有啥说啥，是不够的。章回答是没有联系过。……当时，大家都要几位副主席赶紧找党的负责同志谈一谈，其中也包含了错误的看法，就是对党中央是否已掌握了各校实际情况有怀疑。章说可以找周总理、李部长（李维汉）、康生、彭市长（彭真）。史良副主席主张在座的人一起见党的负责同志，问我们是不是愿意象会上一样都说出来，我们都说愿意。她说晚上要遇见总理，如果总理同意，当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谈，各人留下电话，由叶笃义联系。”^⑮

费孝通所谈的情况和章伯钧的交待是一致的。章伯钧回忆说：

“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

“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们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⑯

想必中央已经决定了大规模反击右派的方针，周恩来不便于表态，只能“未置可否”了。

将“六六六”会议定为“点火”会议，显然难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章伯钧等人为什么急于同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谈谈？特别是史良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积极性，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如果是为了“点火”，如果是为了把事情闹大以迫使共产党下台，章伯钧等人就会在这“匈牙利事件前夕”下到基层，去“呼风唤雨，推涛作浪”而不应该急于同中共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因此，答案只能是：章伯钧等人急于向中共负责人反映局势的严重性，以促使中共下定“收”的决心，并赋与民盟更多的政治责任。所以我们说，“六六六”会议不是“点火”会议，而是“灭火”会议；把这个会议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顶点”，^{②①}也属不实之词。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这次会议不是一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但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

第一，在这次会议上，一部分人过分夸大了局势的严重性。如章伯钧在会上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还有的人认为，当时的情况很象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②②}后来章伯钧承认，他所说的计委门口贴大字报的事，是道听途说，不符合事实。^{②③}

第二，在这次会议上，一部分人过分夸大共产党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如章伯钧在会上分析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标准了。他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

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②③}还有的人认为，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作风问题。

第三，这次会议对形势以及党所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估计，还使一些人过分夸大了民盟的政治作用。有的人认为，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章伯钧指出，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办法收的时候，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他认为，民盟现在大有搞头，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发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他建议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②④}在他们看来，局势的发展超出了共产党的估计，共产党已经陷入困境，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住局势。这也是他们急于同中共负责人取得联系的根本原因。这种过分夸大民盟政治作用的观点，不仅容易在实践中产生忽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而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伯钧等人利用“危机”迫使中共给民主党派更大权利的政治野心。至于这种野心膨胀到何种程度，是否已严重到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取共产党而代之的程度，当然是应该分析的。

五 一部分人士发表了一些言辞颇为激烈 尖锐的言论，在当时引起较大争议

在 开门整风运动中，还出现了不少言辞颇为激烈、尖锐的言论，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这个意见是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国家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 5 月 21 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他说：

“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意，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②5}

2.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在开门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担心现在向共产党提意见，将来会遭到打击报复，因此提出要共产党作出保证。民盟副主席、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在 5 月 22 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就是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②6}

3. 储安平的“党天下”。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认为，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上。这是他在 6 月 1 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表的看法。他说，“政党取得政权的主

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②7}

4. 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大主义的根”。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对储安平“党天下”说法大加赞赏，但认为还未说透。在此后几天的民盟座谈会上，他多次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他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一党治国”，话没有说完。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他还说，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越整越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②8}

5. 杨玉清的“下轿下台”。

在5月31日政治法律学会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在发言中把整风运动叫作“下轿”运动。他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子的人也不愿放下轿杆。他认为，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

次运动想“收”不想“放”。他还说，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歌功颂德的人是不为人所称道的。他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

②9

此外，还有“定息不是剥削”“定息延长 20 年”“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等等言论，有些人甚至还提出了“轮流做庄”的要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言论呢？

当我们分析上述言论时，首先会发现，这些言论在思想性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些言论中最容易引起人们义愤，因而也最能用以说明大规模反击的必要性的，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所谓“杀气腾腾”的言论。但我们稍加分析这些公开的材料，就不难看出，这一类言论几乎谈不到什么深刻的思想性，而完全近乎一种情绪的发泄。既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踱些言论也就极少有任何深入批判的价值。

但是，我们对于另一类言论却不能等闲视之。一些在旧社会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影响、曾为“第三条道路”而奔波的政治家类型的人士，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的言论却有着比较深刻的思想性。这些言论，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这些人士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兴趣与向往。对他们的主张，执政的共产党当然不能保持沉默，而必须展开批判。此其一。其二，这些言论不是情绪一时激动的产物，而是针对时弊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尽管这些人士不同程度地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的影响和支配，他们的主张仍然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章伯钧在提出“政治设计院”这一主张时，曾说道，如果共产党在工作进行之初，就能多听听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这个意见对于执政党的政治建设，当然具有参考价值。因

为一条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关键在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再如，储安平的“党天下”，虽然与事实有着严重出入，而且关于“联合政府”的说法早已落后于时代，但这一段议论对于执政党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领导，如何进一步调动各方人士的政治积极性，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此，对这一类有着比较深刻思想性的错误言论，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批判态度。一方面，我们必须有分析地批判这一类言论，要避免全盘否定的作法，避免将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一同否定掉，以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开展有较高理论水平的论理性批判，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人。不管这些言论的错误性质有多么严重，它们都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况且这些言论还是在执政党的一再倡导和鼓励下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发表出来的。正如毛泽东所言：“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③⑩}因此，这种论理性的批判绝对不应该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击运动。

总之，5月及6月初发生的一些不寻常事件及各种错误言论，说明当时的中国确实出现了一种同通过整风运动加强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相容的倾向。民革副主席何香凝曾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比较准确的分析。她在6月1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

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何香凝不仅从政治觉悟和态度上对民主人士作出了左、中、右的划分，而且还预见到了整风运动将会出现一个转折，即由领导党整风，转向民主党派整风。她说：“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③①}

可以看出，何香凝已经指出了“反击”右派的必要性，当然，这种“反击”不是指任何过火的斗争形式，而只是对极少数右派的人的“教育和批评”。

注释：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8、19日。

《人民日报》1957年8月14日。

③《文汇报》1957年5月27日。

《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8日。

⑤《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⑥《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⑦《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⑧《人民日报》1957年5月30日。

⑨中共对外贸易部党组：《想一想，对不对》第1号。

⑩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215页。

⑪《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⑫参见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和6月8日《文汇报》。

⑬《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⑭《人民日报》1957年6月11日。

-
- ⑮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 ⑯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
- ⑰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 ⑱ 见中央民族学院：《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第二辑。
- ⑲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 ⑳ 见迟蓼洲编：《1957年的春天》第74页。
- ㉑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 ㉒ 《人民日报》1957年7月7日。
- ㉓ 《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 ㉔ 同上。
- ㉕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 ㉖ 《人民日报》1957年5月27日。
- ㉗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 ㉘ 《光明日报》1957年6月8日。
- ㉙ 《人民日报》1957年6月5日。
- ㉚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
- ㉛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第五章 毛泽东作出反右派斗争的决策。这个决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依据的，但他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失误了

- 一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没有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定改变整风主题。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是在“五一九”之后

毛泽东关于反击右派决策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如下的三个阶段。

1. 5月中旬，毛泽东从“左叶事件”和一些错误言论中，觉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因此有了反击的思想准备，但并未作出改变整风主题的决策。

不少人在研究1957年这段历史时，都认为，毛泽东是在5月中旬作出大规模反击右派的决策的，其标志就是他在此期间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而此后的开门整风，也就成为“引蛇出洞”的一场大“阳谋”了。如一位作家在《储安平与“党天下”》这篇所谓纪实文学作品中就写道：“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

风》；如不但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 16 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 这样一来，5 月中旬及其以后的整风就不再是为了揭露和清除党内的“三风”，而是为了“制造”右派了。

这个论断显然背离了最基本的事实。首先，《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在 5 月中旬并未“下达”党内，在 5 月下旬，甚至在 6 月上旬也没有“下达”党内。直至 6 月 11 日，毛泽东才在这篇文章的清样稿上写下了印发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的批语。而此时，《这是为什么》的反右派社论已经发表 3 天了。

其次，《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不能证明毛泽东已经作出改变整风主题的决策。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 5 月中旬，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例如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了党内修正主义思想的危险性，并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还提出，“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这些话表明，此时毛泽东已经有了反击右派的思想准备。但是，毛泽东这时候的思想变化并没有突破既定的整风主题，反右派是从属于党的整风任务的。

这篇文章的原文为《走向反面》，其含义在文章的一开头即已指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那么，有哪些事物在走向反面呢？毛泽东在文章中至少有三处提到了“走向反面”的情况，一是在谈到党内党外的右派时，毛泽东说他们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如果不改邪归正，就会自取灭亡。二是对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而言，毛泽东提出，我们需要这些人对我们

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三是在谈到整风任务时，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

从毛泽东对“走向反面”的三种情况的论述中，我们很难得出他想改变整风主题的结论。相反，毛泽东所以列举这三种情况，恰恰是为了肯定整风的主题和方针：通过开门整风，共产党内和民主党派内的整风走向反面，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走向现状的反面，我国的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至于说到右派“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分夸大了局势的严重性。然而，这种看法也是不确实的。在这里，毛泽东仅就右派的主观愿望而言（他用了“想要”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已经既成事实，果真形成了一股“台风”。那么，这段话也无非是说明：他们走到顶点，也就走到了反面，“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联系到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开门整风方针的消极抵触情绪，以及“从此天下多事”的担忧，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指明形势的严峻性，不如说是他想向党内的那一部分人证明：即使在开门整风中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最后，毛泽东在 5 月中旬留下的其他文字材料，也能说明这个问题。5 月 14 日，毛泽东在 5 月 10 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该版刊出了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 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

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仍然是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并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称为“天下第一大事”。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又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前一阶段开门整风的基本方向和总体效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同时也就说明，毛泽东仍然希望整个运动能够继续循着既定方向发展下去。而对于右派的挑拨性言论，毛泽东主张，“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从上述材料和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是放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上，还没有作出大规模反击的决策。他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但他又认为，在几个星期之内，主动权掌握在右派手里，他们或者继续胡闹，或者改邪归正。而共产党究竟会采取什么措施，则还需要根据事情的发展变化而定。

2. “五一九运动”兴起之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他于5月25日发出的警告，表明他已作出改变整风主题的决策。

5月19日以后，高等院校的学生们以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投入到整风运动之中，这就使开门整风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在“大民主”的冲击下，一些学校的党组织已经不能正常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了。这种结果，完全违背了整风的初衷。而且，这种“大民主”之风如果不及时地加以控制，很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出了警告。

在北京大学的“五一九”运动兴起之时，正值青年团在北京

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种巧合，赋予了这次团代会一项特殊的使命，即向广大青年学生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声音。5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指出：不能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了，不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在思想的和政治的风浪之中。现在的‘大鸣大放’，人们对很多问题正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党内，也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这里就发生了争论。在争论中，有人表现很好，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就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或者‘左’倾机会主义者。有的人犯了错误改正过来了，有的人犯了错误就不改。所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政治上的风浪和思想上的风浪。这种风浪以后还会有，甚至还可能有更大的风浪。……你们配不配得上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就要看你们在风浪中能否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是否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立场》的醒目标题报道了陆定一讲话的消息。同时，《人民日报》对头一天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的发言报道配以《讨论逐步转向深化》的大字标题，由此使一些党外人士产生了《人民日报》似乎想“收”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感觉是对的。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团代会的全体代表时，向开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言论和错误行动发出了警告。他向青年代表们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④毛泽东特别提到的“行动”，很可能是针对北京大学的“五一九运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公开警告，表明他对于开门整风的态度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在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时，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既定前提（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下如何

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上；而到了 5 月下旬，他则严重地关注着这一前提本身。

毛泽东的这一变化，也体现在他对 2 月 27 日讲话稿的修改上。5 月 25 日，即接见团代会全体代表的那一天，他在 2 月 27 日讲话稿中加写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同一天，毛泽东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时，又指出：百花齐放就是有利于团结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还有一条——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这算是标准，符合的就是香花，不符合的就是王八蛋。

在 5 月 25 日前后，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5 月 24 日，他在修改 2 月 27 日讲话稿时，加写道：“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 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尤其指出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所谓‘教条主义’，但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即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这种思想在实质上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映。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

的危险性，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充分注意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⑥毛泽东加写的这些内容，很清楚地表现出他在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毛泽东此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整顿三风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是在党内肃清修正主义思潮的问题。

3. 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成为“引蛇出洞”的手段。到了6月8日，毛泽东抓住匿名信事件这一契机，发动了全民的反右派运动。

毛泽东和中央关注的重点变了，作为整风的手段之一——鸣放的目的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党内那些对开门整风方针持抵触情绪的干部，他们一旦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击意图，理所当然地要推波助澜，积极地将各种鸣放形式转化为“引蛇出洞”的手段。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二是为即将发起的反右派斗争制造了更多的目标。原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施平回忆说：

“‘反右’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听取各校关于民主党派、教师、学生帮助党整风‘鸣放’的情况，布置各校抓紧时间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着重交待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⑦

由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返回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所以他对这种战术也给予了肯定和支持。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组

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其中将“引蛇出洞”列为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战术。他写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⑧实际上，所谓“引蛇出洞”就是各单位党的负责干部想方设法让自己主观认定的右派把“毒素”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

“引蛇出洞”战术所造成的假象使毛泽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断。他在为《人民日报》所写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中断言“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此以后，党的八大所判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就被逐步扭转，客观上已不是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又被逐步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致产生了一连串的逆向发展，终于把我国推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二 毛泽东改变整风主题的根本动因。

他认为：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

在 4 月 30 日天安门城楼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但是，仅仅过了 20 余天，毛泽东就重新返回到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观点上，果断地改变了原定的整风主题，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现在还缺乏有充分说服力的能够直接说明这一问题的第一手材料。但从当时的形势变化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出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些动因。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动因，就是 4 月 30 日以后的形势发展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即：从“左叶事件”、“五一九运动”以及各种尖锐的批评意见中，毛泽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些曾经主张过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借着共产党开门整风的机会又死灰复燃，企图摆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有在中间群众中扩大其影响的趋势。这显然违背了开门整风的初衷。

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在历史上，章伯钧和罗隆基等人都曾倡导过“第三条道路”。在反右派运动中，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曾揭发说：“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在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去。……章伯钧就在华东、西南、西北布置军事活动，满以为有了枪杆子，就可以称王道霸，至少可以同人民政权和蒋介石三分天下。罗隆基就勾搭美帝国主义，要美国扶植中国所谓‘第三种势力’。罗隆基曾经向司徒雷登建议：‘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是买民主同盟这匹马罢。可以保你赢回来。’”^⑨还有人揭发说：“他（章伯钧）对于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引用马歇尔的话说，中国‘亡国，不是亡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他说，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给了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跟苏联走；由于有了这种错觉，美国在当时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

快垮台。从这里说明 他对蒋政权在大陆上的覆灭 是惋惜的 对中间势力的企图没有得到实现 是有余恨的。”^⑩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吴晗还揭发了罗隆基在 1948 年提出的一纸准备交给中共中央的政治纲领，主要包括：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罗隆基起草了这份政治纲领后，曾拿到上海盟内讨论，遭到史良、许广平、楚图南等人的反对。但罗隆基仍然让吴晗带到华北解放区，要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出。由于当时沈钧儒没有在华北，而在东北解放区，所以吴晗没有把这份政治纲领交出来。^⑪

作“党天下”发言的储安平，也曾经以“自由思想分子”自诩。1947 年 3 月 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写道：“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⑫

在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发表之后，毛泽东曾对那些倡导“第三条道路”的“自由思想分子”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 国民党是不好的，

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⑬但是，对于这些“自由思想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毛泽东并没有太多的担心。他相信，人民革命的洪流终究会把这些人也卷入进去的。他满怀信心地写道：“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⑭

毛泽东的这个预料是准确的。例如储安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政治态度即发生较大变化。他在题为《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的报道中写道：“在我们讨论政府的时候，从行政的观点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党的党员，当他在政府工作时，他应当按照行政组织的系统，发生领导与服从的关系；但从政治的观点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党的党员，或者是没有党派的人士，无论他在哪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在政治上，他是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的。”^⑮当时其他的“自由思想分子”也不再提什么“中间道路”，表示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一些揭发材料证明，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并不那么心悦诚服。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于“第三条道路”的破灭总有些不太甘心。如 1956 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上传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曾说道：“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还有民主。资本

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①⑥}这说明，在中国的民主人士中，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承认，而谈不上什么心悦诚服。正如毛泽东在 1957 年 5 月中旬所指出的：“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①⑦}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当时的揭发材料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全貌，如当时的揭发大都片面地强调了他们在历史上走“第三条道路”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他们曾经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进步历史的一面，这就容易得出一个片面的结论。况且，由历史问题推论出现实的政治态度，否定了其间的发展变化，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实际上，他们的第三条道路，是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不了解或不赞成共产党的彻底革命纲领，而又仰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产生的，况且，后来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条道路”遗愿虽在，但内容也随着局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些人对于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或多或少地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但不管怎么说，与“第三条道路”斗争的这段历史，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了的。由此也就可以推断出，当毛泽东听到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时，必然要联想到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他不能不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没有改造好的“民主

个人主义者”，是不是想借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重新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号？

毛泽东的这种担心，随着开门整风中出现的三种特殊情况而加重了。

第一，一些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士，以自己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为资本，向共产党对于文化、科学事业的领导提出了挑战。

毛泽东在 1949 年就向全体共产党人提出了学习的任务，希望他们通过刻苦的学习，能够很快地掌握领导建设工作的本领。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多数来自农村，文化基础很低，他们的文化素质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就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而从主观上讲，一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人，长期满足于当外行，没有努力地学习领导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共产党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的弱点。在开门整风中，一些人士（主要是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尖锐地批评了这方面的弱点。如在 5 月 8 日上海《解放日报》召集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的一位教师就反映说，领导对教学业务抓得不够。教学改革已经四年，校长到现在还是讲“我是一个外行”。她每年到中央开会，回校后便照搬下来。今年中央没开会，校里的教学工作就没有很好安排。⑮毛泽东就是在看了这次会议的发言摘要后，写下了“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的批语。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广州座谈会上，华南工学院教务长冯秉铨发言说，有不少党的领导干部不懂高等教育的特点，不懂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连这方面的常识都没有，我们说要办一所高等学校，他们却要开一个百货商店，这是完全两样的东西，怎么能够样样都听他们的呢！⑯这些，确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作方面存在的一种偏向，值得引起党的负责干部的严重关注。

但是，在开门整风中，当一些党外人士，抓住共产党这方面

的弱点大作文章，提出了“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口号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作出判断，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想以自己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来与共产党重新作一番政治上的较量。也就是说，共产党在政治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却又处于相对的劣势；相反，那些在政治上居于绝对劣势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却又占有相对的优势。这样，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然要扬长避短了。具体地说，就是抽象地肯定共产党的领导，而又在实际部门具体地否定或摆脱这种领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向薄弱环节进攻的挑战，当然是很严峻的了。

第二，上述情况必然带来争夺中间派的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影响的人士，肯定是孤立的；但是，他们在知识分子阶层的中间派中，却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些人士在开门整风中的活动，使这种影响有扩大的趋势。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争取中间派的问题。他在 1940 年说的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他在 1957 年的决策，是很有启发的。他指出：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②①}

尽管 1957 年的情况同 1940 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957 年的右派，不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难以与

共产党相抗衡，不能与 1940 年的顽固派（即蒋介石国民党）相提并论。但是在争夺中间派这一问题上，却有某些相似之点。在 1957 年，毛泽东深感担心的是：右派虽然数量不多，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活动很有可能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拉过去，甚至一部分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一九运动”中也被裹进去了。毛泽东由此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建国 7 年来，共产党对于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多数人（中间派）的领导权是不巩固的。毛泽东深知，从实力上说，粉碎右派的进攻并不是一件难事，而真正的困难在于教育和争取中间派。按照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想法，在右派一冒头的时候，就应该一棍子将它打回去，当然，这完全可以做到。但毛泽东则认为，这样做达不到争取、教育中间派的目的。毛泽东主张，不要急于反驳右派言论，要让其充分暴露，任其“走向反面”，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予以有力的驳斥，这样才能够使中间派人士受到深刻的教育。由此可以看出，对右派的大规模反击，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是粉碎右派的进攻，二是争取和教育大多数的中间派人士。后来，毛泽东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在 7 月份说道：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

他还说：“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群众，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②1}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在右派充分暴露之后，以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击退他们的进攻，这对于中间派人士是一次最为深刻的教育。这也正是毛泽东主观决策的真正含义所在。

第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开门整风运动就是要造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内外夹攻”的局面。但是，开门整风中实际形成的“内外夹攻”，却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一部分共产党员已经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而是与社会上的右派相呼应，向党发起了进攻。这种现象，也使毛泽东深为担心。

在5月份的开门整风中，执政党周围初步形成的自由批评环境，对于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一部分党员也开始对党组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甚至中央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了措词尖锐的批评。这种党内自由批评的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客观地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进一步加强了党内监督。但是，由于一些党员发表出来的意见，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错误倾向，在客观上与社会上的错误言论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所以这种现象也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例如，在5月上、中旬的“左叶事件”中，为《文汇报》写出《尊重新闻记者》这篇措词尖锐、笔调别致的社论的一位著名记者，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对报纸的阶级性问题提出不同看法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以及主张新闻应该抢先的《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都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②毛泽东所提到的“他们”，当然包括了上述几位共产党员。

在开门整风中，一些共产党的负责干部甚至成为社会上右派

分子的“内应”，可能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惊。反右派斗争发动之后，他曾谈到这个情况：“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②③}清华大学的“起义分子”，指的是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后来该校党委会议揭发说：“在右派分子进攻最猖狂的时期，袁永熙和受他影响的同志里应外合地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向党进攻。袁永熙向党进攻是有‘策略’的。他在这段时期的党委常委会议上不发一言，借口到基层去参加会议，逃避正面争论，并劝受他影响的同志‘不要和他们（指党委领导同志）争，等一等再看。’但在下面他却大肆活动。他进攻的主要手法，就是故意挑起党员对党委领导核心和坚持党的方针的同志的不满情绪，把进攻的矛头引向这些同志。他用不同的说法诬蔑了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如说：‘某某人在常委会上气鼓鼓 某某人憋着一肚子气。’‘某某人压力大 很紧张 不敢放。’‘某某人应该在这次好好整一整’，‘这些人就是不虚心 不肯检讨’。”^{②④}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开门整风中死灰复燃的曾主张过“第三条道路”的势力，他们的观点已经不象 1949 年那样 仅仅是残存在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头脑中的思想意识问题了。在 1957 年，这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有了一个突破口，即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和科技界；也具有自己潜在的群众基础或争取对象，即动摇不定的中间派；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共产党内具有“修正主义”思想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党员干部的配合行动。这样，党内党外的右派们对这条道路的鼓吹，就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政治斗争问题了。毛泽东后来说道：“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分有

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分。”^{②5}

由于对受西方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中间势力和党内状况，都作了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严重估计，从而夸大了敌对势力进攻的严重性，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转换斗争目标，自然就否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原定的主题。

三 毛泽东之所以改变整风主题，除了根本动因之外，还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社会安定、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等方面的考虑。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大规模反击右派的决策，除了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除“第三条道路”的影响，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根本动因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因素，也起到了程度不等的促成作用。

1.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当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运动时，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央的方针抱有消极抵触情绪。对于这种情绪，党外人士也有所觉察。据费孝通回忆，“六六六”会议的前一天，章伯钧就对胡愈之、曾昭抡、钱伟长和他说：“我们要跟毛主席走。”意思是说共产党内有分歧，上放下不放。当时，这种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有所夸大。前面提到的清华大学党委的“起义分子”袁永熙就曾说过：“毛主席受到很大压力 国内告急 电报雪片飞来 都要求收。”^{②6}北京大学个别学生甚至编造了胡耀邦“谈话”的谣言。据中宣部6月4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说，“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叶子望前天写了一篇非常反动的文章，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这篇文章已油印在校内外散发，据北京市委昨天了解，矿业、石油等六所学校学生中已在传阅，震动很大。文章内容歪曲了胡耀邦同志在接见团三大代表时的谈话，说胡耀邦同志曾经说

过：‘中国现在的家很不好当，苏联赫鲁晓夫当得也不容易，我国的毛主席现在处境也很困难，党内有人想不要毛主席’。据此，加以引伸发挥，大肆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受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受到了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并说这些人中间也包括陆定一和彭德怀等同志在内。在文章中呼吁维护毛主席反对党内的保守势力。”

叶子望提到的胡耀邦“谈话”情形，最先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潘家威透露出来的。潘家威在《整风运动中北大党委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

“1957年5月24日下午16点35分到17点13分正当团代会通过改名为共青团之后，团中央书记接见我班六个团员。由于团代会很忙，他没有对我校问题作具体分析。他谈了些情况，作了些原则性的指示。

“书记首先谈到‘当家难’。‘难啊……难啊……’书记说，‘朝鲜金日成当家，苏联赫鲁晓夫当家，……中国毛主席当家 我看啊，中国这个家最难当——穷，落后，六万万人民！’他说，我们要改正错误，又要让敌人不钻空子。书记谈到，有人要毛主席下台，说如果没有主席，就不需要整风了。……”

潘家威还写道：“毛主席最初提出整风时遭到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反对，甚至有人退出会场，大家都听了传达，不必多说。还有传说在我们最熟悉的领导人中也有不表示赞成的。”^{②7}

胡耀邦确实接见了北大的几位团员，但从当时党内的情况看，他根本不可能与几位青年人谈到“有人要毛主席下台”这样的话。后来叶子望也承认，这句话是他从胡耀邦谈到党的历史上一次大的风浪这件事中推测出来的。由于这句话毫无事实根据，所以毛泽东看了有关叶子望的材料后，批示说：“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显然不完全是谣言本身，更重要的是谣

言传播出去所造成的影响。很明显，这种谣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并不完全是凭空编造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根据”，即党内 在整风问题上客观存在的消极抵触情绪，以及胡耀邦谈话。所以，这种谣言传播出去，必然要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好象共产党已经面临分裂了。这种谣言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为在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看来，当时党内存在消极抵触情绪的党员干部，竟然要毛主席下台，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这种谣言散播开来而得不到及时的澄清，也将会把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的党内矛盾推向激化。对于这种谣言的危害性，陆定一当时就意识到了。他在给毛泽东报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时写信说：“主席：送上‘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一份。请您把第一页（即有关叶子望的材料——笔者）看一看。右派正在进行大阴谋，值得注意。因此，此次人大，可能出现一种激烈斗争，包括我们现在还估计不到的东西，例如提出胡风案，对某些同志的人身攻击等等。”

对于这种严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有所考虑。当然，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提倡“内外夹攻”主要是针对党内的不良倾向的。但是，他在批判党内不良倾向时，从来都没有忽略根本立场这一问题。他在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时就指出，“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②③}因此，当毛泽东觉察到右派企图利用共产党的矛盾，在党内制造分裂时，他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个大局出发，必然会对整风运动作出新的部署。恰如 1956 年 12 月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指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也就是说，当右派的进攻威胁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时候，毛泽东可以对党内某些错误倾向作些让步或松动，以使全党统一到对敌斗争的大目标上来。等到对敌斗争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和风

细雨”地解决党内矛盾。

2. 为了维持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

在工作和学习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搞好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各级党组织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为了保证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毛泽东和中央一开始就强调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和风细雨”问题，即避免任何过火的斗争方式，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二是“整风工作两不误”，即避免离开工作和学习岗位整风，而要将整风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工作中整风，用整风促进工作。毛泽东和中央强调的这两点，是整风主题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整风目标的根本保证。

但是，在“五一九运动”兴起之后，“大民主”的冲击波却严重地干扰了高等院校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对于校党委维持正常的学习秩序的作法极为不满，极力主张停课搞运动。前面提到的潘家威指责校党委说：“整风学习两不误，校委会通过决议，一切照常进行，还要关起门考政治……不是很明显么——要把群众运动搞垮。”^{②9}该校“百花学社”成员公开向校团委书记声称：“我们现在是和你们争取群众，到了时机我们就要改造学生会，改造共青团和党委会。”^{③0}清华大学的情况更为严重一些，据该校副校长钱伟长所说，“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③1}而当时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的行动。6月2日，林希翎在校内贴出布告，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布告贴出以后，在学生中引起很大影响，有些学生要求听。校党委知道后向林希翎做了劝说工作，林同意不宣读了，党委并向学生作了交代。但6月3日夜林希翎却又在赶写秘密报告的全文。该校党委深深怀疑，林希翎很有可能把秘密报告的全文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③2}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都和这一秘密报告的披露有着

直接的关系。这篇报告虽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作过传达“美国之音”也作了广播，但在中国一般公众中还不广为人知。现在，当人们对波匈事件记忆犹新的时候，林希翎又要在大学生中把这一报告公布出来，会产生何种后果，是领导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3. 为了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尽管当时苏联共产党没有公开表示出来，但从赫鲁晓夫对待“双百”方针的态度上，我们不难推断出苏共是不赞成中共的开门整风的。他们怀疑中国是在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尤其反感的是，中共竟然让那些“反苏”言论自由地鸣放出来。原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拉赫马宁所写的《苏中关系 1945—1980》一书也证实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反苏言论构成了右派进攻的最重要部分，而右派得到了发表反苏言论的广泛可能。例如，中共的一个省委机关报《黑龙江日报》大量引用了一个叫金玉海（译音）的人的言论，此人号召‘收复被苏联侵占的土地，在‘复仇的口号下，为反苏流尽最后一滴血’。……在《长江日报》上引了一个右派分子钟玉文（译音）的话，说‘海参崴和蒙古是中国的领土’。然而，中共领导继续实行自己的‘等待’方针，不去揭露右派的反苏谰言，这决不是偶然的。

“由于中国当局纵容，右派分子就试图从宣传走向直接挑衅。例如，1957年2月在西安，有一百多人手持反苏标语闯进苏联专家居住的旅馆院内。1957年5月，反苏分子打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访问广州期间进行挑衅。

“……右派言论出了单行本，作为政治学习材料加以推荐。这一切都说明，1957年民族主义分子利用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和反苏言论，在中国人民的广大阶层中散布了反苏谰言。但是，毛泽东集团却竭力用不参与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③③}

当然，拉赫马宁在书中用的是中苏交恶时的语言，但从中也

不难推断出，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于中共听任反苏言论鸣放出来，是存在着很深的猜疑和不满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来华访问的伏罗希洛夫作些解释，所以他在 5 月 25 日会见这位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介绍了他所制定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后一条，即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明显是针对那些对苏的不满言论而言的。这样，对于随后到来的大规模反击，从这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说明：如果对于右派言论不实行坚决的反击，那就会加深苏共的猜疑和不满，有损于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在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是极为重要的。后来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也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象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从上述的种种因素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作出大规模反击的决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依据的，他的许多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却失误了。其一，当时各种言论所表现出的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当然其中也包含了某些政治斗争的成分。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这种思想上的交锋主要是敌对阶级间的政治斗争，这势必要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其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思想教育，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但毛泽东却试图通过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迅速地使人们从思想上转过这个

弯子。过急地转弯子常常会人为地激化矛盾，造成不良后果。由于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失误，这种反击的扩大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四 以群众自发反击的形式，打开反右派斗争局面；将“章罗同盟”作为主攻目标；毛泽东提出：还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

（一）以基本群众的自发批判打开反击右派的局面

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转向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反右派运动，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重大转折。为了顺利地实现这种转折，毛泽东和中央在6月8日前后对这场斗争作了比较周密的部署。

6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今后的整风，要用大鸣大放的方法加紧进行。他认为，“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在这里，毛泽东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竭力主张的“大鸣大放”和“大字报”接了过来，把它们作为反击右派的主要方法。毛泽东还强调了反击右派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他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毛泽东第一次说明了即将发起的反击运动的性质和规模。为了使各级党组织作好思想准备，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将本单位人数按照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毛泽东还指出，“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

6月8日即《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所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

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对反右斗争的过程和方式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提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③4}

6月10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党内指示，向各地党组织通报了北京反右派斗争情况。他指出“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毛泽东要求各地党组织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

6月12日，毛泽东在5月中旬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党内。

上述情况说明，这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是中共中央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

但是，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这次的反右派运动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打开反击右派局面的公开力量，不是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而是工农基本群众，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左、中派群众。也就是说，反右派运动的发动，是以群众自发反击的面目出现的。这个特点，在最初几天的《人民日报》上充分体现出来了。

6月8日是公开反击的第一天，《人民月报》第一版以“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的大字标题报道了石景山钢铁厂职工批驳储安平、葛佩琦错误言论的消息。报道说：“报纸上登载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钢铁厂广大职工的愤怒。7日下午7时，石景山钢铁厂工会召开包括

工程师、职员、工人共 17 人的座谈会，会上对这种写匿名恐吓信的卑鄙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对于连日报上发表的种种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

6 月 9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的大字标题报道了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反驳错误言论的座谈会。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出了通栏标题：“对反社会主义谬论无法沉默 觉悟的工人群众起而应战”几乎整版刊载了各地工人群众对于错误言论的反驳，以此表明“工人说话了”。

6 月 11 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又以“请听听农民的话”的标题，介绍了武汉市郊区群力农业社农民举行座谈会驳斥错误言论的情况。

6 月 12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郊区四季青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对于错误言论的驳斥，标题是“农民和工人将团结得更紧密”。

可以看出，反右派斗争的最初声势，主要是这种由党委或其他方式组织工农基本群众开座谈会等的批判造成的。由“自发批判”来造成反击声势，很显然是中央意图的体现。因为从策略上讲，各种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是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放出来的，在这些言论还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的时候，如果共产党的组织直接出面反击就不易被中间派人士理解 他们会想到 既然是帮助共产党整风，怎么又整到提意见的人头上了？因此，以“工人说话了”的方式出击 就使斗争更加有理、有力 更加易被广大中间派群众所理解、接受，也使共产党在斗争中能始终居于主动地位。

（二）确定“章罗同盟”为主攻目标

毛泽东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意义曾作出极高的估价。他在 6 月 8 日即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⑤到了 7 月

中旬，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将反右派运动称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⑤6}后来《人民日报》社论解释说，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对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政治斗争，直到他们投降为止”；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对中间派而言，即“是要使他们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自己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是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有一部分从中间派归入左派，壮大左派的队伍”。^{⑤7}

既然反右派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如此的复杂和艰巨，它也就不会停留在基本群众的“自发批判”这种水平上。当然，基本群众的“自发批判”所造成的反击声势，对于“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主要出自革命义愤所展开的批判对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它不能解决中间派人士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尤其是对于这场反击运动的必要性的认识问题。因此，在反击声势造成之后，中共中央必然要将这场批判运动引向深入。

这场批判运动的深入展开，是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之后开始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经过多次修改之后，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原来作为整风指导文献的这篇讲话，在增加了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论述和六条政治标准，并删去了一些可能去磨损反右派斗争锋芒的词语之后，已经成为“同右派斗争的强大武器”。^{⑤8}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就是根据毛泽东这篇公开发表的讲话的精神，对右派进行深刻批判的一次大会。正如6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在这次人代会开幕前夕，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演发表了，这使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获得了强大有力的武器。……可以预料，这次人代会将使对右派的批判

大大地深入一步，将使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地提高一步。”

由此会使人联想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毛泽东 2 月 27 日讲话之后，举行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这篇讲话于 6 月 29 日公开发表之后，又举行了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这两次会议都与毛泽东 2 月 27 日的讲话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气氛与风格上，却恰成对照。作用则相反，前一次为了发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而后一次则是动员反击批判右派。

在人代会召开的第一天，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即指出了右派言论的根本错误所在。周恩来指出“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各党派轮流执政”等等言论“目的都是要使人民政权脱离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以便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右派们“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③9}在这里，周恩来实际上为这场批判指明了主攻的方向。

就在人代会召开的这一天，即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要求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使他们以后在国家安定的形势下，再难于组织象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反共运动。指示还要求各级组织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养痛遗患。6 月 29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其中对于右派骨干分子情况作了这样的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 400 人左右，全国大约有 4000 人左右”。中央在人代会期间所发出的这两个指示，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这场斗争作出了规定，前者指明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后者则规定了斗争对象的数量界限。

更为具体地指明了这场批判的主要对象的，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起草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

判》。毛泽东在社论中第一次用了“章罗同盟”这一名词，他说：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④根据这一具有权威性的判断，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内外，人们自然将批判的主要锋芒，指向了章伯钧和罗隆基。例如，7月4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整版刊载了两篇报道：一篇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题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各地代表追击章罗联盟”；一篇是关于农工民主党座谈会的，题目是“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群情激愤严词质问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在农工党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承认说，“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从去年开始的。过去同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7月5日“人民代表继续追击右派集团”在这种追击下“罗隆基吞吞吐吐承认章罗联盟”即说他同章伯钧“只有思想联盟，没有政治联盟”。^⑤

“挖”出“章罗联盟”在当时被看作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成果。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的社论，即认为，“右派在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指挥机关章罗联盟，在各方面的围攻之下，内幕已经开始暴露”，这是运动开始深入的一个标志。同时，这篇社论对于为什么要把这场运动引向深入，也作了解释。社论说，“由于斗争开始深入，由于右派的真面目进一步暴露，许多原来不相信有什么右派、或者不认为反对右派有什么必要的人们，现在在大吃一惊之后，也逐渐改变态度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右派确实存在，确实在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确实是人民事业的心腹之患。……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单单依靠正面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反面的教育。右派分

子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对于广大群众就是最好的活生生的反面的教材。”

根据反右派斗争所取得的这一成果，中央于 7 月 9 日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对右派骨干情况作出了新的估计：“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 4000 人，而是大约有 8000 人。”

也就是说，相差仅仅 10 天，右派骨干人数即翻了一番。这种情况表明，反右派斗争此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一个“怪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这个理论正确性的证明。

（三）7 月中旬后的“深入挖掘”

7 月 17 日至 21 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与会同志讨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对此后的运动发生重要影响的观点。

第一，以更为严重的措词表述了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文章一开头即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④②}

第二，明确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文章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④③}

第三，强调了同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长期性以及此次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性。文章认为，资产阶级右派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 从现在起 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怎样才能缩短这个时间呢？毛泽东显然认为当时的反右派斗争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④④}

第四，提出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文章写道，“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在斗争方法上，“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④⑤}即一打一拉、先打后拉的策略。

第五，明确提出了清除党内右派的任务。文章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④⑥}

第六，提出了全民整风的任务。文章提出，“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④⑦}

第七，规定了整风的目标。文章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

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④8}

第八，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文章认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此，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④9}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观点，其中不乏正确见解，比如对于政治目标的规定，关于物质基础的论述，都是很宝贵的。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表现出的是一种“左”的倾向，即它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一些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夸大为敌对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的政治目标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与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是无法统一起来的，即是说，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整风的政治目标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但紧接着又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为这个目标和这一任务设置了严重的障碍。由于目标、任务与手段的冲突，在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所向往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仿佛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幻影，可望而不可即。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再用几个月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的精神，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这一文件指出，“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此后，针对两种不利于“深入挖掘”的倾向，中共中央又分别发出了指示。8月29日，针对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撤销一名

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的请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右派分子不宜过早地作组织处理的指示》。这一文件认为，“目前反右派斗争正在继续开展和深入，对于右派分子的斗争，应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彻底揭露把他们搞臭，但还不宜于过早地作组织处理，因为这样做会使斗争简单化，不利于运动的深入和开展。”另一种不利于“深入挖掘”的倾向是一些单位和党员对待党内右派分子“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9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批评说，一些单位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他们划为右派，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中央认为，这种现象已经影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和开展。中央要求，“对于那些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分子。”

在青岛会议精神和中央上述指示的引导下，几个月的“深入挖掘”造成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对右派性质作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在质的方面绝对地夸大了同右派斗争的严重性。本来，右派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即已提出这一问题。但是，毛泽东当时是在人民民主阵线的范围内来使用这一概念的。如他在1949年即认为，那些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毛泽东认为，对于这部分人，主要是帮助、批评、教育的问题，他提出：“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

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⑤0}在整风运动前夕，李维汉在统一战线的范围内也明确提出了右派问题，他指出，1956年下半年有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有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刮了起来。“这股风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出来的。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李维汉同时指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对待。”^{⑤1}

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发动和逐渐深入，毛泽东和中央就逐渐背离了以往正确的判断。6月8日，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毛泽东将右派称为“反动派”；^{⑤2}6月26日，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又指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7月1日，毛泽东使用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一提法；^{⑤3}到了青岛会议期间，毛泽东断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对右派性质的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既是发动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的一个主要根据，也是这种扩大化斗争的重要表现。

其次，这场运动采用具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策略方针对待批判对象，以至于打击面过宽。毛泽东在5月中旬曾比喻说，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在反击的最初一个月中，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自己浮到水面上”的“鱼”。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一些单位又发现还有隐藏得很深的右派，即“鲨鱼”。7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报告》。吉林省委在《报告》中认为，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些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中央同意这个看法，在批示中说，吉林省委

报告中关于发现“鲨鱼”一点很重要，请各地注意。7月中旬后的“深入挖掘”，主要就是“挖”这些“鲨鱼”。既然这些“鲨鱼”并没有“自己浮到水面上来”，那就需要去“钓”。所以，7月中旬后，“钓鱼”战术或曰“引蛇出洞”战术，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例如，铁道部机关整风领导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就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研究与利用疑似分子的弱点，采取多样的方法，有意识地诱导他们把反动思想暴露出来。如计划局党员陈××过去曾流露过一些反党言论，在鸣放期间暴露的很少，计划局领导小组掌握了他又想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又怕在群众中暴露后受到批判和处分的思想矛盾，用个别谈话和党的小组会上进行思想检查的形式，让他比较自然地把错误观点吐露了出来。材料局李××过去一贯怪话连篇，对党不满，鸣放时未放。别人要他发言，他说：‘现在百家争鸣，我再发言是一百另一家了。’材料局领导小组研究了他又臭又硬不肯认输，对党仇恨又不敢自己出头想利用别人向党进攻的特点，就用‘激将法，促使他暴露。在‘回忆会’上，群众提到肃反中对他进行审查没有错，结论也是正确的，他就沉不住气，马上起来辩论，发了很多谬论。对这类右派分子，在引导他们暴露时，都未立即进行批驳，不使他们感到压力，从而使他们把反动思想逐渐地放了出来。”^{⑤4}

从对敌斗争的策略来讲，所谓的“引蛇出洞”，所谓的“阳谋”，还有诱敌深入，三十六计，等等，是无须非议的。因为对敌斗争，就是要讲策略，讲手段，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只是在于，在当时两类矛盾严重混淆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策略手段的运用只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运用“钓鱼”或“引蛇出洞”这样的具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战术”来“深入挖掘”所谓的“右派分子”战果自然十分显著。在经过了7月上旬的翻一番后，被揭露的“右派”人数继续直线上升。一个月后，仅北京市就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其中高等

学校有 4230 人。^{⑤⑤}9 月 2 日，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统计，已发现党内右派分子 3000 余人。1958 年初，解放军总政治部统计，全国发现右派分子 4308 人。据后来复查统计，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 552877 人。时间仅仅过了半年，而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较最早预定的点名批判 4000 人超过了一百多倍，这不能不说是大搞群众运动普遍深挖的典型性后果。

最后，对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处理的分量过严过重。在青岛会议期间，根据毛泽东对右派性质的判断，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中提出：“资产阶级右派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必须向右派进行坚决的彻底的斗争。另一方面，在策略上仍然要把目前反击右派的斗争当作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来进行，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自绝于人民的分子 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又当别论）”这个策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明确地称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法。从表面看，这个策略似乎有利于防止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这个策略不仅丝毫无助于防止斗争的扩大化，反而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上，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可以具有更大的主观随意性。李维汉后来写道：“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九次全国统战会议提出对一百多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绝大部分人是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宣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选择了比较知名的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为标兵，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九十六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⑤⑥}既然肯定了敌我矛盾这个性质，统战部提出的“当作人民内部矛

盾来处理”的策略，也就难以切实实施了。

注释：

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 212、213 页。

以下引自此文的话均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3—429 页。

《陆定一文集》第 575、576 页。参见 1957 年 5 月 23 日《中国青年报》。

《人民日报》1957 年 5 月 26 日。

参见施肇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党的文献》1991 年第 2 期。

⑥同上。

⑦《六十春秋风和雨》第 196 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32 页。

⑨《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1 日。

⑩《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5 日。

⑪见《民盟中央第六次扩大整风座谈会记录》，参见 1957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

⑫《观察》杂志二卷二期，1947 年 3 月 8 日。

⑬《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89 页。

⑭同上。

⑮《观察》杂志六卷二期，1949 年 11 月 16 日。

⑯《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16 日。

⑰《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26 页。

⑱《解放日报》1957 年 5 月 10 日。

⑲《光明日报》1957 年 5 月 19 日。

⑳《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7、748 页。

㉑《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1、464 页。

@同上，第 424 页。

㉓同上，第 444 页。

㉔《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22 日。

㉕《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45 页。

- ②⑥《人民日报》1957年7月22日。
- ②⑦《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
- ②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页。
- ②⑨《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 ③⑩《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1957年6月4日）。
- ③⑪《人民日报》1957年7月4日。
- ③⑫《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1957年6月4日）。
- ③⑬（苏）奥·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苏中关系 1945—1980》三联书店 1982年4月版第72、73页。
- ③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页。
- ③⑮同上。
- ③⑯同上，第461页。
- ③⑰《人民日报》1957年9月18日。
- ③⑱《人民日报》1957年6月21日。
- ③⑲《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
- ④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5页。
- ④⑪《人民日报》1957年7月6日。
- ④⑫《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 ④⑬同上，第461页。
- ④⑭同上，第456、461页。
- ④⑮同上，第456、461页。
- ④⑯同上，第457页。
- ④⑰同上。
- ④⑱同上，第456、457页。
- ④⑲同上，第462页。
- ⑤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1488页。
- ⑤⑪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4月4日）。
- ⑤⑫《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页。
- ⑤⑬同上，第438页。
- ⑤⑭《铁道部机关反右派斗争休整前后情况的报告》（1957年8月29日）。

⑤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1957年8月17日）。

⑥ 《回忆与研究》（下）第838、839页。

第六章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之后 毛泽东曾考虑重返整风的原定主题 并为此作出了努力。但时过境迁，这些努力没有获得成功。

一 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命题，号召开展“全民整风”

全民整风的任务，是 7 月中旬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他在发动开门整风运动时，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任务。例如，5 月 4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中写道：“只要我党整风成功 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5 月中旬，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又写道：“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 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最初所设想的整风运动，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集中批评共产党的缺点错误；第二个阶段是在共产党整风任务完成之后，发动社会各界整风，对广大群众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民整风并不是反右派斗争的产物，而是包

括在原定整风的范围之中的。

因此，把这种全民整风看作是 5 月整风的继续也未尝不可。事实上，毛泽东也正是这样认为的。他在为《人民日报》所写的 7 月 1 日社论中就这样写道：“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①也就是说，当毛泽东于 6 月 8 日提出的“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的目标实现之后，他认为可以重新进行一度中断了的整风了。

但是，由于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的冲击，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已经确立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命题，7 月中旬后的全民整风，与毛泽东和中央原来设计的整风，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

一方面，这种全民整风的步骤或阶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毛泽东设想，在党内整风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再发动全民整风。但随后发生了右派问题，共产党的整风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中断了，毛泽东也就不得不重新作出安排。6 月 8 日毛泽东预计，反右派斗争大约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到了 7 月中旬。他在提出全民整风任务时，又将整风运动明确地划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②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整风运动的设想与原来有两个显著的不同：其一，在整风运动中插入了一个反右派斗争的阶段，从而改变了整风运动的主题；其二，在共产党整风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提前提出了全民整风的任务，力图在解决右派问题的同时，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特别是解决好争取中间派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写道：“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

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⑤显然，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毛泽东仍然希望通过整风来实现他所向往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命题的提出，全民整风的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毛泽东此时的基本思路是：他希望通过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如前所述，毛泽东和中央认为，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针对右派，解决敌我矛盾的，它主要表现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针对中间派，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它主要通过全民整风来实现。但这两个方面又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如当时毛泽东和中央一再强调，只有深入挖掘、批判右派分子，才能真正地教育中间派；反过来，只有把中间派争取过来，才能使极少数右派分子陷于孤立境地。对于这两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看得非常重要，他认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⑥这是毛泽东从反右派斗争中引出的一个新结论，这个任务，显然压倒整顿党内三风的问题。毛泽东之所以提前发动了全民整风，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这样一来，这种整风的主要内容就不再是整顿党内的三风，而是在深入挖掘右派分子的同时，对人民群众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批判中间派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对于全民整风的新的设想，立即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

文件中体现出来。在青岛会议期间，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和《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前一个文件说：“这个整风运动的方针和目的应当是 按照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六条标准，经过反右派斗争和自我教育，巩固、提高和扩大左派，争取、团结和教育中间派，孤立和分化右派；改造政治立场，使大多数人向左转一大步，改造组织，使左派和中左取得领导优势，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同时，统战部再次申明：“还应当继续欢迎各民主党派向我们提出善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并且及时地接受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实现党所提出的‘边整边改’的要求。”在后一个文件中，毛泽东在审阅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一段时间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统战部当时都主张将反右派斗争同人民内部的整风结合起来，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来促进人民内部的整风。这两个文件，分别于 8 月 2 日和 8 月 28 日由中央批发各地执行。

毛泽东还认为，反右派斗争同对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 7 月中旬提出农村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右派也在竭力争取农民群众。在青岛会议上，山东省的代表曾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在鸣放中，地主、资产阶级好象都在替工人、农民说话，例如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在下乡视察时即宣扬说：“共产党重视国计，不重视民生，征粮过重，税收过多，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民可吃什么呢？”因此，要把反右派的事情向工人、农民作宣传，让他们知道城里的右派是怎样进攻的。这个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从 1956 年下半年开始农村中出现了一股闹社风潮。毛泽东认为，这股闹社风潮表明少数富裕中农想走资本

主义道路。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写道：“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毛泽东明确表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毛泽东还主张，农村也可以借用城市整风的经验，“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⑦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此外，中共中央还于9月12日发出了《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于10月15日发出了《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和《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在上述一系列文件的指引下，由共产党开始的整风，就扩展成为全民整风运动。

二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第二次鸣放高潮

在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应该从反右派阶段转入以整改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阶段。他说：“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

心是改的问题。”^⑧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整改的任务，他说，“运动的全胜，不只决定于反右派的阶段，尤其决定于着重整改的第三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的第四阶段。”^⑨整改任务的提出，说明毛泽东和中央认为，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以后的运动是在阶级斗争相对缓和的情况下，集中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三害”问题。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邓小平强调说：“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空气。”^⑩

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根据毛泽东指示和邓小平报告的基本精神，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的社论。这篇社论明确地表示了中共中央重返整风主题的决心。社论认为，当整风运动进入第三阶段时，如果不能形成第二次鸣放的高潮，我们就不可能彻底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了再次形成鸣放高潮，社论要求：“在进行思想动员工作的时候，领导人员要明确地表示态度，表示整改的决心，并且向群众说明，运动的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是不相同的，第二阶段以反击右派为主，目的是解决敌我矛盾；第三阶段是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主，目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

此后，中央在一些文件中和会议上，多次强调了整改工作这一主题。10月30日，中央在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的报告时指出，“在高等学校

的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 即应坚决转入‘ 整改,认真改进工作。…… 高等学校的整改工作 是整风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这项工作进行得彻底与不彻底,直接关系到今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高 直接影响到整个整风运动的胜利完成。”11 月 2 日 中共中央举行电话会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转达了毛泽东关于整改工作的指示,经过讨论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1 月 10 日 中央批转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目前反右派斗争和转入整风第三阶段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再次强调:“目前 凡是在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单位 应该及时地转入以整改为主的第三阶段,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必须认识,整改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较之反右派斗争的任务 更加艰巨。因此 在运动转入整改阶段的时候 必须讲究方法,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争大辩;领导上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以期达到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的目的。”

在中央的倡导和督促下,随着反右派斗争高潮的结束,全国在 1957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中掀起了一场“ 整改高潮 ”。例如 新华社报道,交通部在 11 月 1 日进行全部性的整改动员报告以后,群众的情绪很高,当天下午便贴出大字报 1258 张,没有几天鸣放的高潮就掀起来了。截至 12 日的统计 这个部的大字报总共已贴出 11681 张,提出意见 13743 条,平均每人贴了 4 张以上,有的单位平均每人 10 张 最多的一人贴了 54 张。不少单位是百分之百的人贴了大字报。交通部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体制机构、业务方针、干部工作、工资福利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等等,大字报上都提出了许多意见、批评和建议。^⑪

从表面看,这一次“ 整改高潮 ”与 5 月份的鸣放高潮不无相似之处 当时就有人将其称为“ 第二次鸣放高潮 ”。但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两次高潮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在第一次鸣放高潮中，鸣放的主要力量是知识分子阶层，工农基本群众没有加入进去。而在第二次鸣放高潮中，鸣放的主要力量是工农基本群众和一般干部以及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鸣放持怀疑和观望态度。例如，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在《关于目前反右派斗争和转入整风第三阶段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中写道：“当转入整风第三阶段，各单位领导号召中间分子鸣放时，他们则顾虑重重，怕‘言多必失’，怕‘合法的报复’，怕‘把打狼的鞭子打在羊的身上’。他们对我们整改的决心有怀疑，生怕领导上把群众在鸣放时期提出的意见连同右派分子的言论一笔抹煞。对我们彻底整改持观望与保留的态度。”北京市委在《关于北京市的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许多学校对教师的发动还不充分，不少教授不愿意采用大字报的方式提意见，许多中间分子还存在着不少顾虑，有的怕又是一次‘阳谋’，怕‘钓了大鱼又来钓小鱼’，‘替社会主义教育找典型’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

在5月份，大多数知识分子抱着帮助党整风的诚意踊跃地投入到鸣放活动之中；而到了10月份以后，在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甚至一些单位的领导不惜采用“引火烧身”的办法来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这种变化确实耐人寻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一次报告中的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这种变化倒是很有启发，他说：“为什么现在人家心有余悸呢？我们搞双百方针搞了20多年，人家把你看成是钓鱼，毛选五卷讲了很多，讲双百方针是长久的方针，永远的方针，不能收，只能放。现在我们还是这么宣传。可是人家不相信，他有经验主义，认为‘鸣’‘放’就是钓大鱼。”^⑫周扬是在1980年讲这番话的。那么，对于刚刚从反右派斗争中尝到急风暴雨滋味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第二；在第一次鸣放高潮中，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各界人士集中批评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不主张同时对党外人士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而在第二次鸣放高潮中，中央不仅要求各级领导接受群众批评，迅速改进工作，而且还要求各单位对中间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系统的批判。根据这一精神，北京市委在《关于北京市的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列举了高校所要批判的内容：（1）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观点；（2）否认党的领导，否定教学改革；（3）轻视劳动，轻视工农，轻视实践，轻视政治，否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宣传所谓“先专后红”的谬论。这实际上使一些单位把批判的主要矛头引到了党外人士身上。如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关于地球物理研究所高级人员整风情况的报告》中反映：一转入整改阶段后；群众大字报来势很猛，批判揭发的矛头由对党的领导方面迅速转向几位负主要责任的科学家，如研究员兼物理探矿组组长傅承义（傅鹰之弟）、研究员兼地震组组长李善邦、所长赵九章等。从个人作风到政治倾向，从业务指导到干部培养，问题提得很尖锐，对老科学家震动很大。傅承义向党求援，对党员副所长卫一清说：“我们这些人就凭这点学术，政治上根本就无威信，这下更难领导了。”

此外，一些单位把反右派斗争也纳入了整改的范围之内，这就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认为：在整风第三阶段，绝不能把反右派斗争未了的任务丢掉。未斗完和新发现的右派分子，要继续进行斗争。有些应登报的，我们还准备继续登报。凡是过去在挖掘右派分子时还没有扫到的地方，也必须予以清查。北京市委的报告也提出，在大整大改，特别是在大辩论中，应该结合进行反右派斗争。对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揭露和批判，都要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对于前一阶段已经批判过现在又在反攻的右派分子，还要继续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北京市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这种作法，在整风中不仅会极严重

地阻塞言路，而且还会加剧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第三，在第一次鸣放高潮中，鸣放的方法是和风细雨，鸣放的主要形式是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虽然后来也出现一些波折，共产党方面也出现了“引蛇出洞”的严重错误，但总的发展趋势是良好的。而在第二次鸣放高潮中，鸣放的形式和方针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中共中央肯定并一再提倡的鸣放形式，是大字报和大辩论。11月1日《人民日报》的题为《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的社论指出：“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因此所谓的第二次鸣放高潮，实际上是一次大字报和大辩论的高潮。

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人还把反右派斗争的方法作为成功的经验运用到人民内部的鸣放活动中来。这种情况在农村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当时的广西省委总结说：“鸣放的一般规律 最先鸣放的是贫下中农，他们鸣放的意见，一般又先提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后提干部作风问题（即先事后人）等到贫农下中农劲头起来了，领导上又能沉住气，上中农经过一段观察体验之后就大胆起来，于是也出笼了。这时毒草也才开始出。……以后脖子越伸越长 连身子也出来了。”根据这个规律 广西省委建议 辩论开始，最好有意识地让对方暂时占一下上风，使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论点。因为资本主义思想，无论怎样，他们总是感到立于“不合法”和不利的地位方面 说话口气很不硬。如果不给他们这样一种条件，他们很容易“一触击溃”，甚至“不战而降”，那样就辩不好了。等到他们的论点暴露尽致了，广大中间层也看得更清楚了，而后再来组织反攻。这也就是我们要善于后发制人，不

要先发制人。^⑬广西省委倡导的这套战术，与“引蛇出洞”或“钓鱼”战术毫无二致。

由于上述的区别，所谓的“第二次鸣放高潮”实际上并不存在，曾经一度出现过的自由批评的环境，经过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之后，已经不可能再现了。

进入 1958 年后，整改工作的主要目标就集中到反浪费与反保守上，由此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双反”运动。

三以“双反为纲”。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为“大跃进”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反浪费”的提出

反浪费的任务在“4·27”指示中即已提出。在这个指示中，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在整风中要检查“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这实际上已经将反浪费的任务划入了整风主题的范围之中。《人民日报》在发表“4·27”指示的同时，还发表了题为《勤俭建国》的社论。这篇社论指出：“许多负责建设的同志，在建设中心不惜工本，追求豪华的思想，相当普遍，以致在建设中，我们确实办了不少傻事，多花了钱。当然，这种不合理的建设和浪费现象，绝大部分是由于过去我们没有搞过建设，不会不懂而来的，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些傻事，不急起直追地取得教训，纠正错误，彻底坚持和贯彻实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那么，今后就会犯更大的错误，造成更大的损失。”社论明确指出，中央整风指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的要求之一，就是检查对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

但是，这一任务同其他一些整风任务一样，被随后爆发的反右派斗争打断了。直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在第二次鸣放高潮中，这个话题才普遍地引起人们的注意。11月30日，《人民日

报》发表了题为《“自由王国”——管庄》的报道。这篇报道揭发了管庄（建筑材料工业部一些直属单位所在地，位于距北京 40 华里的通县境内）在生产、行政、生活等方面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这些单位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管庄的混乱状态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2 月 11 日 国务院特地派出 5 人工作组进驻管庄，调查和解决管庄的问题。12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又以《火烧建设事业中的大浪费》为题报道：在整改阶段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建设工作中许多违背勤俭建国方针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格的尖锐的批评。1958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报》又以《愿反浪费之火燃遍全国》为题发表了关于上海梅林罐头厂反浪费专题整改的报道。报道说：“据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估计，这个厂从 1954 年以来，原材料、财产、物资、质量事故和劳动力上的浪费几达 45 万元 约占全厂现有流动资金的一半。”《人民日报》专门配发了题为《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社论指出，“我们党和政府向来就主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因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巨额资金，这些资金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依靠借外债来解决，基本的办法就是依靠内部积累。内部积累一点一滴来之不易，任何挥霍、浪费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浪费行为。”社论号召，“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也应该象梅林这样，掀起一个反浪费的专题鸣放和专题整改的高潮，放一把火把各种浪费烧个干净。”

整改中揭发出来的浪费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关注。1958 年 1 月 4 日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浪费现象。他说 据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 45 万，占资产之一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资。他建议在整风中以 10 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 10 到 15 天就可以。1

月 21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提出，在整风中各单位要以几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几天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专门把“反对浪费”列为一条。毛泽东写道：“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反浪费任务的提出，是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重返整风的正确主题而进行的又一次努力。它的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但是，这又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努力。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在所谓的“整改高潮”中，人们已经不可能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展开比较深刻的批判了。这时候提出了反浪费的任务，实际上转换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已经难以为继的整顿目标，将领导者和群众的注意力引向了物资方面。从群众的角度来看，对浪费现象展开批评，很难与所谓的右派进攻挂上钩，因此也就容易发动他们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而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造成浪费的原因又是多种的，按照 1958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说法，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又有客观方面、即缺乏经验方面的原因，因此，对这种现象展开批判，领导者也容易接受。有了这样一个领导者和群众都能接受的批判目标，就可以在形式上重现第一次鸣放时期的那种热烈场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浪费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来整风主题的偏离；而这种似乎很热烈的群众运动，又往往流于形式主义。

（二）反保守”的提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 1958 年春发起“反保守”的运动，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与右派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一，“反保守”与“反冒进”是相互对立的口号，而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的“反冒进”事件，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5月份的鸣放中，党外人士对于1956年的冒进曾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如张奚若指出了“四大偏差”，陈叔通建议中央检查一下，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等等。言辞更为激烈的是陈铭枢的意见，他说毛泽东“好大喜功”，轻信干部的虚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⑭这些意见，给毛泽东以很深的印象。他认为这一切与“反冒进”事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后来他曾写道：“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⑮所以，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一再地联系到右派的进攻来批判“反冒进”。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⑯在1958年1月11日到20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更为严厉地批评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三条，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

第二，发起“反保守”运动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和中央希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中证明：“灿烂的思想政治之

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

毛泽东认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1957年9月以后，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了这一点。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撰写的题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这篇社论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们有更好的条件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加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的建立。”社论认为，这个物质基础的建立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还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所以，加速这个基础的建立又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11月6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长，错误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结迅速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①⑦}就在访问苏联期间，当赫鲁晓夫提出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目标之后，毛泽东在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目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这种强烈愿望，但在这里也不能排斥毛泽东的另一层用意。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开门整风运动，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毛泽东

本人也很清楚，“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⑮那么，毛泽东在苏联提出 15 年赶上英国的行动口号，也许还包含着这样一层用意，以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就来向一切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证明，中共的方针是正确的。

毛泽东当时也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但他认为，中国有着自己的有利条件。他说：“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把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经过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焕发出的冲天干劲，看作是实现赶超目标的最可靠的根据。也就是说，客观条件方面的限制，可以依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突破。

反保守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人民日报》于 11 月 13 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其中对一些人的“右倾保守的毛病”提出了批评。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 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极为赞赏，后来他曾评论说：“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

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①9}

一个月后，即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再次批评了一些人的“右倾保守”思想。社论认为，“应当说，我们的努力还是很不够的，而且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的掩盖下，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在这种“右倾保守”思想的指导下，“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社论引用了毛泽东在 1955 年 12 月所写下的一段话，提出了反保守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②0}

总之，毛泽东认为，经过 1957 年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实现 15 年赶上英国这一目标的主客观条件。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许多人认识不到这种重大的变化，仍然用老眼光看待新形势。因此，有必要发动一场“反右倾保守”的运动。正如 1958 年 2 月 18 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出的：“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3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其中也指出，只要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条纲，发动起群众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就可以有力地揭露出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就可以迅速地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就可以进一步密切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使干部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发动“反保守”的动机，具有两重性。它具有积极的一面，即它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将注意力逐渐地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来，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同时它又具有消极的一面，即它又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央不切实际地夸大了政治运动的作用，从而又极大地滋长了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反保守和反浪费运动汇合，形成一场“双反”高潮之后，这场运动的消极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实际上为1958年的“大跃进”作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给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三）“双反”中的思想政治批判

按本意来讲，“双反”运动应该是一场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为主题的运动，它的重点应该放在生产战线上。但事实并非如此。1958年2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即认为，“目前的斗争既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帐，又要算思想帐、政治帐。”这也就是说，任何经济（或业务）方面的问题，必须从思想政治上去挖掘根源。实际上，按照毛泽东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命题的规定，所谓的“双反”必然要发展成为一场以知识界为重点的思想政治的批判运动。

比较早地提出知识界“双反”目标的是上海的复旦大学。据《人民日报》报道在1958年1月间，上海梅林厂烧起了反浪费之火后，复旦大学曾经展开过一次反浪费运动，但当时反浪费的对象还只是经济上的有形的浪费，还未接触到学校的一个根本问题——又红又专问题上的各种保守现象。在2月上旬“双反”运

动形成高潮后，上海市委指示高等学校的反浪费反保守必须结合高等学校的特点，于是复旦大学就明确地提出了“反浪费、反保守，向又红又专大跃进”的口号，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学校的根本问题，即又红又专方面的保守和浪费。^{②1}所谓又红又专方面的保守和浪费，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

2月下旬后，其他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也都将“双反”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争取红透专深”的运动。这场运动当时分为相互配合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批判的“拔白旗，插红旗”活动，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交心运动”。

所谓“拔白旗，插红旗”，只是当时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它的实际内容就是对知识分子展开思想政治批判，“灭”掉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当时要拔的“白旗”主要有：

“资产阶级的学术理论”。例如，清华大学批判了该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的“资产阶级建筑学”观点；北京大学批判了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和“新人口论”；北京政法学院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法学”观点，等等。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这里批判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一本书”、“一间房”的向往。例如，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份大字报批判了该院教授、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吴××的“名利思想”。大字报说：“从我院1952年成立到55年肃反运动数年间，吴先生挂名我院‘教授’，领取高薪，但一直不到校上班尽其职守，却是安居家中，经营‘副业’，进行与本职工作并无关系的编译、写作，大量赚得稿费。他给报刊的一般写稿及小册子，姑且不计，单借曹雪芹之身写的文章、小册子，获得‘利润’就极为可观。”^{②2}对于这种现象，后来《人民日报》作了更为严厉的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确实极臭的。有的教师，为了个人多

拿几百元的稿费，出点小名气，把主要精力放在写稿译稿上，对国家交给他们的教学任务却敷衍了事。让成百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浪费掉大好时光，在学校里得不到真才实学。有些人为了多拿到几个钱，他们所译所写的稿子往往粗制滥造，文理不通，并且把许多有毒的思想通过自己的写稿译稿，流传到广大读者中去。还有更严重的，他们自己学识浅薄，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却自己装作学者专家，背地里东拼西凑，干些个偷窃勾当！这就是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干出来的事。干这种事的，目前还不在少数。”^{②3}

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厚古薄今”。最先批判“厚古薄今”并相应地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的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3月10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他指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指夏、商、周），脱离革命实践的烦琐主义；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针对这种现象，陈伯达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②4}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肯定了陈伯达提出的“厚今薄古”的口号，认为他的演说有“破竹之势”。此后，哲学社会科学界就对“厚古薄今”展开了批判。

鄙视工农学生。例如北京大学的一位工农学生揭露说：“由于我身上缺乏‘书生气’又因为我来自偏僻的内蒙古自治区，于是有些被教授们誉为‘天才’的同学们就嘲笑我，说‘美丽的燕园闯进一匹野马，是时代的悲剧’等等。”这位工农学生对北大的教授尤其不满，他回忆说，1953年寒假考试，高名凯教授辅导我们语言学引论，态度很粗暴。情形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是辅导国际音标，高名凯教授念了两遍，问我们会不会，我们回答说“不会”。当时高名凯教授声色俱厉地说“这再不会就该打屁股”！这

件事给我相当大的打击，我一度想退学。在旧社会我们的屁股是随便被人打的 可是在 1953 年仍有人声称要打我们，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愤怒！我们不禁要问高名凯教授你要打什么人？你要为什么人服务？^⑤这位工农学生就这样将事情拔高到了阶级路线的高度。

如此等等。

这种“拔白旗，插红旗”的活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在 5 月份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但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面“白旗”，仅仅靠外部力量去拔，是不能够彻底清除掉的，还必须发挥“内因”的作用。于是，在知识界又发动了“向党交心”的运动。

“交心运动”是在 3 月 16 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后兴起的。在这次大会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了“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效忠社会主义，争取又红又专”的口号。在大会后的游行中，工商业者抬着十面大红“喜”字牌，表示这次是他们继 1956 年交出生产资料以后另一个“交出心来”的运动，是一件大大的喜事，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自我改造的正确道路》的社论，社论对于“交出心来”的口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道：“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这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心交给人民。‘公约’中说，要‘交出心来’，这是一个很形象而又很深刻的说法。旧社会流行的所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成语，同劳动人民的立身处世和为人之道是迥然不相符合的。而在我们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要‘交

出心来’这可以说是他们决心从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的誓言。”

②这样，能否“交出心来”，也就成为每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或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诚心接受思想改造的最有力的证明。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诚心接受思想改造，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投入到了这场“交心运动”之中，都以大字报的形式作了自我批判。而这种自我批判的措词，又往往是极为严厉的，例如：

“经过反右斗争，我确切认识到大多数的旧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在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立场，我们的本领基本上还是以前的那老一套。我们还是领导学生‘专’而不红，走资产阶级的路。我们说是拥护共产党，实际上跟党走两条心。”

“我的名利思想是严重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有‘光宗耀祖’思想。后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这种‘光宗耀祖’思想就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汇合起来。”

“旧大学的教师有些人利用学术作为个人投靠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资本；也有一些人从‘纯学术’中寻求麻醉，为了个人的所谓‘不朽的事业’。我是走后一条路的。这种资产阶级观点，解放后没有好好清洗过。”

“经过初步检查，我认识到我的问题基本上是立场的问题。我的政治嗅觉不但不灵，并且已达到麻痹的地步；我不但政治麻痹，并且，在大鸣大放期间，还有一些错误的言论。凡此，都与立场有关。”

知识分子们的类似上述的自我谴责，很难说是出之于真心。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人们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批判在不断升级，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例如，×××在作了自我批判之后，一份大字报说他在“取巧”，没有交出真心。大字报说道：“×先生昨天在‘兴无灭资、向党交心’的发言中，敢于承认

自己存在着右倾思想，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主要内容只是把别人揭露出来的事实加以编排，如果这样就算向党交心，那么×先生过去已经把心交出来很多次了。到底×先生准备交几次心呢？我们认为，一个资产阶级权威学者要想变成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没有办法取巧的；要有抛弃过去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决心，然后再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向前努力。”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自己的揭发越“深刻”，向党和人民交出的“心”也就越“真诚”。否则的话，他们就很难渡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关于这一历程的艰难，《人民日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一切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现在都应该下定决心，经历这一场痛苦的但是最后会是精神爽快的思想斗争。必须有孙悟空跳进老君炉去受锻炼的决心，让群众双反运动猛烈的火焰，把自己烧个四十九天。经过这样的熬炼，在群众的教育下，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把自己的错误缺点认识得越深，自我改造的决心才会越大。知识分子只有经过这样的思想改造，才真正会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充满干劲。”^{②①}

综上所述，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曾多次提出过重返整风的正确主题，即继续解决党内的三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并为此而采取过若干措施。但是，由于总的形势估量和指导思想已有了重大的改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总的命题的规定下，这些努力没有获得重返正确主题的积极效果，反而弯子越转越大，使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9页。

-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439 页。
-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432 页。
-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465 页。
-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460 页。
- ⑥ 同上 第 461 页。
- ⑦ 同上 第 458 页。
- ⑧ 同上 第 466 页。
- ⑨ 《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19 日。
- ⑩ 同上。
- ⑪ 《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16 日。
- ⑫ 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 年 9 月）。
- ⑬ 中共广西省委：《广西省农村进行社会主义辩论和整风的情况》（1958 年 1 月 10 日）。
- ⑭ 《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5 日。
- ⑮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6 页。
- ⑯ 同上 第 475 页。
- ⑰ 《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7 日。
- ⑱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78 页。
- ⑲ 1958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重看《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13 日社论后写的一封信。
- ⑳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4 页。
- ㉑ 《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15 日。
- ㉒ 《拔白旗 插红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10 月版第 58 页。
- ㉓ 《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13 日。
- ㉔ 《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11 日。
- ㉕ 参见《拔白旗 插红旗》第 193、194 页。
- ㉖ 《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17 日。
- ㉗ 《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23 日社论《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行》。

结束语

1957 年事件的历史启示

1957 年的开门整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扩展“民主新路”的一次大规模的具有开创性的尝试。尽管这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但它对于“民主新路”的探索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最后走上歧路的教训，却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至今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执政党的建设必须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进行，这是毛泽东在 1945 年提出的“民主新路”的一个基本点，也是 1957 年的开门整风所试图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发动开门整风的前后，对于形成这种开放环境的必要性，毛泽东作了深刻的阐述。他一再指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整风”先在党内整，党外自愿参加，批判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③“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等等。这些论述，说明毛泽东当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从封闭的环境走向一个开放的环境，这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开放环境，不仅

可以使执政党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经常地发现和消除自己身上的毛病，而且还能使它的党员和干部在不同思想的交锋中经受严格的锻炼和考验。

对于这种开放环境，当时党内有许多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对执政党自由批评的口子一开，什么东西都涌了出来，“天下从此多事”。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看法，他指出，“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毛泽东还指出：“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说明，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展开执政党的建设活动，当时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备了可能性。

一个多月的开门整风的实践证实了毛泽东上述论断中所包含的真理。在5月份初步形成的自由批评的环境中，绝大多数党外人士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向共产党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的；绝大多数批评意见对于改善执政党的领导工作是有相当补益的。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当时所作的下述评价：“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

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⑥这种情况证明，以开门整风的方式来扩展执政党建设的“民主新路”，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基本方向如果坚持下去的话，“民主新路”的探索将会取得大得多的成效。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基本方向并没有坚持下去。就象毛泽东在5月中旬所写的那篇文章的原题——“走向反面”一样，由整风到反右这一大转弯所带来的结果，完全违背了整风的最初动机。而且，这一大转弯，一直影响了此后的20年。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开展社教运动；1964年、1965年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直至1966年发布“五一六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1957年大转弯之后“左”的错误发展的历史轨迹。按照毛泽东的本意，1957年的开门整风，就是要调动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的政治积极性，造成一种可以对执政党展开批评的政治环境。但在大转弯之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阴影下，人们却形成了一种相反的思维定式，诸如：支部书记就是党，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揭露社会阴暗面就是对现实不满；对任何工作的评价，都必须先肯定成绩是九个指头……等等。可以说，1957年大转弯之后的20年间，毛泽东所期望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再也不曾出现过。

这种大转弯现象，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⑦用一句更为形象的说法，就是：“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⑧于是很自然地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必然性因素的作用，使得动机和效果如此地背

离呢？也就是说，旨在扩展“民主新路”的开门整风，为什么却产生出一条“大民主”的歧路？我们在这一方面作些探讨，或许会得到一些更为深刻的启示。

第一，整风目标的背离，首先在于党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意志。即是说，在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有关政治建设的问题上，全党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⑨恩格斯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 1957 年的事件，是很有启发的。

恩格斯所说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也存在于 1957 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根据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新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被所有的共产党员理解和接受。首先，封建主义残余和农民小生产者观念在党内有着广泛的基础，受这些腐朽、落后的思想意识严重影响的党员干部，根本不可能听进党外人士尖锐的批评意见。其次，囿于大规模阶级斗争时期形成的一些过时的传统观念，一些党员干部对于执政党的领导内容和领导方法的转变极不适应，认为还是过去那一套干起来顺手，如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讲起敌我矛盾，思想明确，劲头十足；讲起人民内部矛盾，认识模糊，兴趣不高”。^⑩最后，建国后，执政党内的一些党员干部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甚至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对共产党的干部，只能赞扬，而不能批评。受这种

情绪和观念的支配，他们难以接受自由批评的局面。

显然，在上述几种思想倾向支配下而对自由批评局面有着一一种本能的反感的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可能以全力去贯彻中央方针的。相反，他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央方针的实施设置障碍，成为与中央精神相冲突的惰性力量。这股惰性力量，在整风开始时是实施鸣放方针的主要阻力；而在“事情正在起变化”时，又成为毛泽东和中央改变方针的主要推动力。实际上，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部分人的片面认识的影响。如他在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于“六六六”会议性质的错误判断，即是如此。

这种“意志的冲突”现象从反面证明了执政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作用。我国古代的一位军事家孙武子说过：“上下同欲者胜”。打仗是这个道理，建设也是这个道理。在朝着“民主新路”的目标前进的时候，如果党内形成的不是方向一致的推动力，而是相互冲突的平行四边形似的合力，那么，这个目标就必然要落空。1957年开门整风“走向反面”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拓宽“民主新路”，首要的条件就是在全党实现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第二，理论准备不足，是1957年整风走入歧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理论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上。我们前面曾指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并初步解决了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初步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科学的理论。没有这个学说，也就不会有开门整风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而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并非已经完满，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作出研究和解释。但是，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的工作，当时却明显地落后于开门整风的实践。

当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要使开门整风运动顺利地展开，就必须在理论上阐明划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确定界限，以防止在鸣放活动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这个界限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具体的说明。到了 5 月 25 日，毛泽东在修改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时，加写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究竟是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标准，还是划分人民内部的是与非的标准，毛泽东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按照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这六条政治标准似乎应该是划分人民内部是非问题的标准，因为所谓的香花和毒草这对概念，毛泽东本来就是在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上来使用的。但是，在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中，这六条政治标准又成为划分人民与敌人的根据，因为违背了这六条，就是右派，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概念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实践中的主观随意性。在当时有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就因为概念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被领导者主观地认定为敌我矛盾。

这种理论滞后现象还表现在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在开门整风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认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①这种观点明显落后于社会大变动时期我国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新情况。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认为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就在人民的范畴之内。但是，当过渡时期基本结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这个提法，则必然要把许多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阶级斗

争来处理。这实际上就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留下了理论上的罅漏。此后许多人为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都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名义下展开的。

当然，在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大变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外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国内的实践又处于开始阶段，经验积累不足，因此，出现理论滞后现象也是难免的。问题是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而切不可误以误断为正确，盲目自满。

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⑫理论上的疏漏，成为 1957 年整风偏离原定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我们从中得到的又一个启示就是：在探索执政党建设“民主新路”的进程中，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完善和发展理论。

第三，对于“内外夹攻”缺乏必要的制度制约，最后酿成“大民主”之风，是 1957 年开门整风“走向反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对执政党的缺点毛病实行“内外夹攻”，这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时期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这种“内外夹攻”的方法一旦失去了必要的制度制约，却极有可能给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和震荡。1957 年整风中的“大民主”即是如此。

“大民主”这个概念最早是在中共中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由党内外的一些知识分子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⑬那么，毛泽东是怎么看待“大民主”的呢？毛泽东认为，“大民主”是一个方法，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

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⑭这是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毛泽东认为就是指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他说：“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⑮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主要是用来对付敌对阶级的，一般不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的发言中即指出：“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从大搞群众运动反对阶级敌人的角度来理解“大民主”不能说没有相当的道理。

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⑯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一些单位任何民主都没有，大民主没有，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毛泽东认为，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等“大民主”，是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之一，一种补充方法。他说：经常的方法应该是克服官僚主义、批评。但是如果办不到，用这种方法调整我们社会秩序，也是应该允许的，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就值得研究了。因为不同质的矛盾应该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对待阶级敌人的方法，绝对不应搬用于人民内部，毛泽东本人这种理论上的混淆，为以后“大民主”的盛行，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度滥用，造成灾难性后果，提供了一个

理论根据。

正因为毛泽东一开始就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大民主”的方法，所以。当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之风波及全国之后，毛泽东和中央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反而将这些方法接了过来，当作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工具。在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夕，毛泽东即要求各机关和高校加紧进行“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他说：“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①7}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①8}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大民主”此后就成为我国合法的与常见的政治生活形式。

“大民主”由出现到盛行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开门整风运动由正确的主题开始而终于“走向反面”的过程。在5月份的鸣放活动中，“大民主”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局部的混乱局面；而在反右派斗争发起之后，“大民主”又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使形势更加趋于复杂和严峻。这个教训说明，对于执政党的“内外夹攻”，必须要有健全的制度来加以引导和制约。这些制度不仅应该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渠道的畅通，而且还必须在“夹攻”的方式、方法、场合、范围等方面给以明确的限定。如果没有或者突破这样的限定，所谓的“民主新路”就必然要滑向“大民主”的歧路，从而完全背离它的目标。

第四，要使“民主新路”畅通无阻，不仅需要对“内外夹攻”加以制度制约，而且还必须依靠国家法制来限制或规定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对于这种“夹攻”的反应性行动。这是1957年开始“和风”而后“暴雨”这一迅猛变化所给予我们的一个很深刻的启示。

在开门整风刚刚发动的时候，有许多党外人士心存疑虑，怕因为提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据罗隆基所说，曾有人提出，让毛主席出面讲话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①9}为了消除这些人的顾虑，真正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也确实一再作出了保证。但随后事态的发展变化却使人不能不承认，这些人的担心不幸而言中，他们确实因为提意见而遭到了打击。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所谓的鸣放似乎真像某些人所言，是诱人陷入罗网的“圈套”，如戴晴在她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就断言，开门整风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大“阳谋”，她并且试图以道义方面的原因去解释这种现象。

当然，这种解释是徒劳的，它不能说明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是，1957年“翻手为云覆手雨”的现象却是发人深思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种现象，就如“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即”一样，“民主新路”始终是一个美好而不可即的幻想。

显然，决不能只用道义去作保证。当时罗隆基就认为，让毛主席出面讲话保证，“那是笑话”。其实，当时遭到严厉批判的“平反委员会”，除了它的错误的一面之外，还包含着一个极其深刻的认识：“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②0}这就是说，应该用法律制度来作保证。这确实是当时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在1957年的中国大陆，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执政党都是国家法律的制定者、解释者、执行者，党似乎就是法律的化身。因此，人们

很少考虑执政党的活动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也就很少有受法制制约的意识。从实质上讲，当时对右派的过火斗争和处理，包括由群众通过、上级党委批准戴“帽子”这种方式，都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精神的。

因此，必须用健全的国家法制来限制执政党的活动，使执政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之内活动。否则，“民主新路”就不可能开通。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扩展“民主新路”的实践活动虽然遭到了挫折，但对于这条新路的探索却始终没有停止。当然，直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这一探索任务已经完成，但这种不断的探索使得执政的共产党虽然历经风雨，却始终没有跌入“周期率”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以后对于“民主新路”的探索过程，不论其正确与错误，成功或失败。都是不断地跳出“周期率”的过程。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一波的一段话说得相当精彩，以此作为本书的结束。薄一波在引用了本书第一章中所提到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次谈话后，写道：

“黄先生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先生也向我们提出过：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毛主席当时对黄任老的回答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依靠人民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看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②1}

注释：

-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4页。
- ②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1957年3月12日）。
-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5页。
- ④中共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1957年5月4日）。
- 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 ⑥同上，第411页。
-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 ⑧参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5页、51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
-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 ⑩《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1958年2月7日）。
- ⑪《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 ⑫《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 ⑬《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 ⑭同上。
- ⑮同上，第323，324页。
- ⑯同上，第324页。
- ⑰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1957年6月6日）。
- ⑱《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
- ⑲《人民日报》1957年5月23日。
- ⑳同上。
- ㉑《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7页。

主要参考资料

(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 《列宁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
- 《斯大林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版。
-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1992年8月出版。
- 《周恩来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1984年版。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 《刘少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1985年12月版。
-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
-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
-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

(二)

- 《人民日报》1956年、1957年、1958年。
- 《光明日报》1957年。

《文汇报》1957年1月—6月。

《解放日报》1957年1月—6月。

《中国青年报》1957年1月—6月。

《北京日报》1957年1月—6月。

《新观察》1957年1—24期。

《中国青年》1957年1—24期。

《新华半月刊》1957年1—12期。

(三)

《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1958年8月)。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1957年10月)。

《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印(1957年8月)。

《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活动材料汇编》(1957年5月—8月)中共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组资料室编(1957年11月)。

《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共中央民族学院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11月)。

《“观察”储安平言论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有关彭子冈右派言行的材料》中国青年出版社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7月—8月)。

《关于章罗反共联盟的资料》。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整风办公室编(1957年8、9月)。

《北京师范大学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北京师范大学整风办公室编。

《拔白旗 插红旗——北京各高等学校双反运动大字报选》，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10 月版。

《1957 年的春天》迟蓼洲编写 学习杂志社 1958 年 4 月版。

《想一想 对不对》第 1 号至第 37 号合订本 中共对外贸易部党组整风办公室编（1957 年 12 月）。

《报社右派分子思想言论和某些同志右派观点选辑》，中国青年报社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 年 9 月）。

《关于“野草”、“蜜蜂”社反动小集团的材料》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 年 12 月）。

《右派分子徐铸成的言论作品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 年 10 月）。

《整风中的错误言论》，人民日报编委办公室编印（1957 年 6 月 8 日）。

《毒草集》，中共贵阳医学院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57 年 9 月）。

《本校右派谬论汇编》中共东北师大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1958 年 6 月）。

《本校右派反动言论选辑》中共东北师大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1958 年 8 月）。

《高等学校右派学生演讲、论文选编》共青团中央办公厅（1957 年 8 月）。

《高等学校学生右派言论汇编》，共青团中央办公厅（1957 年 8 月）。

《工商界鸣放中的错误言论汇集》（1957 年 5 月至 6 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社会科学资料室编。

（四）

《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版。

《新中国四十年研究》陈明显 张恒等编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中国哲学四十年》杨春贵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

《毛泽东建党学说史》上下册 张蔚萍、张列军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1991 年版。

《党的建设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版。

《历史的启示》陈雪薇著 求实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版。

《六十春秋风和雨》施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

《执政党建设初论》金春明 孙敬勋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国知识分子四十年掠影》(1949—1989 年)光明日报新闻研究所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

《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众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版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

《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戴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

《党在 1957 年怎样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论断》
裴棣《党史研究》1983 年第 5 期。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因果初探》叶炳南《社会科学信息》1985 年第 2 期。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胡绳《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反思》陈雪薇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党史
专题讲义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88 年版。

《1956 年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裴棣 陈雪薇《党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对 1957 年的再认识》范守信《党史研究与教学》1988 年第 4 期。

《试评反右派斗争中“引蛇出洞”的策略》曹屯裕《宁波师范学院学
报》1987 年第 2 期。

《毛泽东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史略 许卿卿《党的文献》1991 年
第 5 期。

《建国以来阶级斗争问题的历史回顾》陈诗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四十年回顾与思考》1991 年 4 月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重要理论观点的修改始末》施
肇域《党的文献》1991 年第 2 期。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1 卷(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求实出版
社 1989 年 12 月版。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美)莫里斯·迈斯纳 四川人民出
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 2 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版。

《中国的反右运动》（英 纳拉纳拉扬·达斯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

附录一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费孝通

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所谈的无非是一隅之见，一时之感；写出来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而已。

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解放以来，一直还是手不释卷，但是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也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同行老朋友见面时常会互相打听陈先生近来怎样了。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连载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辈，三十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的作者。我记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个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先生曾说起过他自从院系调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门不同的而都没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课。尽管他用了极为幽默的口吻，很轻松地道来，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话头。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这个感觉并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

曾会见过不久前为了笺注杜诗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访回来的刘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张文渊先生邀我去吃小馆子送行，大谈他正在设计中的排字机器。这半年多来，知识分子的变化可真不小。士隔三日怎能不刮目而视？

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几年来 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 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 1 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闹的生气正在冒头，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苏州、杭州去走过一趟。一路上也会到不少老朋友。在他们谈吐之间，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寂寞之感：当一个人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的这种感叹是不多了。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

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蕴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概括地答复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们这个范围里来捉摸捉摸。新年里报纸上曾发表过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年愿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呢？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二本书”意思是要能静静地做做功课。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说个由来。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坐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自然是领情的，但是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了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应当说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现在这已不是重点了。针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来说，现在主要是要帮助他们提高业务。先谈谈他们的业务情况罢。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师们曾经紧张过一

阵。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编，又由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许多教师们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没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译讲义，显得很忙。这两年来，是不是学习苏联已经学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建立了呢？我想并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课的困难似乎确是比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师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讲义也编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读，问题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教师自己先得要独立思考一番。过去和教本不同的说法，不论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闭口不谈，现在得讲讲各家的异同，那就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沒有钻研过，道理也就说不明白。过去可以口头上复述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论，现在心口不一致，连自圆其说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连原书都没有见过的异说，跟着大加驳斥，现在别人一追问就会露马脚了。总之，现在没有一点真才实学，教书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质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师们业务上的紧张的道理也在此。

我所接触到的许多朋友们，对反教条主义是拥护的，对自己提高业务的要求也是积极的，他们要求帮助也是真实的。要“一间房、二本书”静静地做功课就是指这个。说得具体一些，他们要求开展科学研究，要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会议，甚至要脱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等。这种要求是好的，应当说是可贵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帮助教师们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怎样了呢？有的学校好些，有的学校差些，总的说来，我认为并没有满足教师们的要求。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令人满意的情况，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好呢？我看并不如此。教师

们工作条件在过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说过去吵得最凶的时间问题。自从规定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之后，各地高等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贯彻，效果是不坏的。去年上半年，北京的高等学校里大约已有四分之三的教师得到了保证。8月里我到昆明听说云南大学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教师还不能保证业务时间。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学校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教师比例已降到十分之一以下。这个问题虽则不能说全部解决，而且像李达先生在新年愿望中所提到的情况还是存在，这些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证的人又多是和能力搞科学研究的，但是一般说来时间问题已不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了。其次，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条件怎样呢？这些条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过去一年中，各校购置图书一般都有增加，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书少，而是编目慢、流通难，分配还不够合理。仪器方面在生产、供应、修配、使用上问题还多，特别是内地和边区的学校困难不少。但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别的专题外，一般还没有发生有人因为这些方面的条件缺乏而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

那么现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在开展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具体领导不够。在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强了对教师们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些学校里的教师们也就安心工作，业务有提高，学生也满意；凡是放松了这方面领导的，教师们彷徨苦闷，情绪也多。这种区别是可以理解的。教师们当前积极要求提高业务，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

全国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没有把科学研究工作认真领导起来的学校还是不少的。有些学校把“向科学进军”当运动来搞，做了号召性的动员报告之后，发表格要教师们填题目，造计划，甚至过了一个时候就伸

手要成果。在高等学校里究竟应当搞些什么研究？科学研究和教学怎样结合？各科抓些什么问题？教师之间又怎样组织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进行研究时要什么具体条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怎样帮助克服？怎样组织讨论来提高学术思想？——这系列的问题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教师能单独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上都须要具体领导。如果学校领导上不深入实际，依靠科学研究上有经验的教师，逐步地跟着工作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教师们尽管主观上怎样积极，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开展不起来，就是搞得有些混乱。我就遇到过已经填过几次科学研究计划表的朋友，见了我还是说科学研究方向不明，题目难找，甚至有些连自己在表上填过些什么都不大清楚了。对于这些朋友，向科学进军真像一阵风，只“吹皱了一池春水”。另外还有些朋友，急于赶世界水平，对实际条件考虑不够，一动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学任务碰了头，时间冲突，精力兼顾不来，发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学校领导上对第一种情况倒并不焦急，按兵不动，但求完得成当前教学任务就满意了，而且科学研究表格已汇报了上级，交了卷了。他们对于第二种情况却相当敏感，惟恐教学任务受到影响。他们不去分析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更少自觉到这正是缺乏具体领导的结果；反而大叫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矛盾，教师们名利心重，轻教重研。好像为按兵不动，填表了事，找到了正当理由。这种叫喊对教师们的积极性是不利的。上推下拉，进退两难，他们思想上怎能不混乱，情绪上怎能不受波动？高等学校里怎样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一下是必要的。如果真在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和教学有矛盾，不能放手开展科学研究，也得拿出个提高教师们业务水平的具体办法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但总觉得解决的办法，不是在冻结科学研究，保证教学，而是在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导，密切和教学的结合。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搞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检查一下的。

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积极要求反映了他们已自觉到业务水平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这种自觉表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如果他们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他们为什么要不到午夜不上床的自苦如此呢？我想强调知识分子搞科学研究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接着想谈谈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线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译的小册子来读。写文章、上讲堂多引几句引经据典的话，找几个英美学者骂上一番。这些都好办，而且很多人是这样办了。但是学习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之后，逐步会觉得这样简单的划法，似乎是很成问题的，觉得有一点点像小孩子看草台戏，剧情看不懂，就看白脸还是红脸，白脸挨打了就叫好。他们逐步明白过去那样以为那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物的，那些人说的话一定是唯心的想法不很对头的。他们开始要求从学术思想本身来辨别唯心还是唯物。我想这应当可以说是学习上进了一步，但是这步一进，问题却多了，心情也跟着复杂起来了。他们很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自己的学术思想里究竟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却还没有这个条件。

积极的东西搞得不好会变成消极的东西。要求搞清楚唯物唯心的界线应当肯定是积极的，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这种要求不能满足，别人还是红脸白脸地来对待他，他心里就会不服气，会产生情绪。我体会到学习苏联这个问题上就有这种情况。最初确是有人反对学习苏联，本质上是立场问题。但是最近又出现一些对学习苏联的态度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加分析，会觉得立场又不稳了，其实性质是和过去不同的。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确有一些地方把学习苏联简单化了。有些苏联传来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些人提出了怀疑或不同意见，反而受到批评，于是搞出了情绪。这些情绪并不是从立场问题上发生的。但一有情绪。消极因素也跟着滋长，那就不好了。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转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较似乎又差一些。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转，在一定场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话了，但是还是相当腼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门来进，而百家争鸣就得抛头露面来鸣，腼腆了就鸣不成。

·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面子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我记得有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会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薪评级，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有的担心。

“中央定的方针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里具体情况还没有条件。”接着有些人想把这个方针圈个范围：先圈在学术里，再圈在教学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出乱子了。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

“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

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比如说：波匈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边区旅行，没有直接听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些事，我的印象是这样大的事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却是不大的。一方面这是好的，说明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立场是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别得很清楚所以很稳，而是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

我想，对世界的和国家的大事不很关心可能是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新发生的，由来已久。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谈起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不很关心政治。有一位朋友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认为国家大事自有贤能，自己可以不必操心。大家的确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错不到那里去的，很放心，只要好好跟共产党走，把自己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了。其次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别人批评，自己常常会问问自己是不是旧思想又在冒头，所以对于世界大事或是国家大事自己没有个看法和主张，等等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才动脑筋。第三，对世界大势，自觉很孤陋寡闻，不要说别的，连很多外国人的名字说起来都觉得绕口。情况不熟悉，要动脑筋也没有资材。第四，几年来养成了没有布置就不学习的懒汉习惯。我们曾经想替这些思想配个帽子，但是配来配去头寸都不很合。说信任党、接受领导不对么？当然不可以这样说。但是怎么会信任得成了依赖了呢？虚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么搞得没有了主张了呢？不论怎样，总的看来，对国家的事情关心不够总是消极性的东西。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思想情况的呢？这些思想情况又说明些什么呢？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自认水平不够，说不清楚。我们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问不问国事对国家

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没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们觉得积极来提出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必要，别人也不见得考虑，不赞一词，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发挥呢？那么怎样能把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说到了这些问题，我想可能会超过我这篇杂文的范围。那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1957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报》）

附录二 知识分子闻“放”之初

徐亦安

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要组织对象的几个民主党派，从3月下旬到4月初，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和各地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几百位代表，都曾热烈地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中共中央宣传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反映出各方面的意见，内容丰富，发人深省。

我们旁听了一系列的小组和大会讨论，访问了一些教授专家，仅就见闻所及，分篇加以报道。

“春寒”与“春暖”之争

有人在小组会上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录音之后，知道中央的政策是贯彻“放”的方针，自己的心情“既兴奋又感到心里紧”。感想颇多，当晚未能入寐。

是不是多数的人都兴奋？心里紧”又是为了什么 我就这两个问题，向一位相处较久的老教授请教。

他回答：“说自己兴奋的人很多。但也有人没有这种表示 我就是其中之一。杜工部有两句诗，‘春气晚更生 江流静犹涌’。对我这类的人，是很好的写照。表面静，心里涌。”

“为什么‘心里紧’ 各人的心理状态不同。有人说 现在的环境，对老知识分子，还不能畅所欲言。耳闻佳音，眼观现实，中间还有距离，因而，油然而生‘心里紧’的感情。我的想法不同。中央的政策措施，是体贴到做学问人的甘苦。瞻望前程，任重而道远 心中焉得不紧。”

由会议的反映来看，因“任重道远”而“心里紧”的人，占相当的数量。对目前妨碍“放”的障碍，几乎是一致表示不满。然

而，是不是因此而“心里紧”，却有两种基本相反的意见，并且展开了争论。

争论是体现在对具体事例的理解中，举其中的一件事来说明吧。

在几个会议上，都有人提到费孝通先生最近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认为确实是代表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情，摸到了一部分脉搏。有人说，现在的环境，还不能使人畅所欲言，自由论争的风气尚未形成。妨碍扩大民主和妨碍百家争鸣的有形无形障碍，还是重重叠叠。另一面，中央提出“放”的方针，春暖花开的季节又必然会来到。因此，对现在的现实处境，喻之为“早春”。而在早春的环境中，知识分子是春寒的心情。

早春天气的譬喻，没有人反对，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感到是“春寒”却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说春寒仍袭人，不慎会感冒。有人说：早春天气，四肢舒展，春意盎然。

一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过较大震动的教授说：“思想改造的初期，勉强接受改造，不能没有痛苦，当时的感觉，是寒冬的凛冽。经过这一阶段之后，我始终再没有寒冷的感觉了。现在虽然是早春，我有早春喜悦的心情。”

这位教授提出一个譬喻说：“早春的早晨虽然寒冷，辛勤垦植的园丁会出汗。漫步而沉思，油然而生感，期望早日春暖花开，而便于自己整枝折叶工作的人，当然会有春寒之感。”

早春天气，有“春寒”和“春暖”的两种感觉。这是会议上的争论之一。

“礼贤下士”和“尽其在我”

第二个争论，是对知识分子的估价和安排在什么地位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两个方面。

由领导工作的角度来看，“放”的关键问题在于领导的提倡，

在于负责领导工作者大力创造环境。要这样做，首先要纠正某些人以“落后”二字概括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

对于知识分子的估价，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很多人在发言中，都是用对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态度作为衡量的尺度。而不同意某些人仅以爱国主义这一尺度来衡量知识分子。并认为，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采取不同程度的积极态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很重要的力量之一。

为什么要分析这个问题呢？有人说：这是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解除“放”的障碍的重要出发点之一。有人所以怕“放”，怕出“乱子”，或是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上存在着隔阂，原因虽多，其中对知识分子的情况和作用，估计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各地区来的代表，都反映了许多具体事例，证明许多地区对于“放”的方针，贯彻得很不够。敢于“鸣”和敢于“放”者，往往遭受到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包抄”“围剿”和扣帽子的现象仍然是时有所闻。这就使得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瞻前顾后，不敢“鸣”“放”。很多人同意罗隆基先生在政协发言中所说：“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还有人补充说，不仅是教条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程度的宗派情绪。

这些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争论。而由另一角度出发，即是由知识分子本身这一角度出发，却有很多的争论。

争论的一方说：老知识分子是有许多特点，敏感、多虑。而且一有隔阂，很难消除。他们的基本态度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人说：目前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温暖。因为有些人经过了一系列的风暴之后，体力较弱，若再遇风，容易“倒伏”。

也有人引用罗隆基先生在政协的发言说：“老知识分子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的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

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若能受到‘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知遇，必肯鞠躬尽瘁。罗隆基先生说得明白，不是希望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而是说：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与‘下’是有矛盾的。如何统一这个矛盾，鼓起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有人用实际事例证明，老教授的心理是：“校长来看我是礼贤下士，我找校长是向上逢迎。”

争论的另一方是认为这样说，只看到高级知识分子复杂心理状态中自尊的一面，并且是孤立的夸大了这一面。一位化学专家说：“我若仅是如此，岂不是太落后了。”

有人说：高级知识分子，对简单生硬的方式，是很不满意的。对许多不满意的事，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表达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是“漠然而冷眼视之”；一是“直言上达”，敢争敢叫，敢于发牢骚。

有人解释了“漠然而冷眼视之”的态度说：“在每次运动之后，被刺伤了感情的人，绝大多数是对许多事情漠然而冷眼视之的。但是，多数人的另一面表现，却往往是埋头治学，或是埋头教书，一般说，在工作上、治学上，都比运动前要好些。有人解释说，这只是寄怀遣兴的行为，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埋头治学或是教好学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态度。若不是积极态度，他会躺下不干的，或是敷衍敷衍，以度时光。”

“士为知己者死”，高级知识分子的“士”是一方，“知己者”是另一方。现在的问题，“知己者”是指什么。许多人不同意“知己者”是指领导干部，而认为是指祖国和社会主义。今天的知识分子，爱祖国之心是无可怀疑，也无人否认的。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呢？绝大多数是接受社会主义的，并且有些人是已经热爱社会

主义。若是承认此点，那么，“士”已有了“知己者”。对个别人的不满，是不牵涉“士”对整个工作的态度。不然，工农知识分子的联盟，就无根据了，至于那一位怀着“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心情，那只是具体人的问题，而不能因此概括为知识分子的问题。

因此，有人说：站在知识分子本身的角度，一面要求领导干部主动努力，创造“放”的条件，另一面也要采取主动的态度。既然是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中的一个方面，就必需有主人翁的态度。主人翁是要采取“尽其在我”的积极态度的。

今天的需要

今天，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需要什么？

一种答案是：需要照顾、信任、重视和大天地的温暖。大天地是指家庭这个小天地以外的天地而言。

再一种答案是：需要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能倾吐对国家建设的各种具体意见。特别着重的是“具体意见”。解释是：一般概括性的意见，知识分子已经听够和说够了；一般性质的争论和学习，知识分子也不满足了。

还有一种意见是：温暖是需要，单纯温暖也有问题；发表意见很重要，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很重要。

这三种意见，最后的讨论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问题。大家都认为应该学。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却其说不一了。主要的意见有两种。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要求进步的，对学习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也知道。但是，上夜校，听报告，一般质量太差，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不如给他一间房子、两本书，为他创造小天地，听其自学。”另一种意见是：“关门读书，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与工农结合，多接触，吸收一些工农的感情。”

“吸收工农的感情”的问题，由表面上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有所不同。举一个例子来说。参加讨

论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是细致的工作。因为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敏感”而“多疑”。如何对待这“敏感多疑”呢？有人说：“你既知他敏感，就应该小心相待；你既知他多疑，就应该使他不疑。要尊重，要给以温暖，再也冷不得了。”

不同意的人说：“我们既然是高级知识分子，站在本身的立场上又如何办呢？为什么我们要多疑，为什么我们要敏感。不由本身出发来由根本上减少多疑和敏感，异地而处，你是领导干部，想也无法周全地照顾吧！正己而责人，双方要求，才能共同进步。责人而不正己，是舍本逐末。”

（载《光明日报》1957年4月9日）

附录三 春天的感应

潘文彬

在这些日子里，虽然是春天来得较迟的北京，也到处一片春光了。有一天上午，记者和一位朋友因事到北京大学。我们坐在汤用彤副校长的房里，汤老先生卧病经年，他斜倚在床栏上和我们谈着话。从窗子里望出去，这天是雨后新晴，一抹阳光，照着带雨盛开的桃花，反映室内，春光四壁。记者听着汤先生娓娓的谈话，望着窗外的景色，心里不住地想起这时候的南方——“闻道巴山里，春船正好行”。想着这时候的南方，一定是群莺乱飞，杂花生树了。可是，眼前的事实，汤先生的谈话，却又把记者从春天的冥想中拉了回来。有一位学者说得好：人的活动的事实比自然的景色更吸引人。在这些日子里，在知识分子中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包括诗人在内，关心自然的季序迟早的，恐怕是很少吧。因为大家都在为另一个季节——思想的季节，为一篇报告所激动，这篇报告，成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生活的主题。大家在谈论，在为它而思索。有许多打算，有许多积蓄需要抒发，真是山泉滚滚，你无论走到哪里，团体集会，老友相逢，你都会听到这个话题。有一位先生看到这种景况，他引述了杜甫的两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说这个话题所以如此吸引人，“所以如此之令人兴奋”是因为“是时候”去年提出这个方针，正是时候，今年毛主席的讲话，又正是时候。他几次用“正是时候 正是时候！”的叠句来加重他这个在他看来是一语道破的意见。

是 的 一

清明节，雨晴天，
得意正当年。

确实正是时候，无论抒发怎样的意见，比如有的先生还有着春寒之感；有的先生说要放就大放，不要再有什么清规戒律；有的先生还希望更多的创造条件。无论抒发怎样的意见，大家都是一致拥护毛主席的讲话，热情向往这个方针的贯彻实行。从记者这些天来接触到的一些先生们的谈话看来，这位先生的“正是时候”的说法，确是说明了他的，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的内心的感怀，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希望，他们所以如此兴奋，笑语相告，热烈论争，自己想抒发意见，也想听听老朋友的高见的道理。

* * *

汤用彤先生就是在和我们谈着这个话题。他说他的身体已经大好了，他已能读些书，每天都看报纸。他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4月10日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论）非常兴奋。“很好，很好”。他说，“去年提出这个方针，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拥护。现在毛主席提出还要放，还要继续放手，我虽然不能出门，与外界接触较少，但有时老朋友来访，也在谈着这个问题，也同样兴奋”。他谈到报纸上反映的春暖与春寒之争，说知识分子是无顾虑的，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至少很快便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的看法，去年提出这个方针，对知识分子给了很大的鼓舞。鼓舞，就是解除知识分子的顾虑。今年，毛主席的讲话，是更大的鼓舞，那么，还有顾虑的，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引起了新的顾虑的，就可进一步把顾虑解除了。他以他自己为例——他写有一些关于哲学史的论文，早就有朋友劝他编为一集，交出版，可是他有顾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过去，知识分子心里有顾虑，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因为你说或是你表示有顾虑，“落后分子”的帽子就扣到你头上来了，非得超过自己的心愿和勇气突出地表示积极一番，这顶帽子是难望摔掉的。所以有什么事要推脱，总得找一个借口。“我也找到了一个借口”。汤先生想起过去的事，

他笑了。他的借口是这些论文还得研究研究，这样便把这件事推脱过去了。自从去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才决计整理出版。他觉得，在学术上，在国家生活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是无所用其顾虑的。

谈到所谓“顾虑”问题，有的先生是没有顾虑的；有的先生说“我们还有顾虑”，有的先生口里不谈，谈起的话，也说没有什么顾虑，其实心里是有顾虑。记者和一位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很有风趣地，对此作了生动的，在记者看来是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说，毛主席的讲话，带来的是思想上的春天。去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是春雷初动，接着几场霖雨，百草含芽，一片初春景象。而后由于种种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在有些人中间，有过一些思想的波动，好像春天很快便过去了。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害怕伤风感冒，也容易患伤风感冒。今年毛主席的讲话，才真使人感到阳光普照，真正的春天来了。这个思想上的春天，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它波澜壮阔，及于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就知识界来说，当然，感应是一致的，不过一致之中，又各有其不同的感应。“这是无怪其然的”。他说，他引述了蔼尔维修斯的这几句话：“我们看见小的、大的、直的、弯的橡树，但是没有看见和别的橡树绝对相同的橡树”。就同是橡树，对于季节的感应，基本上当然是一致的，而一致之中，当然也有其不同。何况在知识界来说，并不是橡树所可比拟，而是一片森林。一片森林，和风甘雨，冬去春来，难道在一致的感应之中会没有不同之点么。春天来了，草木茁长，广大的知识界对毛主席的讲话是欢喜的，欢迎的，热烈地拥护的。而有着不同的感受，也是自然的。

“为什么有些先生还有着顾虑呢？”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说：“顾虑也不是一扫帚就可以扫除的。百花齐放，并不是一时一刻一齐开放，仍然有个先后次序，这是事物的差异，这存在于它们的胚胎里，也存在于它们的发展里，然而只要春天来了，百

花终究是要开放的，树木终究是要长出绿叶子来的，前边说的一致之中的不同的感受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他听到有一位摩尔根学派的专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一直在犹疑，他认为“放一放”，然后便会“收一收”，结果不免是“整一整”。而“放一放”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整一整”。他的想法是“我又何必冒这个头呢”。直到这次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才想到自己的想法是“错了，错了。”他说他是“既感且愧”。对于这种想法——这种“放，收”“整”的顾虑，决不能拿它来作为谈助；啊！居然还会有这种想法！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是不对的，必须用严肃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存在着这种想法，而且有着这种想法并不止一个两个人，而且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时，在另一方面，不是也还有人确有“放一放”然后“整一整”的思想么，毛主席所批评的教条主义者不就是这样想的么。听说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些地方的文联已把它作为指针，检查工作，可见是有它的代表性了。要是照着教条主义者的想法和作法，那各种顾虑便不是多余的，而是幸而有此一着，否则便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知识分子要看的是事实，只有事实最能说眼人。在“既感且愧”的心情中，才能渐次把顾虑扫除而奋勇有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从来没有用压制的方法可以解决的，鼓励、事实的鼓励是最有力量的鼓励。

这位先生分析了顾虑的来由。他说顾虑之来，有外在的原因，有内在的原因。起先，当然是由于外在的原因所引起的，而后，当外在的原因减弱作用，那么，顾虑的存在便是内在的原因要负责了。在过去，知识分子怕“整”，而事实上是有着“整”的事实在。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谓此时也，此地也，“整”是有它的积极作用的，它的积极作用大过它所生的消极作用，这也是人所公认的。这里且不说它，但这个“整”产生的副作用，便是使知识分子存在着“顾虑”。这是说，知识分子的顾虑，起初是由于外在的原因引

起的。去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接着，中央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再一次明确了要贯彻这个方针；今年，毛主席的讲话更是把话说得明白，‘不是要收，而是要放，不是放得够了，而是放得不够。这样一步一步鼓舞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解除顾虑，而有些先生仍有顾虑的话，那就不是什么外在的原因，而是应当反求诸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领导方面还是要注意，要创造条件，可是，知识分子同样应当努力，只有自己才能解除自己的顾虑。

* * *

在这里，记者要记述一下另一位教授的意见。这位教授的意见：“放”与“鸣”在北京是没有问题的，北京得风气之先。自然季序的春天，北京比江南来得迟些；而思想上的春天，北京总是发轫之地。所以，问题在于地方。地方看北京，当然是合乎“规律”的。可是，看了之后又怎样呢？他说，西南有一位大学教授来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一些教授各抒己见，谈了一些问题。在北京的知识界看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会。可是这位来自西南地区的教授却感慨系之，说他在西南不但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也没有听到开过这样的会。可见地方的风气还有待开放。说到顾虑，地方的知识界可能顾虑更多些。春光普照，毛主席的声音当然会遍达全国，无论穷乡僻壤，春风当然都会要吹到的。“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是诗人一时的感怀，不会是事实。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键在于一层一层的领导，地方的领导应当不是等待春风，而是起积极作用，蔚成风气。不要使地方的知识界看见北京这么热闹，而地方呢，却有着“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之感。

对于这个意见，当时在座的一位先生说：“为什么地方的知识界要等待呢？这是地方的知识界和地方的领导共同的责任。春天

来了，既然地方春天的气息不浓，为什么知识界要徒自怀着‘春归何处’之感而没有仁人志士出而争取呢？说到仁人志士之举，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天，记者去访问一位教授，在他的客厅里，已经坐着几位先生在谈着这个话题。其中有一位先生说，他在一次集会上，听到一位教授说，要放就要大放，过去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给人的印象太深了，知识分子还有顾虑。对于这个意见，他说他是“不敢苟同”的。在座的一人问：“您把您的不敢苟同的意见在会上说了么？”他说：“我没有说。”您为什么不说呢？”他笑着说：“我还没有学会斗争，在我身上，知识分子的余气未尽，我还要学习。”他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他说这不是可笑的问题，要是笑，那是会心的笑，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习惯于堂下私议，而不习惯于抗声争论。要是抗声争论，“啊，你这个积极分子！”这个“啊”和过去“啊，你这个落后分子”的眼光，同样是“夏日可畏”。如何不畏，则尚待努力。所以，私下谈谈是可以的，至于指名道姓或面对面的论争，则尚有待也。

依照他的看法，他说这是“千秋公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有它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是几年的建设事业的开展，而在思想方面的主要之点就是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使知识分子净身沐浴了一次，照了照镜子，面向马克思主义了。而总起来说就是“时间”。单说在思想基础上，要是没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这个方针是提不出来的，提出来了也就会“不是时候”。说现在要放，意思之间，以前的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都是错了。“现在要放，为什么以前要进行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呢？既然以前进行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是对的，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又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这个逻辑悬在空中是对的，把它放在地上，放在事实的天平上，它就不成为逻辑了。现在要放而且能放，就是说，有放的要求，而且有放的

可能，正是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的功劳。没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就是要放也不能放，没有放的条件，没有放的思想基础。没有春天，也就没有秋天。或者是：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因果关系是要弄清楚的。诚哉，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产生过副作用，可是无论什么事情都难保其没有副作用。不能由于它产生过副作用，便否定它的积极的主要的作用。而且，它所产生的所谓副作用，是使知识分子有了顾虑，可是，知识分子本身也是要负责任的。这位先生笑着说，他的这个意见，是会引起有的先生，比如那位教授的反感的。不过，他认为，那位教授敢于在会上提出这个意见，说自己还有顾虑，就证明了他已经没有顾虑。他真有顾虑的话，是不会在集会上说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春天已经来到了，不过，他对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还有反感而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有过程度不同的反感，因为改造过程是一次痛苦的过程。可是时间会渐次把这些反感消除的。这位教授的反感，时间也会把它消除的。那时候他就会欢喜，达到大家一致的结论——其实他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结论，不过他因为欢喜而在冲激。

*

*

*

够了——不过，关于“顾虑”问题，记者还要用一点篇幅来补述下一位老教授的意见。

记者把有些先生们的意见告诉了这位老教授。这位老教授说，知识分子是在不断改造中。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是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知识分子说来也是改造，不过是不同方式的改造，是深入一步的改造。特别对教条主义是一次改造，所以，教条主义者叫起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过程中，问题总是会有，意见也总是会有。在我们这个时期——过渡时期，知识分子听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欢喜，一方面仍有顾虑，是很自然的。毛主席的讲话，对知识分子是很大的鼓

舞，可以解除人们的许多顾虑。但是，有些顾虑，有些思想问题，只有在不断的改造中，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展中，慢慢地来解决。所以“顾虑”问题，虽然不是大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不能强调它，但也不可忽视它。

这位老教授认为，把思想改造的过程仅说成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还不够，它同时也是一个欢喜的过程。过去的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可以比作用热水洗疮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可比作女同志们生孩子，这中间有痛苦，但更多的则是快感和私心的欢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叫叫是不可能的，让大家叫叫有好处，这不是痛苦的呼唤，而是衷心欢喜的呼唤。他说，说没有顾虑的，并不一定没有顾虑，说自己有顾虑的，并不一定有顾虑；默尔息乎的，也可能有些人没有什么顾虑，也可能有些人有很大的顾虑。这里有“认识”问题，还有人的“性格”问题。而知识分子的性格，也在不断改造中，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愿过于冒头，怕冒了头挨“整”，这就是所谓不愿“锋芒太露”。可是另一方面，又不愿落在后面，坐不了冷板凳；落在后面，是会有美人迟暮的伤感的，是会有牢骚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一般的性格，也就是知识分子有顾虑而又有所谓“反感”的原因之一。这个性格，是在不断的改造中的。事实，和事实所形成的风气，会慢慢地解除知识分子的顾虑，连同改造知识分子的性格。使知识分子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实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

*

*

• 记者要附注一下：作为一篇报纸上的报道，它是太长了。可是——

众鸟鸣茂林，
绿草延高冈。

从记者这些天来所听到一些先生们的意见，一鳞半爪的对“春天

的感应”的探索，还只写出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只好留待下回了。

（载《光明日报》1957年4月18日。笔名文冰）

附录四 这是为什么？

《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 5 月 25 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信来恐吓他。这封信说：“在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卢郁文在 5 月 25 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象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

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象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活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時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

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允许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象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 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后 记

这部研究 1957 年事件的小书 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在，能把它奉献给读者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金春明教授。没有他的热情鼓励和精心指导 我是没有勇气承担、也没有能力完成这一课题的。

我的论文完成后 曾送请 19 位国史、党史界专家审阅，他们是：中共中央党校范守信、王仲清、陈雪薇、陈登才、张蔚萍、谭宗级、于南、陈诗惠、叶笃初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席宣、戴鹿鸣、周承恩研究员、陈文斌编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石仲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彦奇、戴知贤、林茂生教授；国防大学林蕴辉、王年一教授。专家们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给予中肯的评价。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中央党校何仲山教授的热情帮助。此外，我的同学和朋友宫力博士、李良栋博士、陈述博士、郭文亮博士、刘孟泽副编审也十分关心我的论文，从他们那里，我也获益非浅。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我还要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杭海路、来克让同志，他们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以热情的支持，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本书付印前，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杨小池研究员认真审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在此也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向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妻子尚英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是他们为我免除后顾之忧，使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之中。

朱 地

1994 年 4 月 26 日于北京大有庄